

夏潮 論壇 3

探討的、批判的、進步的——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出刊 第一卷·第三期

陳鼓應在海外說了什麼?!
台大言論自由大辯論
「三十年政治犯」的釋放背景
日據時期台灣的
社會民主主義者——連溫卿





為保護憲法 與民主而奮鬥

——評立法院臨時條款和選罷法的爭論

在上次立法院會期審查刑訴法修正案，討論違憲的「緊急逮捕權」時，黨外立委據理力爭，為保障人民權益而大聲疾呼。雖然，這一法案最後在「必須貫徹黨的命令」的情況下，在新老黨籍立委紛紛奉命舉手的情況下，在廣大人民憤怒地指責之下，仍被強迫通過了；不過，人民到底還看到了有一些他們所選出的黨外立委，曾為保障人權而奮鬥過。

黨外立委雖然輸了表決，但卻贏得了全社會的尊敬。所以，反對「緊急逮捕權」不僅是黨外立委的精神大勝利，也是國民公論向國民黨的大示威，國民黨能操縱立法院的「表決部隊」，但不能操縱社會的公道，「公道自在人心」。

由於上一會期黨外立委的光榮勝利，迫使國民黨在本會期不得不事先佈署。首先我們看到，在本會期的總質詢期間，有幾十位原先登記要進行即席質詢的黨籍立委，集體宣佈放棄口頭質詢。據報導，這些黨籍立委所以會突然撤退，是因為受國民黨「內部作業」疏通的結果。據說此舉，一方面是為了避免黨籍立委迫於輿情而與黨外立委呼應，另一方面是好讓行政院集中力量來應付黨外立委的質詢攻勢。

也是由於黨外立委在上一會期的光榮勝利，而使得國人在這一會期對黨外立委的期望甚高，然而却不幸發生臨時條款的「共識事件」。

去年黨外主流派要大家簽署一個「共同聲明」，其中的多項提法，本刊至今仍持保留的態度，其中之一即「國家基本法」的提法。「國家基本法」在西德其實就是憲法，主張「國家基本法」其實就是主張另一憲法代替現行憲法。據我們所知，黨外主流派並無以武力推翻現行憲法的企圖和計劃，因此，「國家基本法」即使實現也只是在國民黨的批准下為之。黨外主流派的「國家基本法」原意是希望以此恢復被戒嚴令和臨時條款所破壞的憲法，所以才有康寧祥委員的「保憲、護憲」之說。但這樣的「國家基本法」是否能比現行憲法更能保障人民權益，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懷疑。現行憲法是國民黨在強大的制衡壓力下政治協商而產生的，中共亦參加政治協商的，當時國民黨並無「一言堂」的勢力，連憲法條文都不是國民黨起草的，起草人是民社黨的張君勱。今天國民黨果真批准「國家基本法」，起草人能輪到黨外嗎？所以，「國家基本法」只能是黨外送給國民黨勒死黨外自己的繩子。「出版法」、「選罷法」、「刑事訴訟法」給黨外的教訓難道還不夠嗎？

國民黨並不是沒有「國家基本法」，只是國民黨不願意揹負推翻現行憲法之名而已，所以，才有臨時條款，並且口口聲聲說臨時條款等於憲法，其實也就是「國家基本法」。康委員在質詢

時說：「這部憲法也沒有真正實施過，其後的戒嚴令和臨時條款，更使它殘破不全，面目全非。」這說對了。但康委員又怎麼能夠同意孫院長的「充實臨時條款」，來使這部憲法更「殘破不全，面目全非」呢？

我們一向尊敬康委員是為黨外貢獻良多的先進，並且相信康委員發言的誠懇。我們也贊成共識，贊成黨內外雙方必須以憲法為共識。但康委員為何會與孫院長的「充實臨時條款」有共識呢？此無他因，「國家基本法」與臨時條款其實是一個東西，只是孫、康二人心中所想的內容不一樣。

孫院長說「國家基本法」「不是保憲、護憲，而是毀棄憲法」，這也是對的，但和「國家基本法」相同的臨時條款就不是「毀棄憲法」嗎？中華民國憲法起草人張君勱就是因為國民黨的臨時條款是「毀棄憲法」，憤而老死異邦的。孫院長以「充實臨時條款」來誑康委員的「國家基本法」，是欺負康委員的一時不察。其實國民黨要想再一次以臨時條款來破壞憲法，應敢做敢當的向歷史負責，不必拉黨外人士下水。黨外元老余登發，去年接受「生活與環境」訪問時說得對，黨外人士應督促國民黨實行三民主義和憲法。黨外從事民主運動者，應該了解憲法體制已被破壞，黨外目前所從事者當為恢復憲法體制的改革。主流派這次竟「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了。

黨外主流派的「國家基本法」，上了國民黨這次惡當，應該要有勇氣反省和檢討，應該拿出向人民負責的態度，宣佈取消「國家基本法」的主張，並反對破壞憲法的「臨時條款」，黨外所主張的應該是一部完完整整的，不打折扣的憲法！

其次，據報導，關於目前送往立法院審議的「選罷法修正案」，執政黨已經於三月二十八日召集立委及行政部門有關人士開會討論，行政部門堅持下述四項修正原則：一有關監委選舉改採限制連記法。二提高候選人學歷限制。三禁止期前活動。四限制競選經費。雖然有些黨籍立委並不完全同意上述之修正原則，但內政部長林洋

港堅持甚力，結果會議採納了行政部門的主張，要黨籍立委執行會議的決定，在立法院舉手通過上述修正案。

國民黨的這種作風，證明了國民黨並沒有吸取到上次通過「刑法修正案」的經驗與教訓。也許，上次壓倒性的表決通過，反而使國民黨得到鼓勵，認為只要掌握住一個立法院，無論什麼樣的法案，統統都可以通過。至於人民的不滿與吶喊，早已被勝利者的掌聲所掩蓋。

唯其如此，這一會期立法院法案的審議，為民請命的重責大任，只有落在黨外立委的肩上，黨外立委也應當慶幸自己成為歷史舞台燈光的焦點。

「選罷法」是阻擋民主潮流的惡法之一，隨着民主潮流的高漲，一次又一次的修正，也一次又一次的自暴其醜。

例如，監委選舉的限制連記法，由於黨外人士受選民的愛戴，在省市議會的黨外議員已有足夠的票數選出黨外監委，國民黨官僚一向為所欲為，最怕有真正盡責的監察委員。然而國民黨却說什麼是為了防止賄選，採連記法，「金牛」買票就買不動，然政府有龐大的情治機構，連幾個監委候選人買票都看不住，納稅人憑什麼養這些情治人員？再說，不管如何連記，監委當選的票數絕不會超過一個市議員，甚至於鄉民代表，普通議員競選都可以買票，多加幾張監委的當選票數就可以防止買票？請問林洋港自己相不相信？「民無信不立」！國民黨不如在「選罷法」上規定非國民黨提名當選無效，也就不必林部長去說這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話了。無論如何，我們相信最後表決的勝利是屬於國民黨的。但歷史的勝利將是屬於黨外的。

總之，在戒嚴令和臨時條款的統治下，為民主奮鬥是黨外別無旁貸的責任，而其命運却免不了是唐吉訶德式的，但是，黨外的奮鬥也不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要為天地留正氣，也要在廟堂之上為後代的子孫留下歷史的教訓。黨外立委們，其勉乎哉！

夏潮論壇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出刊

第一卷・第三期

發行人／柯水源

社長／黃溪南

總編輯／蘇逸凡

執行編輯／鍾喬

廣告顧問／進步廣告小組

編輯部／台北郵政第29-247號信箱

電話：(02)9144333

劃撥帳號／555202 黃溪南

零售／國內每册新台幣50元 國外每册美金2元

長期訂閱／國內：全年12期500元 半年6期280元

國外：航郵全年歐美地區美金30元

亞太地區美金26元

港澳地區美金20元

印刷所／翊豪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大路640巷30號

發行所／台北市泰順街59巷10弄12號4樓

北美洲代表／MR. JAMES NING

106 ROOSEVELT BLVD.

FLORHAM PARK, N. J. 07932

U. S. A.

美西聯絡處／MRS. San San Chen

2627 Hillegass# 104

Berkeley Ca. 94704

U. S. A.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第3474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0791號執照登記為新聞紙類

台北總經銷：

百全書報社 電話：(02)9245210

各地經銷處：

自強書局 電話：(032)224807

國華書報社 電話：(034)559853

大華文化服務社 電話：(035)228054

英華書局 電話：(037)320810

台中書報社 電話：(042)333363

嘉聯圖書社 電話：(052)324581

永茂書報社 電話：(062)234339

天和書報社 電話：(07)3829975

環球書局 電話：(087)323071

民生書局 電話：(039)323765

國民書局 電話：(039)543743

花蓮文具店 電話：(038)322941

紐約書局 電話：(089)322267

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目 錄

《社 論》為保護憲法與民主而奮鬥..... 封面裡
 —評立法院臨時條款和選罷法爭論

《讀者之頁》..... 4

政治經濟

《每月評論》 假釋政治犯的背景與條件 / 葉知秋..... 6
 唱不完的綠島夜曲 / 金鎮南..... 7
 不自由何來文化 / 石洲..... 8
 財團、政府鬥法，人民遭殃 / 柳不平..... 8
 質宋楚瑜局長 / 勞翁..... 9
 請將完整的歷史交給下一代 / 史公..... 10
 我和林洋港打賭 / 黃順興..... 11
 民主政治現代化的第一步 / 中國之春評論員..... 14
 文人不放過政治 / 鐘秦..... 16
 —訪孟絕子

慈 台大言論自由大辯論 / 本刊編輯室..... 19
 陳鼓應海外言論選輯 / 本刊編輯室..... 26
 今日台灣兒童..... 38

公害日誌..... 46
 殺人不見血的醫療廣告 / 思明..... 43

世界之窗

石油革命與南北制衡 / 侯立朝..... 47
 —石油降價彈性策略分析

日本消費社會的形成(中) / 犬田充・原著 / 金劍・譯..... 54

歷史與思潮

《歷史小品》「我就是帝國主義.....」 / 陳嘉..... 57
 日據時期台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連溫卿(1895~1957) / 彰生..... 58

藝文

《書 介》蔣勳詩集「母親」..... 37

第三世界文學新潮流
 —「殖民心態」清除之戰 / 南方雜誌・撰 / 孟祥森・譯..... 62

《電影廣場》電影與意識型態 / 陳國富..... 74

自立叢書

出版者：自立晚報

地址：台北市濟南路二段十五號

總代理：忠佑實業有限公司

■ 郵購一律九折優待 (不包括特價)

· 服務專線：351-9621轉262

· 劃撥：3180帳號自立晚報社

· 電話：393-6770

1 自立藝苑書畫選集

自立晚報編印
定價600元

自立藝苑書畫選集，係精選宋、元、明、清及近代時賢書畫、金石二百餘家、三百餘幀之代表作品，以八開銅版紙彩色精印精裝，足以存真，無論欣賞或珍藏，均具價值，共二〇八頁，定價六百元。

2 台灣民族運動史

吳三連等著
定價250元
特價200元

本書描述民國三年至民國卅四年之間，數百萬台籍同胞在日本殖民帝國統治下掙扎、奮起、衝刺以爭取民族尊嚴的一系列民族運動。將卅三年來血淚凝聚不朽的民族精操，萬千個烈士捨身鑄造的大漢尊嚴，詳盡完整的記載出出，共五六八頁，二十四開。

3 蓬壺擷勝錄(一)(二)(三)(四)

林 藜著
每冊定價 100元
合購四本特價300元

台灣又稱美麗之島，名勝古蹟遍佈，今所遺留建築多樸質可愛。本書作者鑑於台灣大陸血脈相連，不僅對山川景物普作指引，進而對文物因革，風俗民情善作報導，可視為採風問俗的經典之作，共八五七頁，二十四開。

4 法窗夜語(一)(二)(三)

吳啓賓著
每冊定價80元
三冊合購特價180元

吳啓賓律師以故事形態、深入淺出的方法灌注您與日常生活習習相關的法律常識，不僅可以培養國人守法的精神，維護個人合法的利益，對於違法亂紀者也有遏阻的效力，共四四五頁，三十二開。

5 吳豐山專欄(一)(二)

吳豐山著
單冊定價60元
合購特價100元

吳豐山專欄是國內唯一正式具名之長期性政治專欄，自六十四年迄今仍屹立不斷，以鼓吹民主法治和繁榮為寫作準則，常能言人所不敢言或不願言，對時政發揮相當影響力。現書已出版計第二冊，共四三四頁，三十二開。

6 替歷史作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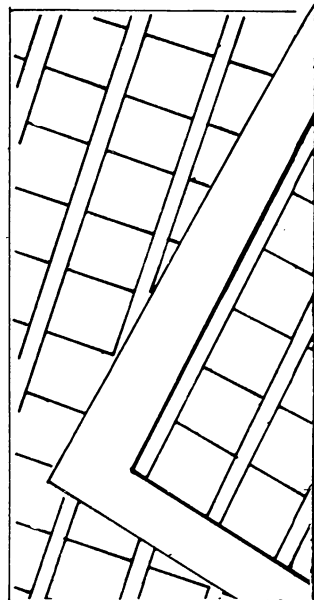
張忠棟等著
定價100元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在立院審議過程中，許多專家，學者踴躍地提出鞭辟入裡的見解，本報鑑於此乃輯各家之說，逐日整理成「替歷史作見證」以為這一代有良知、有勇氣的知識分子為維護人權所留下珍貴的記錄，共二四五頁，三十二開。

7 雷根小傳

章台生、林琳著
定價 60元

本書係中文版介紹現任美國總統生平最詳盡的一本，作者因此得雷根總統親函致謝。內容自雷根總統童年至大學時代、好萊塢生涯、州長任內迄三度問鼎白宮，皆有詳實報導，共一四九頁，三十二開。



● 訂價：國內每卷台幣100元 國外航郵歐美美金7元 / 亞洲美金5元 / 港澳港幣25元 (存書不多，欲購請從速。一次合購10本以上七折優待，五本以上八折優待) ● 郵撥帳號：555202 黃溪南帳戶 ●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信箱 ● 電話：9144333

買新“夏潮” 基金會 典藏 不要忘了買舊“夏潮”

——敬請珍惜民國67年舊“夏潮”第四卷、第五卷合訂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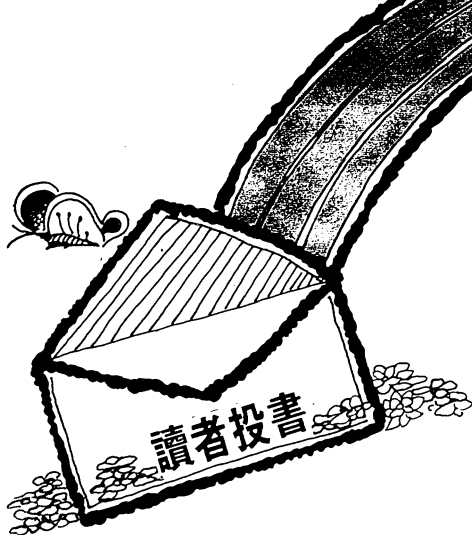
當您翻開這一本中斷了四年，爾後復出的“新夏潮”，請您不要忘了四年前“舊夏潮”波瀾壯闊的一年，就是那一年，文學界掀起了空前激烈、燦爛的大論戰——鄉土文學論戰，就是那一年，黨外開始了行動上的大聯合，就是那一年，中美斷交突然宣佈了，也就是那一年，新人輩出、洶湧澎湃的大選舉，中途停止了……而“舊夏潮”也就在那一年停刊了……。

“舊夏潮”第四卷、第五卷合訂本
第四卷中華民國67年1月～6月
第五卷中華民國67年7月～12月

要目：

1. 鄉土文學論戰
 王文興教授談鄉土文學的功與過
 論鄉土經濟與鄉土文學
 胡秋原論王文興 nonsense in sense
 中國人立場之復歸
2. 論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的歷史對照
 諍言給「聯合報」副刊
 為大老板服務的報紙
3. 黨外民主運動大採訪
 訪問康寧祥、蘇南成、康水木、余登發、黃順興、陳鼓應、周滄淵、張德銘…… 67年大選選情分析
 黨外民主發會報導

懷念舊“夏潮”，支持新“夏潮”



日本能，我們就是不能！

編輯先生：

據三月十六日中國時報報導，本省東部濱海漁場資源豐富，但最近不斷有日本漁船侵入盜魚，在設備、經驗俱優的條件下，無不滿載而歸。花蓮縣漁民希望政府迅加干涉阻止，勿使我國漁業資源平白拱手讓入。

讀到這條新聞，實在令人痛心。過去，我國漁船只要一駛入日本海域採取珊瑚，即遭日方緝捕，而日本漁船侵入我東部二百哩經濟海域，公然大肆捕漁，却如入無人之境，兩相比較之下，日人未免欺人太甚，而政府無能保障漁民的利益，相對地也叫人洩氣。

不久前，我們社會上甚為流行「日本能，我們為什麼不能？」的口號；我們希望政府振作起來，也派艦艇在東部經濟海域內加強巡邏，依法緝捕侵入捕魚的日本漁船，並沒收其魚貨。如此，才能在漁民心中建立起政府的威信；否則，一個不能保護其人民免於外人侵害的政府，又算是什麼樣的政府？

讀者 李水保

致湯鳳娥女士的慰問信

編按：三月十八日，宋長志部長宣佈陳鼓應先生在海外「媚匪」及參加台獨活動，若申請回國需接受法律「偵審」。三月廿六日，陳夫人湯鳳娥女士在美寓所服安眠藥自殺未遂，消息傳出，台灣親友大為震驚。本社接獲各方代轉之慰問函電，茲特摘其中一信刊出。

珊瑚女士：

聽說妳在美自殺未遂，我們聞訊大驚，忍不住心中的悲痛和無限的關懷。

妳對朋友總是那麼的熱忱，那麼的照顧別人，不斷的用妳的愛心來溫暖那些不幸的人。記得「高雄事件」時，妳曾勇敢的站出來，在廿四小時的跟踪下，在那整個台灣籠罩在白色的恐怖下，照顧那些受傷的心靈，為大家奔走，又安慰大家。今天妳遭受到橫逆，我們却因遠隔重洋而不能就近安慰妳，幫助妳。

雖然，政府宣佈妳們一家放逐海外的命運，也許妳們暫時不能再踏上這塊土地，但是，妳的熱忱和愛心却將永留在我們的心底，是什麼人都不能抹煞的。

珊瑚，妳是一個照顧人的人，妳是一個關懷人的人，雖然妳的身體瘦弱，但愛心却使妳的品格高大。妳不是一個弱者，珊瑚，站起來，勇敢的站起來！站起來把妳高大的身影投向太平洋彼岸的祖國！

一群關心妳的朋友 敬上

三月廿九日

誰來保障勞工的權益

編輯先生：

我們是一群勞工，以前也是「夏潮」的讀者，我們很高興看到「夏潮」復刊，希望你們秉持過去關心勞工的傳統，再接再勵。目前由於經濟不景氣，我們勞工的處境是更壞了，其中原因，「夏潮」編輯們應該很清楚；今天藉「夏潮」園地吐露心聲，一方面是聊表心意，另一方面也希望未來「夏潮」能加強支援我們勞工。

這次立法院開會，許多勞工朋友都非常關心「勞動基準法草案」能否提上去，但是令人失望的是，這個擱置了卅多年的勞動憲章，似乎還要擱置下去了。據說，大老闆們對於政府有關部門積極推動這個草案非常不悅，認為政府不照顧他們的利益。請問，我們的政府卅多年來對大資本

家照顧還不夠遇到嗎？不談別的，如衆所週知的，勞工用以迫使僱主就範的武器就是罷工，但是依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第五條規定：「各業勞資雙方應密切合作，如有爭議並應依法調節及仲裁，凡怠工、罷工、停業、開廠及其它妨礙生產及社會秩序之行為均應依法懲處。」看，在戡亂時期戒嚴法實施之下，我們勞工被繳械了！請問大老闆們，這不是政府對你們的「大德政」嗎？我們雖然被繳械了，但是依法勞工有權組織工會，但是也如衆所週知的，多少勞工朋友爲了要組織工會而受盡壓迫！最近報上曾報導一位在桃園的勞工朋友因爲組織工會受到委屈，憤而自殺，這並不是偶發的事件，相信大老闆們最清楚。許多勞工朋友雖然在排除萬難之下組織了工會，但都很失望工會變成跛腳工會，不良於行。沒有「罷工」武器再加上工會欲振乏力，也難怪在現行法可依循的制度下，不論是經由勞資爭議處理法，透過爭議當事人聲請調節，提付仲裁，或依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法，由勞資評斷委員會審決，我們勞工總是處於被決定的地位，難以取得對等的權力。卅多年來我們勞工界就是這樣奉獻、犧牲了！但是如今面臨可怕的蕭條，我們勞工處境之不堪已到無法忍受的地步了！寄語當局，「勞動基準法草案」再怎麼修訂，都要維持最低限度的道德性，不要使它變成強者的有利武器，徒增一惡法！

敬 祝

編 安

一群勞工朋友 敬上

青少年是國家棟樑

編輯先生：

青少年是國家棟樑，是將來社會進步的希望，我們這一代沒有任何理由摧殘他、毀滅他。

最近看到對少年犯罪判刑比以前重得多，動不動就是七、八年十來年，而槍砲刀械管理條例又要立法。好像對這一代青少年非趕盡殺絕不可。我們希望政府能找出青少年犯罪原因加以疏導，使他們在讀書之餘有一個正當發洩精力之場所，使他們知道父母是爲了全家的生活在忙碌，不是不關心他們，而政府也應該知道他們的思想尚未成熟，在發洩剩餘的精力時難免發生錯誤，政府應該多關懷他們。實不該動不動就用刑罪來嚇阻他們、懲罰他們，社會大眾更不要因他們一時的衝動犯錯，而以異樣的眼光對待他們。對社會上因犯罪而誤觸法網的人，絕不可以復仇嚇阻來壓制。法官應知道刑罰是一種教育，而不是嚇阻和報復。

近年來時常聽林洋港部長主張嚴刑峻法可以治亂世，實有檢討的必要，因爲現在的法，已經有人認爲多如牛毛了（包括林部長在內），也夠嚴厲的了，但犯罪還是越來越多。是以，牛毛多表示牛健康之說是很難成立的，爲了我們的國家，爲了我們的民族及下一代，別再恃勢奪理了，我們應爲少年留點希望！也爲自己留點德性！

讀者 劉俊琳

夏潮徵求贊助性榮譽會員

夏潮愛大家

大家愛夏潮

“夏潮”又出刊了，開始了再一次的漫長新征，在這次艱辛的征途上，夏潮需要您——需要您的精神鼓勵與財務支持。

只要您——捐贈五千元（海外朋友美金二百元），您就成爲夏潮的榮譽會員，您就可以成爲夏潮的永久性訂戶，更是夏潮的永恒之友。

榮譽會員郵撥帳號：555202黃溪南 帳戶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信箱



假釋政治犯的 背景與條件

■葉知秋

農曆春節過完不久，報上便大幅地報導政府假釋囚禁達三十餘年的政治犯，計有謝秋臨、王永富、李國民、吳約明、王為清等十人。報上如是寫道：「半甲子光陰飛逝，父子會喜極而泣」，言下之意，彷彿囚禁人的不是執政政府，而獲釋歸來的，倒像是大陸同胞投奔自由與在台家人團聚呢！更荒謬的是：記者們以興奮無比的口吻寫道：「感激政府寬大，誓將重新作人。」我們真是不知道這批政治犯要從何感激起，感激他被囚禁了三十餘年，半甲子光陰，一萬多個日子嗎？還是感激自己猶能生存至今？還是感激有人賜給他三十幾年去反省思過呢？如果真是有人「感激」，那就更不知道是誰比較寬大，誰比較能原諒對方了。

然而，存在於假釋的背後，却還有許多值得

探討的問題。質言之，即是政府為什麼三十幾年來，不願依法辦理假釋，却直到今天才初步試辦呢？其背景何在？條件何在？又為什麼政府僅願意釋放十個人，而留下十三人在綠島，其作用何在？為什麼他放了這十人，而不是其他十三人呢？他選擇的標準又何在呢？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根據報紙反映，此次依法辦理假釋，中國人權協會居功甚鉅。然而早在去年年初，立委蘇秋鎮早已提出質詢了。但直到七月中旬，人權協會理事長杭立武才偕同立委林鈺祥、監委王爵榮等人赴綠島實際了解。時間上早已慢了許多。據傳當這一群官方代表望着眼前據說已囚禁了三十幾年的受刑人，聽着他一字一句慢慢地說：「我已經被囚禁了三十二年，足足有餘了。」他們才訝然驚異地注視着眼前的這個人，上下打量不已，彷彿見到了外星人一般。由此可見中國人權協會在人權上的努力與主動性有多微弱了。外傳的此一官方機構之保守和官僚，怕是不爭的事實吧。

最初，執政黨亦極不願意承認此一事實。「絕無二二八事件受刑人。」官方在立委質詢時如是答覆。但是稍稍了解光復後十年間事的人必然會了解到，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的涉牽者大多已然不在人間。而三十六年後以迄於四十二年之間，才真正是大整肅，總清理的時期。當時檢舉有

唱不完的「綠島夜曲」

■金鎮南

早期的台大沒有校歌，後期的台大校歌難唱，於是當年的台大校友喜歡唱自己的歌，譬如：望春風、還有綠島小夜曲等等，就是不知現在的台大同學還唱不唱這些地下校歌？

最近有關單位難得良心發現，釋放了幾位關在綠島長達三十多年的政治犯，隨着他們的活著返鄉，預料綠島夜曲的旋律又將迴盪在這許多受苦受難者的靈魂深處，勾起多少刻骨的傷痛？

細數三十多年來，一批又一批政治犯的漫漫囚禁生涯，換來的卻是國民黨即興奏起的返鄉曲

這一闕即興式的返鄉曲，透過御用傳播媒體的渲染僅僅呈現兩個單調的主題：其一是歌功頌德，其二是猛送人情。

據報導，這一批共計十八位被囚禁綠島三十年以上的政治犯都將陸續分批返鄉，經求證其中有精神錯亂者，有雙目失明者、還有潰瘍、風濕、氣喘等諸症雜陳，總而言之雖然剩下的不過皆是些老病殘軀，但是畢竟還是活的，所以這一番功德必然歸諸國民黨，而人情卻送給了杭立武的「中國人權協會」。

任何睜眼的人都明白：自從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人士不論是在各級議會、還是報刊雜誌無時無刻不在為政治犯奔走呼號，請求特赦、假釋與減刑，良知未泯的專家學者以及地方正直之士亦街頭巷議力促其成，然而多少年來國民黨面對

獎金，破案有獎金，再加上司法制度蕩然幾至無存，軍法却處處通行，因此審判的公平與公正是極有待商榷的。換言之，此時尚在綠島服刑的政治犯、思想犯根本是三十七年至四十二年間，涉案較輕微者（嚴重者早經死刑槍斃了）。再加上監禁期間，亦有人因獄中表現有問題，又重審，又改判死刑或加判徒刑等等，因此，目前的受刑人可說是劫後餘生苟全性命的僥倖者了。

自此看來，若非立委之不斷質詢，因而引起輿論的注意以及國際視聽的矚目，並且若非名單確鑿，事實俱在，執政黨是不願坦白承認此一事實的。由此也可見，人權不是握在執政政權的給予或不給予，人權唯有靠人民共同去爭取的。這也正是國民黨在三十幾年來一直有意地忽略掉這些囚禁半生的人，而不願釋放，却直到今日始行依法假釋的原因。

然而，此次依法假釋者却只有十人。為什麼呢？事實上在獄中病得比這十人更嚴重，身體更顯弱者仍大有人在。若依人道的考慮，應當先由更衰病的人釋放起。但是事實却非如此。因而所謂「人道」的背後，自然也隱埋了國民黨之深沈的謀慮在。質言之，即是政治的謀慮。

據傳此次釋放者大多是囚禁期間較溫良馴順者。並且在他們即將出獄送返台灣時，獄中難友曾互相囑告說：「出去不要多說，免得引起太多

反應，往後的人便會出不來了。」因而，當假釋者面對報社記者訪問時，說出「感激政府寬大」的話語時，便不足為奇了。因為在他們言行之時，猶要背負起獄中難友能否釋放的責任。換言之，國民黨之所以保留十三個人，除了怕一次釋放引起太多震盪，以及受刑人言行之考慮外，恐怕猶未釋放的十三個受刑人正是他握在手中的王牌，以做為限制假釋者言行的一種把柄呢！

就此次釋放的過程看來，國民黨早已料到必然會引起輿論的注意，而暴露此一極欲掩埋的不人道事實，因而選擇在春節前後釋放。並且為着怕引起震盪，先釋放十個人，因其較為馴順，故震盪不大。再其次手中亦握着十三張王牌，為難友考慮，獲釋者也必須謹言慎行。如是震盪可降至最低，往後，再行釋放其它十三人，便不至於再引起輿論太多的注意了。

這樣，用人道的話語以掩飾不人道的事實之過程，乃昭昭若揭了。

然而這根本就是國民黨之多慮所致。事實上，那些政治犯早已體弱多病了。普遍患胃潰瘍、高血壓、糖尿病之外，更有四人已然精神失常。若欲有任何政治活動，以六、七十歲之高齡，再加上囚禁了三十幾年，與社會又隔絕一致於此，怎麼可能呢？因此，國民黨大可放心地釋放這些人了。

滔滔輿情與濤濤公意皆作太上忘情狀，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如今即興式地放出幾位老病殘廢，卻將此番似乎天大的功勞統統歸諸杭立武一人所有，相信此時此地從事民主運動者應該都有勞而不有、功而不居的起碼胸襟。環顧三十餘年冰涼的政治現實，善良人民要的只是一點點公道罷了，所幸國民黨心血來潮剛剛開始有了稍稍人道的舉措，吾等皆宜焚香祝禱，感謝上蒼的仁慈，又有誰膽敢居功？

再來默察，國民黨御用工具們乘此熱潮所歌頌的對待政治犯的恩情，似乎有千百種，我們只提其中最動人聽聞的三兩種，看看記者先生如何刻意的撰寫：說是有位綠島返鄉的政治犯在家人為他安排的慶生宴上慨歎「獄中雞鴨魚肉吃厭了，只想吃青菜」。另一位則誇讚牢中的套房以及個人專用的現代化衛浴設備，還有的卻在醉心描

述牢獄中的藝術生活，譬如：潛心研究攝影技術、又配得一架德國製手風琴以寄託情懷云云……

對於這一切我們姑且都信以為真，但也有兩句肺腑之言敬告國民黨當局：只要有心善待政治犯，人情不妨猛送，功德定要做得圓滿。

所謂今日國民黨的最大功德也者，就是不再一案接一案的羅織捉人，而要一批又一批的放人。讓所有的政治犯也好，「叛亂犯」也罷，都能夠活著的、健康的、正常的走出牢房，從此綠島不再是火燒島，不再有無數的女人在曠野裏悲歌「望君早歸」。

爾今爾後，願我們大家都能在燦爛的月光與星光下，歌唱歡愉的「綠島夜曲」，夜曲裏有歌不盡的美麗寶島，而不再聞台灣命運的哭調。

不自由何來文化

■石洲

前不久，坊間的書肆曾出現一些盜印版的文學書刊。個中以三十年代的文學創作（尤其是小說）最多，大部份都不涉及政治或國共鬥爭歷史。然而不久，却傳來書商因販賣盜版書而遭逮捕的事，於是坊間又歸於一片沈寂了。

查禁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始於國民政府遷台之後，當時的台灣早已有部份大陸的作品印行於世，然而一九四九年後，便告全面禁止了。在政權興替的同時，也有許多怪異的現象出現，諸如：本屬抗日歌曲一變而為禁唱，本屬公認的優

秀作品，一變而為禁書。此種現象，說明了政治力量的無所不在的控制，却也給人極其荒謬不堪的觀感。

一九四九年後，台灣的文化遂因此出現一個大斷層，許多優秀作品或研究，常因著政治因素而禁止出版。再加上許多台灣本土作家無法馬上改以中文寫作，因而作家群中僅有大陸遷台者。在這種環境下只有兩種文學：一類是故國神遊八股，無非是回憶北平的雞鴨鵝、南京的山水，再加上幾聲江山景色的喟歎罷了，（至今仍然有某些作家在台灣大談他三十幾年前吃過的羊肉雞翅之類的，可說是餘韻猶存）。另一類則是反共八股，至今我們仍可以在中央日報、青年戰士報上看見。這種風氣一起，便是十幾二十年，遂形成文化上的斷層。因而在五十年代吹起的現代主義黑旋風，乃至於那些虛無、夢囈、色情等等，若

財團、政府鬪法， 人民遭殃

■柳不平

台北火車站對面，希爾頓飯店旁的廣場，因周武公司投資興建大廈，佔用人行道，嚴重妨害每日來往該處、數十萬人次市民「行」的權利，已普遍引起各界的「關注」。去年，曾有報章雜誌援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和建築法施工管理條例，對建造單位提出控訴，並呼籲政府應確保法律賦予行人的公共權益，但遲遲不見改善，問題照樣存在下去。

據瞭解，該廣場原係各私人遊覽車的會集地，民國七十年，由於政府頒佈對私有空地限期興建的命令，結果各處的空地都如期在九月廿日以前開工。當初政府的用意是，藉此道命令來遏止財大氣粗的地主炒地皮，獲取暴利；殊不知大財團（如亞信、周武等公司）挾其雄厚財力，買下這塊價值數億元的地皮，準備坐享增值，乃至限建令下，隨便花數千萬元挖個地基，應付應付政府的法令。結果，在工地附近搭建起鐵板圍牆，甚至把人行道完全佔用，使得原來佈滿密密麻麻的公車站牌下的候車者全無立足之地，再加上計程車盤據慢車道攬客，逼得公車只好在快車道上停靠，車未停妥，乘客便一湧而上，亂成一團，

尤其在雨天，更是險象環生，令人不忍卒睹。顯然地，這是財團和政府鬪法，而升斗小民飽受魚池之殃！

該廣場在基礎工程竣工之後，曾因經濟不景氣，遂假「變更工程設計」為名，「變相停工」長達半年以上，但在鐵板圍牆附近的交通問題，依舊不見有關單位加以改善。今年三月中旬，該大廈的地下室及地上結構工程才開始動工，可預見的，廣大市民「行」的權利勢必再被剝奪一段漫長的日子。據熟悉內情的人士指出，按北市建築管理規則規定，五層樓的施工限期為一年，六樓以上每加一層增加三個月的工期，而該廣場大廈共計卅二層，完工日期可以長達七年多，換句話說，在民國八十年以前竣工即不違法。如此一來，每日經過該處的行人和候車者，將伴隨著七十年代而飽受「行路難」的苦楚，同時必須長久地面對「交通事故」的威脅！

我們一直困惑不解，有關單位為何坐視廣大市民「行」的權利和生命安全於不顧？財團投資興建大廈獲利，市民却因工地佔用人行道受苦，有誰能為市民蒙受的侵害申訴？是誰該負起管理的責任？寄語有關單位，儘早提出改善措施，否則等到受苦受難的市民忍熬不住，採取集體行動時，屆時再作「亡羊補牢」的努力，或許為時已晚矣！

將之置於歷史的環境來考察，也就不足為奇，都無非是現實政治箝制下所生出來的畸形兒吧了。

然而曾在中國大陸革命北伐，甚至曾執政一段時期的國民黨本身，却無法斷然割決這些歷史的事實。因而以批判甚至人身攻擊的方式，大肆批判了三十年代的作家與作品。然而歷史終究是無法磨滅的，何況僅有批判而無原文可看，批判亦失去意義。因此三十幾年來，舊書攤中不乏有心的尋索者，而翻印之風亦且藕斷絲連，難以斷絕。

翻印三十年代作品者亦皆非有政治企圖或思想者，反而是一些小本經營的商人在利之所趨的吸引下，不惜冒險而行。據筆者所知，一本翻印書的成本若是五元，則市面價格約略可賣到五十元，可見其利潤之高，也無怪乎商人甘冒風險了。而購買者在無書可看的情況下，再貴也會買下

來。尤其研究文學的學者教授、學生青年更是趨之若鶩。

然而，不僅止於文學而已，研究歷史的學者，更必須要參考大陸新出土的文物，以作為研究歷史的經濟、社會、制度、生活等的資料。換言之，若一味地禁絕大陸的任何訊息與資料，則歷史的研究亦恐因此停頓。也因此無怪乎許多學者不惜冒著被沒收的危險，挾帶書籍進口了。

在這重重的限制之下，再空喊著「精緻文化」的口號，不免令人覺得荒謬，甚至是可笑了。因此，我們可以了解，沒有言論自由、閱讀的自由、討論的自由，哪有文化可言呢？

我們也在此呼籲政府儘速開放三十年代的書籍，以彌補文學與文化上的斷層，同時也適度開放純學術研究的書籍進口，以補研究資料之不足，或許我們才可能慢慢走上文化大國的道途吧。

質宋楚瑜局長

■勞翁

宋楚瑜局長最近提出「是中國的歸中國，是中共的歸中共」，其實這是大家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識。只是在國民黨長期的宣傳和政策下，把中國與中共不分，而有勞宋局長此時提出呼籲。然而，宋局長的呼籲是否能兌現，大家仍不免有些懷疑，理由如下：

一大陸國土、長江、黃河是屬於中共的，還是屬於中國的？為什麼國民黨口口聲聲宣傳那是「匪區」呢？為什麼連公開反對中共制度的詩人高準參觀了一下長江、黃河，就不准再回台灣？

二當歸、銀耳、蓮子、黑棗及許多中藥藥材都是中國特產，請問該歸中共，還是歸中國？為什麼國民黨稱其為「匪貨」，而不准台灣老百姓享用？

三政府遷台以前許多大陸作家和學者並不是共產黨員，他們的著作都是現代中國文化的財產，是屬於中共，還是屬於中國？為什麼國民黨視其為「匪書」，而不准台灣老百姓閱讀？

四許多外省同胞在大陸的親人，是「匪人」，還是中國人？他們有些現已逃離了中共控制，

除了「反共明星」外，為什麼林洋港部長却說不准他們來台灣？

五中共統治大陸後，重新劃分行政區，這是中共的政策屬於中共，但是，鐵路、公路和橋樑却是老百姓的血汗建造的，就如長城是中國的古文明，並不是什麼秦始皇的，為什麼台灣的教科書對大陸新建的鐵路、公路、橋樑略而不提？

六大陸同胞十億，中共黨員不過四千萬人，中共尤其敵視知識份子。即使中共統治大陸後，還有許多學者和作家，他們的著作屬於中國，還是屬於中共？如屬於中共，豈不「中共即中國」？如屬於中國，為什麼台灣也查禁？

七「中國之春」雜誌是大陸留學生在海外辦的刊物，試問屬於中國，還是屬於中共？為什麼台灣同胞只能訂贈大陸同胞，而不能自己訂閱？

八大陸人民創作的藝術，如音樂、美術等並未對中共歌功頌德，該歸中共，還是該歸中國？為什麼在台灣禁止有大陸作品在內的畫展？

所以，造成「中共即中國」的錯誤印象的不是別人，正是國民黨自己。宋局長說「是中國的歸中國，是中共的歸中共」，是對的。但說是要以此糾正國際觀感，却是倒果為因的說法。正本清源，該糾正的是國民黨自己的宣傳和作法才對！不知宋局長以為然否？

請將完整的歷史 交給下一代

■ 史公

去年日本文部省為復活軍國主義而竄改其侵略史實，並且，涉及明治以來對朝鮮、台灣、琉球的殖民史。因而，引起全球性的譴責，尤其是身受其痛的東亞各國。在巨大的國際輿論壓力下，終於使得日本財閥與官僚復活軍國主義的野心暫時挫折，不得不承認錯誤，並且承諾修正被竄改的部份。

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與否，除了主觀的願望外，還有客觀的經濟、社會、政治甚至文化的因素。今天日本是謂「金權政治」，自民黨內派閥的起伏是以前所能取得的政治資金為根據的。田中角榮自「洛克希德案」之後，惡名昭著，但是以其政治資金之雄厚，至今仍為自民黨內的主流派。街頭的示威，要田中辭職，也不過是「蚊子叮牛角」或「狗吠火車」而已。

雄厚的政治資金當然不是小老百姓所能勝任的，而必須是要有大財閥解囊相贈。大財閥以政治資金相贈，與台灣黨外選民的一百、二百的樂捐不同，那不但是政治投資，而且也是經濟投資。於是，大財閥用這種手段控制日本的政治，使日本的政治為他們的經濟利益服務。

當日本財閥的經濟利益，不斷向外擴張，而受到其他國家抵制或抗爭之時，以武力推行經濟擴張的手段，就會變成必要了。這是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發展的軌跡，戰後日本的經濟列車似乎又走上了這條鐵道。這才是日本竄改侵略史，企圖復活軍國主義隱密而又真實的原因。

以明治後日本對外侵略的歷史而論，一旦日本發動對外侵略，其第一步是琉球，第二步則是朝鮮、台灣。經過七十年代，現在日本已經又取得琉球了，而我們又無法干涉日本內政，為其經濟列車利車或改道，但基於上世紀來的歷史教訓，我們不能不擔心這輛列車一旦脫軌，我們將又要變成車禍的受害人了。

也許是懷於以上的考慮，最近韓國也修改了歷史教科書，並且承認：戰後韓國基於與日本經

濟上的「友好」關係，在歷史教科書中，關於日本統治韓國期間的歷史敘述得不夠完整，不能讓下一代有足夠的歷史教訓。修改後的歷史教科書將提供下一代完整的歷史，而能有充分的歷史教訓。

人不能預知確實的未來，但總是根據以往的經驗，企圖達成自己的願望。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也是人之所以要研究歷史的原因。

韓國以往未能在歷史教科書中提供完整的史實，而使下一代有充分的歷史教訓，這是韓國政府未脫當年殖民地時期陰影的心理反映。而今能修正，亦正「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台灣與韓國曾有同為日本殖民地之命運。去年有立法委員組團訪日，曾提出有關竄史之抗議，據說日本有關人士則答以「你們應向台灣當局抗議才對」。因為今日台灣的歷史教科書中，有關日本侵華的部份，其簡略更甚於竄改後的日本教科書。夫復何言！

我們可以不必再追究朱滙森部長的喪權辱國之言，但是，至少要如韓國，在我國的歷史教科書中應有完整的日本侵華史，更甚者，或許政府可以對日本之侵略「以德報怨」，但是，至少有關台灣的部分，台灣子弟有權知道。在日據時代，日本人剝奪了我們知道自己歷史的權利，光復後，我們也不敢對政府有任何其他的奢望，但至少政府應該有責任把我們台灣先人英勇抗日的這段歷史完整的交給我們的下一代。

**夏潮的朋友
請您來投稿**

—夏潮徵選精簡有力的短篇小說創作—

夏潮所需要的短篇小說
是社會寫實的、批判的、各階層的，
夏潮所需要的短篇小說
最好是五千字到八千字之間，
不長不短，不多不少，
只要是好小說，
夏潮將致一字一元稿酬。

(請於信封上註明
「小說徵選」字樣)

投稿請寄：夏潮雜誌社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信箱
電話／(02)9144333

我和林洋港打賭

■ 黃順興

本屆立委還有三分之一任期。但自立春以來，有意參加本年立委選舉的準候選人們，已經忙著到各個選區活動佈署了，敏感的人都可以嗅聞到那暗中熱絡緊張的選戰氣味了。

近年來，每逢選舉將到，政治氣氛便會驟然緊張起來，究其原因，並非選民大眾期待著選舉會有什麼大變局發生，而是平常時遭受著莫名其妙的政治低氣壓所形成的集體壓抑，想藉著大規模的選舉活動，趁機透透氣罷了。

其實，處於(1)無限期戒嚴令下，(2)不准組黨、不准集會、遊行……，(3)嚴厲的報禁、雜誌查禁下，(4)黨庫通國庫，(5)國軍即黨軍，(6)黨政不分，(7)司法審判無法獨立，(8)不合情理的選罷法——選舉事務和選舉監察無法由各政黨及公正之社會人士共同督選……的種種箝制下，與一面倒的一黨獨大政治環境下，若想希求選舉的公平性、公開性、公正性，不亦緣木求魚。雖然如此，却有愈來愈多的無黨籍人士前仆後繼地參與選戰。究其原因，絕大多數乃是懷抱著傳承與啓迪民主認知的使命感所致，黨外參選者若具備如此共識與志向，當不會目光如豆只計較選舉之勝敗了。

四不像的選罷法

六十九年頒佈的選舉罷免法，原本就是一部三不全的法典。三年來，各界輿論不斷呼籲當局，期望有較合乎時潮民情的改正。現在行政院已通過修正草案送交立法院審議，將來在黨籍立委舉手如儀的形式下，結果如何是可想而知了。

從修訂選罷法草案以及中央黨部十二月廿三日發表的提名方針，可以窺見執政黨對年底這場選戰的基本策略——在獲取大勝的大前提和唯一

前提下，千方百計透過修訂法律條文，進一步限制無組織的黨外候選人的競選活動。例如：非登記在案的助選員不得為候選人分發傳單、減少宣傳車輛、限制期前活動、規定競選經費、並設冊登記捐助人的姓名以備查閱、以及將來監委選舉改為限制連記法……諸如此類不合情理的規定，任憑當局如何辯說，終究騙不過頭腦清楚、眼睛雪亮的人民的。

離年底選舉還有八個多月，而國民黨的提名作業却早已開始，最遲七月間就會發表人選，在這期間黨內陸續反應下級遴報的準候選人名單，因此我們經常可以在報上看到這些準候選人的名字和他們的學經歷介紹……，現在已是如此，到了正式提名階段，大眾傳播界將以更大篇幅、更多時間來發表，推薦這些黨籍候選人，是可想而知的熱鬧的。試問，明定法律的黨政諸公，這些行為算不算期前活動？算不算選舉宣傳？

再者，國民黨地方黨部可以為黨籍候選人舉辦模擬政見發表會，開放給一般民衆聽講，這是不是也算期前活動？(同樣的活動，若是由黨外人士舉辦，勢必遭受鎮暴部隊的關照)。更甚者，選戰期間，偶有老百姓為黨外人士說幾句公道話，即遭有關單位人員盤詢、干擾，那麼公開為黨外候選人捐助經費，其後果將會如何，更是不難想像了。由此可知，規定公開捐助者的姓名，其用意乃在嚇阻黨外的金錢支持者，欲使黨外候選人無論在選舉活動上或經費來源上都更加束縛、更加孤立、更加無法與財大勢大、組織大、宣傳大的執政黨一較長短。

至於分發傳單一事，明眼人都心裡清楚，黨籍候選人有龐大組織網可以動員，可以排山倒海地為他們分發傳單。而選罷法修正草案却規定只

有登記有案的助選員才有資格分發傳單，這不是存心扼制、打擊黨外候選人，又是什麼？

執政當局的幾位決策人士却聲稱設立這種種限制的目的，旨在防止金錢和暴力介入。對於這種睜眼說瞎話的詭辯，我願拿我牧場的所有豬隻與決策者之一的林洋港先生打賭，屆時金錢和暴力的介入只有更加有恃無恐，不會減輕絲毫。

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然而往例歷歷可鑑，不管法律如何規定，如何限制，國民黨却儘可逍遙法外，上天入地施展其當家技倆。而黨外候選人則動輒得咎，動彈不得。在這種順我則昌、逆我則亡的一家遊戲中，國民黨的又一次偉大勝利自在預料之中。對於這種現象，曾有人打趣說：黨外人士和國民黨競選，就好比一個手無寸鐵的小孩和手持卡賓槍的大力士比武一樣，除非奇蹟出現，否則勝負如何已昭然若揭。

然而，良心未泯之士不免要問，如此實力懸殊的不平等競賽，豈算競賽？因此而獲勝的大力士豈算真正獲勝？豈有任何光榮可言？

惡法亦法，不說亦罷！願在此勉勵英勇的黨外人士——參選的意義就在參選本身，而非當選與否。

單項選舉與投票率

今年底，只有立委一項選舉。從以往的經驗可以知道，單項而且又是與基層選民關係較陌生的中央級選舉，其投票率向來都是很低的，能有四成以上已算不錯。但也有例外，若遇做票或買票，甚或做票、買票雙管齊下的時候，投票率便會高到嚇人聽聞的地步，甚至高達百分之百以上，因為有人替死人冒投選票啦！更巧合的是，投票率特別漲高的場所，往往是黨外候選人獲票率奇低的場所。

依目前情勢觀察，今年年底選舉依舊是國民黨的金牛群和「雙手兩中薑」（意謂兩手空空）的黨外人士競賽的局面。除非那些金牛候選人的支票都跳了，都破產倒閉了，可想而知，暴力也仍將大肆介入。暴力之於選舉，猶如蒼蠅之於髒物，難分難離，這是台灣特殊的政治環境演變下的必然產物。國民黨為了鞏固政權，永遠一黨領

先一黨獨大，固不得不以「當選」列為最優先考慮，致於如此不擇手段以求全勝的種種社會後遺症，自是無法顧及了。

黨外又要苦戰了

前面說過，年底的選舉既是單項，而且「金錢和暴力」的介入又勢必難免。果如此，即將參選的黨外人士應覺悟，除台北和高雄兩大都會外，其餘的廣大鄉鎮市選區恐怕又是一場艱苦的戰鬥。因此，要想在未來的立委選戰中獲取較好的戰果，勢非提早作好協調不可。因為是單項無法分項參戰，若一夥兒混戰勢必分散有限的黨外票源，結果是自取敗績。依我看，近兩年來的真正堅定的黨外票源（買不倒、嚇不著者）並未大幅增加，因此唯有集中力量才能保持既有成果。話雖如此說，一盤散沙的黨外陣容，既不像執政黨能夠坐地分贖，又無黨組織、黨規律可以約束成員，要想運用協調方式來公推人選，真是談何容易？縱使困難重重，但是我還是要呼籲所有黨外候選人，拋棄私利私慾，大家和衷共濟，團結一致。

民主的最後一道防線 ——「尊嚴」

民主自由的制度，是要靠許許多多熱血和生命的犧牲，以及經年累月的持續奮鬥和爭取方能逐漸實現。然而，假若作為國家主人的百姓們不能堅守自己的尊嚴，而隨便將民主的最後一道防線一選票一賤賣出去的話，那以咱們偉大先輩們的熱血生命換取而來的點滴民主成果，也將在一夜間的金錢攻勢下潰滅無餘。

反正誰來管都一樣，反正投給誰都一樣，反正誰送錢就選誰，反正誰送的錢比較多就投誰，……每當我聽聞諸如此類有關選票交易的談論，我就不禁懷疑自己的耳朵，久久不敢相信這種廉價出賣尊嚴、出賣靈魂的勾當竟然會在我所熱愛的同胞之間進行著……。

台灣光復早期的選舉，還甚少聽到買票賄選的醜聞。那時候，參選的黨外人士因為被「做票」而吃敗戰的情形雖然也常常發生，但那種打擊

遠不如近幾年買票之風盛行所帶給黨外人士的心理和實質的打擊來得深重。因為做票畢竟是單行道的強盜行爲，對付這種卑劣行爲，只要大眾明白真相並有解決問題的決心時，情況就有獲得改變的可能。可是買賣選票却是雙行道的交易行爲，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問題就沒那麼單純了，更何況還有一個强有力的勢力在背後慫恿支持哪！

買票歪風何時了

前面提到賄選對於腐蝕民心尊嚴較之做票的害處來得深遠慘重，但並不是無藥可救，從六方面來看：一爲民主的國民教育；其二，經濟不景氣引發的自然淘汰，使部份有錢而投機的候選人無錢可買票；其三，執政黨自清拿出良心誠意來，不再提名並不再支持賄選慣犯的黨員；其四，凡賄選者不論黨內外徹底法辦；其五，選民全面自清，絕不投賄選者的票；其六，公務機關不再賣特權份子的帳，使投機的民意代表無特權之利可圖。

買賣選票行爲，從短程觀之，的確對黨外相當不利，但若從長遠處視之，却緩慢但深刻地腐蝕了在朝黨的黨基。因爲在那些經由買票而當選的金牛黨員的心中，只有一個利字，求官謀權之最終目的也僅僅在於利之所繫，什麼黨的精神、黨的尊嚴、黨的規律、……根本不存在他們的心中。結果弄得黨內離心離德，人人爭相求利奪權，置廉恥、正義於不顧，黨倫豈有不腐化？黨基豈有不動搖的道理？

吾人愛國愛民主之餘，不得不說一句良心話，今日台灣暴力與金錢介入選舉的結果，雖會給國民黨帶來一時的勝利的興奮，但從長遠後果看，却是對執政黨最爲有害、最爲不利的。

黨外應盡一份歷史責任

身爲黨外民主運動者，不參與現實政治即罷，既要改革政治，對於現今選風之劣敗卑鄙至如此地步，應深深反省探討，爲什麼我們所依持的鄉親父老面對金錢的誘惑，竟是如此脆弱不堪？從光復以後，也近四十年了，爲什麼連這麼一點做主人的基本自信、自尊都學不成，不但學不成

反而日漸喪失、日漸扭曲？這個問題值得所有從事黨外民主運動的鬥士們深思。

好幾年前的事了，當張俊宏先生在台北市競選市議員失敗後，有意返南投故里競選省議員時，曾向北市的六位黨外先輩徵詢意見，其中竟然有五位先輩潑他冷水，這些前輩勸告張先生說：鄉下多愚民，不知好歹，像你這樣的高級知識份子在這個有知識份子之都的台北市都爭不到一席之地了，到鄉下去還能混嗎？

張先生特地爲此事跑來溪州豬場找我，要我爲他準備回鄉競選一事表示意見，我立即由衷地表示贊成，並且告訴他這才是農村出身的知識份子應該做的有意義事。之後，張先生希望我爲他那本爲競選而寫的書寫序，當時我所寫的旨意，也就是勸誘地方父老們用選票來歡迎、鼓勵出鄉關的學子返鄉服務的一些話。

至此，我又不由得想起一樁老故事來了：日據時代有個鄉下農民的獨生男遠渡日本求學，後來獲得學位，並娶了一位美麗的日籍太太，當他們衣錦還鄉，抵達台灣故里的車站時，他的夫人問起那位前來幫忙提行李的赤腳老人是何許人時，這位學士先生竟然介紹老人是他家的傭人（老父不懂日語）。

我相信今天此地再也沒有將老爸說成傭人的學士先生了，可是如張俊宏先生所說的那類知識份子是否絕跡了呢？

台灣之所以有今天的起飛的經濟，應感謝不識字的老農爬地耕種辛苦養育兒女，供應他們求學獲得學位，爾後從事工商業或替資本老闆設計賺錢之功。

今天台灣的繁華都市，其民主知識程度所以較鄉村爲高，同樣應感謝鄉村老農以農爲業養育兒女；更以農業養育工業之功！

歸來吧，鄉友！別老是在那高高的象牙塔裡唱民主自由的高調，回頭看一看流血流汗養育大家却弄得自己凋蔽殘破、知識落伍的鄉村吧！

民主政治 現代化 的第一步

■「中國之春」評論員

編者按：

本文轉載自「中國之春」第二期，是代表該刊立場的「評論員」文章。

「中國之春」提出了三大主張：開黨禁、開言禁及釋放政治犯，這也正是台灣民主運動一向所主張者。大陸有魏京生、王希哲及「北京之春」的政治犯；台灣也有張化民、李慶榮及「高雄事件」的政治犯。

然而，我們在台灣作此三大主張時，御用宣傳家總是誣蔑我們是「為匪統戰」，「中國之春」也作此三大主張了，試問又是受誰的統戰呢？唯一的答案是海峽兩岸的民主運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開黨禁，開言禁及釋放政治犯，是海峽兩岸人民共同的聲音，中華兒女心連心的民主潮流是共產黨擋不住的，也是任何人都無法抗拒的！

三年前，魏京生提出了五個現代化的口號，最後一個民主政治的現代化。這最後一個，恰恰是最重要的一個。

提不提民主政治現代化，現在是，將來也是中國大陸問題上改革派和改良派的區別。

鄧小平的一個親信，共產黨中央負責人曾經這樣對王希哲說：「飯都吃不飽，還搞什麼民主？」這句話貌似有理，其實淺薄。

政治和經濟是相輔相成的，可以互相促進，也可以互相促退，便是把它們分割開來，對立起來，就只能促退，吃飯和民主，不是一個先後問題。

美國的人權宣言不是先搞好經濟才有的。日本的明治維新，也不是有了電子計算機才產生。生產力的解放，不觸及到生產關係，經濟基礎的增長，不觸及政治思想領域，就象罩了緊箍帽的孫悟空，跳不出哪裏去。毛澤東死後的中國，經濟政策調整了又調整，始終邁不出大步子，原因就在此。要不要先吃飽飯？人人都說要。如何才能先吃飽飯？就得討論。一討論，就會涉及到思想制度，社會結構問題。接着，緊箍帽就來了。魏京生判了十五年，王希哲判了十四年。誰還要討論來着？不討論，又如何搞好經濟？

怎樣才能實現民主政治現代化？——必須改革思想、主義、社會體制。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些話毫無歷史根據。地球上人類存在了幾十萬年，有國家和制度的社會存在了幾千年。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才一百多年，毛澤東思想問世更短，幾十年。在這浩浩歷史長河中，充其量不過是一剎那，怎能說他們已經發現了人類社會的終極真理？怎麼就批不得，碰不得？批了碰了要殺頭？！

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搞了七十年，「真正的馬列主義」中國搞了卅年，最最徹底的紅色越南、柬埔寨搞了幾年，一個個搞成這樣子，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優越在什麼地方？

因此，「四個堅持」論行不通。

什麼是民主政治現代化？從嚴復、康梁討論到今天，一百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衆說紛紜，各執一見，好不熱鬧，然而他們盡管舞文弄墨，政客們却自有主張。於是中國一日日地不民主下去。

我們以為，不要光說，而要去。怎樣去做？先做第一步：曰：開黨禁、開言禁，釋放政治犯。

何謂開黨禁？國家不能一黨專政，黨內不能一派專政，派內不能一人專政。

一人專政太危險。以反右鬥爭和文化大革命爲例，千萬人頭落地，億萬人民遭殃，到頭來落得一句輕描淡寫的話：「他老了，病了，說錯了一些話。」要問，如果他遲遲不鬆辮子，躺在病床上，說他個十、二十年信口開河的「最高指示」呢？整個中國不就完了嗎？

一派專政也不行。一伙人蛇鼠一窩，勾結一氣，「針插不進，水潑不入」，黨、政、軍一把抓，搞個天昏地暗，老百姓却蒙在鼓裏，被人當阿斗。大家都會記得林彪一伙逃上天空的那天，全國在地上還在作「早請示，晚匯報」的祈禱：「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誰會想到一幫人全是壞蛋。

一黨專政可以了吧，中國共產黨是四千萬人的大黨，「光榮、偉大、正確的黨。」「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這個「最有組織、最有紀律、最有能力領導中國」的黨應該信得過。誰知開中央全會，一人表態，幾百個中央委員（包括什麼農民陳永貴，售貨員李素文）一齊舉手，一邊倒，一風吹，千萬黨員、億萬人民被「運動」得跑來跑去，然後齊齊立正，說是「站錯了隊，跟錯了人」了。這一錯不緊，中國又落後了幾十年。

說來說去，一個那麼大的國家，應該有不同的政治力量來均衡局面，這樣安全系數大一點。

在法律上應該明文規定：執政黨外可以有在野黨，（註：不是那些七老八十，凡「運動」一開始先送到監牢的「民主黨派」——我們稱之爲花瓶黨），黨內允許有派，派裏那些敢於直言的人受法律保護。這樣中國的局面大概就不會這樣搖擺不定了。至少，有人要去按原子彈的按鈕，有人敢反對，有人能反，中國人才能安心吃飯。

「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連毛澤東這樣專政的人，都會說一句鬥面話。今天在中國自認糾正了毛澤東專制錯誤的人，怎麼就不敢比毛走得更遠些，去開放黨禁呢？！

何謂「開言禁」？——就是讓人說話。

讓人說話不是空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上當受騙的次數太多，我們要的是切實的法律保障。這

種保障有四：

一、憲法上要明文規定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組黨、結社、示威遊行、罷工、罷課等等自由。把「四個堅持」從憲法上撤下來。黨章是黨章，國法是國法。黨章不能強加於國法。

二、法律上保障人權，一個文明國家只有有刑事犯，不能有思想犯和言論犯。一有思想言論犯，執政黨就可以亂捉人。

三、新聞獨立於政府。新聞獨立是人民在輿論上監督政府的最效辦法。

四、有一個新的保證言論自由的出版法。

以上這四點，是讓不讓人說話的試金石，真貨假貨，一試就知道。

在「釋放政治思想犯」的問題上，我們要求釋放歷次政治運動中無辜迫害的人，我們特別強調要釋放民主運動人士。魏京生、劉青、王希哲這樣的年青人有什麼罪？無非就是講了幾句要民主的話而已，就得害他們一輩子？什麼叫做裏通外國罪？只要鄧小平願意，我們可以爲他們打官司，海外延聘律師，回去對簿公庭。

我們認爲，今天中國大陸上囚禁的政治思想犯，大都是西方人士稱之爲「良心犯」的人，大都是「爲民喉舌」，不釋放他們，不給予政治上的平反，大陸內人民重足而立，道路以目，無法談民主。

「萬事起頭難」。要走出民主政治現代化的第一步，決不是容易的事。我們不求神，不拜佛，也不寄於什麼「鄧青天」或某某「青天」，我們寄希望於全體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寄希望於大陸民衆，台灣民衆，港澳和海外民衆。只要我們團結起來，從一點一滴做起，這一步一定會達到。

文人 不放過 政治

—訪孟絕子

■鐘秦

序 說

雖然年底的立委選舉距今還有半年以上，但是有關年底的選情早已是輿論界的熱門話題了。在有關台北市的選情中最受人矚目的消息之一，便是文壇知名之士孟絕子先生可能參選。至今孟先生不但沒有否認小道消息所散佈的有關他參選的消息，而且還頗有活動的跡象。不管孟先生在年底以何種形式出馬（當候選人或助選員），一般評論家都同意，他的出馬將為台北市的選情帶來相當重大的影響。這個論點的基礎是，孟絕子於民國七〇年台北市市議員選舉時，為林正杰登台助選，在台北市所造成的萬人空巷的熱烈場面，以及在七十一年基隆市議員選舉時為李信志助選，也造成了歷年來基隆市罕見的熱烈場面，許多人都同意，這兩位年紀不過卅的年青人能順利進入議壇，孟絕子的助講居功厥偉。這兩次選舉使得孟絕子成了北台灣響叮噠的人物，也許是他本人所始料未及的，因為為人助選並不始於這二次選舉，遠在六十七年那次半途夭折的中央民代選舉，孟先生便曾為陳鼓應、陳婉貞二位聯合競選登台助講；六十九年中央民代恢復選舉他也為黃天福、張德銘和徐榮淑巡迴助選身為國民黨幹部後裔的孟絕子，「有關單位」對他的頭痛在此就不必贅述了。當年以「流浪者之歌」和「徬徨少年時」二本譯作風靡台灣文化界的孟絕子，從文壇走進政壇，對於卅多年來罹患「政治冷感症」的台灣文化界來說，他的言行豈止驚世駭俗？而在



幾乎是青一色台籍人士的黨外陣營中，1930年生於遼寧省的孟絕子也是個異數。但是在黨外陣營中，孟絕子突出之處不在於他的身份背景，而在於他對國民黨當局的批判，不管是幽默還是諷刺，其犀利之處，以批評國民黨為己任的黨外眾生中，是無人能望其項背的，許多人認為這是孟絕子的本錢，但也令讀者和聽眾經常要為他捏一把冷汗。關於這點，孟絕子的解釋是，他在民國卅九年的一二三自由日離開了心愛的故鄉，由大陸陸程投奔台灣，所以他有權要求台灣有更多的自由。

雖然在選舉當中造成轟動，但是孟絕子最津津樂道的經歷並不是選舉，而是他在台大外交系圖書館服務的那九個年頭（民國45年～54年）。那段日子不但為他的中英文底子奠下堅厚的基礎，同時結交了許多可愛又可敬的朋友。在去到台大外文系服務之前孟絕子曾在李萬居辦的公論報服務過一年（43～44年），先做校對，後當記者，這段經歷可以說是孟絕子和反對陣營最早的淵緣。

目前許多候選人均以著書立說做為競選手段之一，但是說到寫書，今年的候選人當中，孟絕子應該是名列前茅的，除了上述二本膾炙人口，風靡很久的譯作外，孟絕子還有「湖畔之夢」、「花瓣」二本譯作，以及他在台大期間寫成的「命運散集」，和前二年收集成冊的雜文集一「絕子絕孫集」（三冊）、「歷史的傷痕」。最近他正在整理日記，準備選擇適當時間發表。



□：孟先生，請問您在甚麼時候開始介入政治活動？

答：我一向非常厭惡國民黨，因此也連帶討厭政治，避開政治。早在雷震被捕消息傳來那天深夜，我獨自在台大校園裡徘徊很久，對國民黨的厭惡固然更加深了，然而「不過問政治」的心情却開始動搖起來。等到殷海光和李敖遭到無聊政治性攻擊，我明白了「不是文人不放過政治，而是政治不放過文人。」於是，我轉過身來，面對政治。

十九年前，高玉樹跟國民黨的周百鍊競選台北市長期間，所有的報紙一致讚揚周百鍊，一致辱罵高玉樹。甚至還連帶亂捧周百鍊的祖先，誣蔑高玉樹的父母，那時我沒見過周百鍊，也沒見過高玉樹。但據我所知，黨外的高玉樹並不是壞人，國民黨的周百鍊也不是甚麼君子。報紙居然顛倒是非到這種地步，我就同老友們到處去為高玉樹拉票。從此，我就沿着黨外前輩的脚印向前走了。

□：據說您要參加今年的選舉，請問你為甚麼就選立委？也談談你的想法和你的政治理想。

答：我這次出來競選立法委員，有幾個象徵性意義。第一，林正杰出馬競選成功，台北市議員這個層次打破了省籍界限。然而，黨外增額立法委員這個層次，從屏東到基隆，還沒有一個外省人士進立法院向國民黨挑戰，戰鬥。我希望透過今年選舉，樹立起黨外不分省籍界限的楷模，從而敲醒國民黨裡面「秘密外省僵化權利核心」的迷夢。

第二，我是一個正義感特別重的作家。有正義感的作家是社會的良心。我進立法院是要為它增加一點良心的光輝。在這方面，李敖和陳映真比我更好。可惜他們的競選立法委員資格已經完全被「選罷法」剝奪掉了。而

「選罷法」則是戒嚴法與戡亂法經過國民黨特別人工受孕而生下來的私生子。

第三，我是來自一個國民黨官員的家庭。這表示國民黨官員的下一代中有人唾棄國民黨，站在黨外陣營，要以理想的精神把一潭死水般的政治現況挖出一個源頭，掘開一個出路。

第四，國民黨常常以「經濟奇蹟」自鳴得意。其實，台灣富有，乃是病態的富有，除了有錢，甚麼都沒有。所以，在物質上雖然是富翁，在精神上却是乞丐。結果一有風吹草動，資金紛紛溜到美國去，富翁則個個變成美國人。這種現象顯示經過三十多年，國民黨黨毒污染後，台灣社會中精神虛胖，文化貧血，理想痴呆。我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文化人，我進立法院，是要奮力珍惜台灣父老兄弟姐妹多年來用血淚栽培起來的民主幼苗，不讓國民黨污染它，摧殘它，我還要我的理想灌溉它，希望台灣在不久的將來能夠開始成為民主制度下充滿理想的社會福利國家。換句話說，就是把國民黨半世紀來光喊不做的國父大同理想，由黨外人士實現。

□：在你的成長背景中，有那些事情影響你的政治思想？

答：在中日戰爭期間，我看到太多的不公平和無人道的事件。這些事件的內容都是特權階級橫行霸道，黨政軍憲警特務橫行霸道，倒霉受害的全是老百姓和小兵。情形跟清朝、元朝、秦朝、和特務當權橫行的明朝一比，是大同小異。國民黨與共產黨打內戰時期，社會上的狀況也是這樣。國民黨敗退到台灣以後，在政治上的所作所為，是「江山雖改，本性未移」，倒霉受害的是台灣老百姓以及隨國民黨來台的李師科型老兵。四十多年來在大陸和台灣親眼看到國民黨所造成的這些人間不平和慘劇，根深蒂固地影響了我的政治思想，最可怕的是，一直到今天現在此刻，國民黨依舊是「江山早已改，本性毫未移」。

受了這種影響後，我的政治思想內容是人道精神和人權掛帥的民主社會福利制度。

□：你認為有那些事情造成今天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對立？應該如何化解？

：「二二八事件」是第一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原因」乃是中性的學術名詞。實質上，二二八是一道血跡斑斑的傷痕。

二二八浪潮被大軍鎮壓下去了，却造成了一道深深的傷痕，橫在本省與外省之間。事後，國民黨不但沒有儘量設法治療傷痕，反而使傷痕更深。國民黨所做的，是在隨後的十年間，不斷地追捕「二二八」的直接涉嫌人和間接涉嫌人，以及可能的涉嫌人。追捕到以後，有的處決，有的關在綠島。

造成本省與外省之間有隔閡的第二個原因是大陸選出來的中央民意代表。由大陸選出來的民意代表來決定台灣老百姓的事情，是根本否定了台灣人民的政治權力。何況這批民意代表之中絕大多數不是由大陸人民選出來的，而是由國民黨黨部當局指派出來的，由選務人員舞弊弄出來的。更何況他們的任期早已滿了，然而他們却進而開會決定台灣人民的命運，台灣人民能服氣嗎？該服氣嗎？造成隔閡對立的第三個原因是外省霸權主義。從中央到地方，黨政軍憲警特務，所有的權力，全部是「操之在我」，也就是操在一群外省人手中，這樣，更加重了「乞丐趕廟公」的形象，也更加深了本省同胞心靈上被征服的創傷。

第四個原因是語言問題。

國民黨投入台灣的懷抱以後，大力推行講國語，禁止公共官方場所講日語，規定官方場所不得講台語。然而，會場上，電台中，電視上，文武官員講話時，訓話時，告同胞書時，台灣同胞完全聽不懂的和部份聽不懂的浙江土話、江蘇土話、山西土話……却可以公然常常出現。要化解本省與外省之間的隔閡對立，也應該先由這四個主要形成原因中下手。

(一) 二二八問題。

首先把綠島上的二二八人士全部立即釋放，並依國家賠償法賠償他們。對他們的賠償，跟對坐一年兩年冤獄的賠償不同。他們在綠島坐了二三十年冤獄，所損失的是青春、事業、家庭幸福、名譽、理想、和一生的精神生命。

所以對他們的賠償不是一般性的賠償，而是國民黨向他們贖罪式的賠償，因此應該特別優厚。至於對那些死在綠島牢獄的人士，當然更要格外優厚賠償。然後成立「二二八法庭」，重新調查審理二二八的起源、經過，並就每一個細節舉行公開的聽證會，最後公平判決。

(二) 「死而後已」級中央民意代表問題。

如果要這些代表全部退休，國民黨領導中心會感到權力不夠鞏固。中庸之道是來一次考試，只考三民主義、憲法和作文。考試及格的，繼續當中央民意代表。不及格的，則取消中央民意代表資格，改聘為國策顧問，這些國策顧問所空出來的名額，由台灣各縣市選出補上。這樣，台灣同胞不再會感到自己的命運是在由三十多年前從大陸各地冒出來的代表所主宰。相對地，本省與外省之間的對立也會消除。

(三) 外省霸權主義問題

外省霸權主義所呈現的現象，不僅僅是外省大官霸佔權力，而且還是大官退休了或死掉了之後，大官的兒子、女兒、女婿、侄兒接着霸佔權力。要消除「乞丐趕廟公」的不良形象，必須消除外省霸權主義。消除的辦法是規定按本省外省人口比例，平均分配權力職位，規定外省大官退休或死了，大官的兒子、女兒、女婿、侄兒等不得担任黨政軍憲警特務等官員，只可以從事私人企業和教書。從事私人企業時不得官商勾結鬪利。

(四) 語言問題

化解本省與外省之間的對立隔閡，在語言方面的辦法最簡單、最容易，就是在非官方場合，任何語言都可以用，在官方場合，任何中國方言都可以用。

其實，語言根本就不應該成爲一個問題，它之所以會成爲問題，完全暴露出國民黨投入台灣的懷抱以後，在政治上一直害了嚴重的窄心症和疑心症。

台大言論自由大辯論

爭今天的言論自由 為明日的社會生機

「台大意見自由」座談會
教師發言記錄

〔編按〕：三月十六日大學新聞社在台大綜合大禮堂舉辦的「台大的意見自由」座談活動，造成空前熱潮，階梯式的座位坐滿了關心台大環境，關心意見自由維護的同學與師長。誠如 劉福增教授所說的，台灣各大專院校的意見自由問題，有其共同的根源，因此，對台大意見自由所提出來的批評和建議，也可以用到其他學校；因此本刊特將這次座談會四位師長的談話登出，供關心「民主、自由」人士參考。又該次座談會同學們的發言很踴躍，也有許多發人深省之處，但限於篇幅，同學們的反應將留待下期刊出。

策劃：大學新聞社活動組
出席者：劉福增教授 哲學系
李鴻禧教授 法律系
張忠棟教授 歷史系
曹壽民先生 課外活動組
時間：民國七十二年三月十六日
下午七點～九點四十分
地點：台大綜合大禮堂
主席：大新社社長陳裕鑫

「台大的意見自由」 必需檢討和批判

陳裕鑫：（台大大新社社長）

近十年來，台大的出版自由，學術自由……等出現許多令人爭議的事件，這些爭議說明了台大的意見自由值得我們重新檢討和批判。我們辦這次座談會的目的是希望能透過民主、自由、公開的意見陳述，為全體台大師生提供一個講堂，使台大的意見自由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保障。

但是，許多現象的發生却令我們感到相當的失望，我們活動正式批准是兩天前才下來的，也就是說，我們只有兩天宣傳的時間，我們印發了六千份的快報，和製作了大幅彩色海報，在一夜之間，海報消失了，快報也被人收集起來。我們不知為什麼會有人將「台大的意見自由」這個座談會視為洪水猛獸，我們相信這種缺乏民主素養的人在台大是佔少數的。有句話說：「雖然我反對你的意見，但我擁護你說話的權利。」這也是我們應該培育的民主心態。今天，我們先由師長發言，再請同學就個人意見進行討論，溝通大家的看法。

台大「意見自由」 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劉福增教授：（台大哲學系）

一般來說，台大的意見自由在台灣現有各大專院校中是情況較好的，甚至是最好的。但這並不是說，台大目前的意見自由狀況已令人滿意了。如果給它作個評分，這種分數和台大學生聯考的高分是不能相比的。

台大意見自由程度之所以不高，有兩大原因：一個是現行大學法與有關大學法令的限制，另一原因是台大師生爭取意見自由的努力還不夠。我相信，這也是台灣各大專院校意見自由不高的原因。因此，我們今天對台大意見自由所提出來的批評和建議，應該也可以用到其他學校。

以下，我就台大教授的意見自由、台大學生

台大言論自由大辯論

的意見自由和兩者之間的關係作個討論。

台大教授的意見自由——

我要談的是，台大教授對台大各項興革計劃的建議和意見的自由。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評量台大教授的意見自由：

1 批評和建議的管道是否有效而方便？

2 提出逆耳批評建議的教授在職位和其他權利上是否在制度上有可靠的保障？

3 實際提出逆耳批評建議的人是否有任何不利的回報？

1 批評和建議的管道是否有效而方便？

我們可以列出幾點來說明：

(1)從行政的運作系統來說，要將教授意見傳達於上的最重要轉換點是系所主任和院長。但現行大學法上教授對其系所、院長人選沒有任何發言的權利。因此，無法使他們作意見的轉達。而這些系所主任及院長全是由校長來任命的。因此，他們不願意或不肯來傳達一些逆耳的建議和批評。

(2)現行的法規上，定有系所會議、院務會議、校務會議和行政會議，但一般說來，系所會議和院務會議並不發達。所以，由系所主任和院長直接向校方陳述意見的很多。校務會議根本沒有教授代表參加，教務會議一年只開一次，每次開會時，校長講話和專案報告、討論外，留下來讓教授發言的時間所剩無幾。我個人已連續參加了五、六次的教務會議，情形如此。而整個學校運作、決策的最高機構應該是行政會議，但根據大學法，行政會議並沒有教授代表參加。

(3)教授如果要對校方提出意見和建議，無論在規定上還是在傳統作法上，都沒有一定的途徑可循。因此，大家也不曉得要向誰提出、反映比較好。又因為沒有規定或傳統方式可遵循，當教授向學校提出意見或反映時，常會被當作是密告或有什麼不良企圖。

2 就行政制度來說，提逆耳之言的人，在職位上或權益上有沒有保障呢？

首先，我們以現行的行政制度來說，提逆耳之言的教授可說是一點保障也沒有，這是當前教授意見自由不高的最大原因。為什麼呢？在現在的法令上，新聘的教授和副教授、講師，聘約只有

一年，續聘也只有兩年，而到了六十五歲就變成兩年一聘，法令規定，一年或兩年的聘約到了，學校可以不說明任何理由即不再續聘，對教授而言——不續聘就是辭聘。而在台灣這個社會，教授如果遭到不續聘，馬上就要面臨到職業上和生活上的困難，以過去的傳統情況看，教授們無在乎其學術研究或教學態度如何，只要不亂講話，思想沒問題，不和系所主任、院長有所衝突，聘書都是照樣發下來。在現行制度下，只要系所主任、院長或校長任何一方對聘書的發給有所刁難，都足以使這些教授坐立不安。而教授們如果有什麼批評、建議都不是受歡迎的。而大家現在所關心的，實際提出逆耳之言的人有沒有得到不利的回報呢？我想答案是不太多，不過因為各系內部問題，我們不便多作說明。

各位也許要說：如果不太多，情況並不太嚴重呢？由於教授自己都明白，他們的聘書只有一年到兩年，所以大家都知道默默無聞和明哲保身，不要有什麼建議和堅持，三十多年來，台大就是在沒有意見中平凡、例行地傳下來。

十年前，曾有某系主任的不稱職表現，使該系教授九人連名向校長提出召開系務會議請求，這個不過是要求開系務會議的系內部問題，竟被一些有關人員視為有政治陰謀，後來，這九位簽署的教授，除了一位已年近退休以外，其中四位莫名其妙的被辭聘，其他四位也先後被「提名」辭聘，只是沒當選罷了。

我們不能確切指出，這八位先生的遭遇和他們共同連署的請求有關，但種種的考核委實令人不安。要向校方提出建議往往面臨了一個兩難的狀況，如果一人提出，則被解釋為一己之見，如果數人一起提出又被視為陰謀。

另外，我們再談教授的演講自由和在學生刊物上發表文章的意見自由：

各位也許會很奇怪，教授們在學校演講也有自由與不自由的問題。民國四十七年，殷海光教授在普三教室就「胡適與國運」的題目舉行公開演講，當時，我也去聽了。演講中，殷教授沒有給清末民初的革命派很高的評價，在那次演講後，學校就很少給他公開演講的機會。當年，教國際關係的黃祝貴教授對同學就「西藏問題」舉行

台大言論自由大辯論

演講，由於黃教授批評了當時政府對西藏問題所採取的態度和作法，從此，我們就很少再聽到黃教授在校內演講。

各位同學也許要問，現在在台大教授中有沒有演講受到限制的呢？我猜是沒有。去年，黃祝貴教授復出，就通才教育問題舉行演講，我聽了很舒服。現在，我們可以就台大的意見自由公開發表意見，這就是我剛才說我猜對了的最好證明。

民國四十七年時，殷海光先生因為演講批評國運後被限制再演講，學校當局也不許他的文章出現在學生刊物上。民國四十九年初，有個華僑同學的雜誌邀請殷海光先生寫文章，殷先生寫了一篇「人是不是人？」該雜誌很高興的把它刊出來，學校知道後却要將此文刪除，結果該總編輯問學校訓導人員：「殷海光是不是台大教授？」「為什麼台大教授的文章不能刊在台大學生的刊物上？」「這篇文章的問題在那裏？」學校回答不出來，只好說：「不能刊就是不能刊！」

各位想想，如果老師們的文章可以出現在學生刊物上，對同學們來說是個多大的鼓勵，但這件事，學校全是因人對文而起，使得殷海光先生除了不可公開演講，文章發表於學生刊物的權利也被剝奪，從那時候開始，教授們的文章也就不出現在學生刊物上了。

台大學生的意見自由——

台大學生在學校內對學校的興革事項及對國家、社會的興革事項，用口頭、文書、或公開出版刊物，舉行演講提出批評，建議的意見自由問題。

1 台大學學生有沒有在學校內作公開演講提出批評和建議的自由呢？

我想大概沒有吧！這不是指演講比賽或辯論比賽。各位有沒有想過大家應該有在學校公開提出意見的自由和權利？這除了是一種意見自由的權利更是一種教育的權利。而且對進了大學的青年來說，這更是訓練他們公開演講能力的最好地方。就我所知，美國大學都提供良好的場所給他們的學生就個人意見作公開演講。

2 台大學學生們有沒有在文書上公開發表個人意見

的自由呢？

學生對學校有意見時到底向誰反映較好？學校有沒有提供一個方便而可行的管道？希望學校在這方面趕快設法，對學生提出的意見給予答覆，贊成或不贊成都能加以說明。

3 現在學生對學校任何會議有沒有參與的權利？

我認為除了討論純人事的時間，學校的任何會議都應該要有學生代表參加，學生代表不一定要有表決權，但應和所有與會人士一樣享有充分的發言權。

尤其是有關於教學和生活管理的會議更應該有學生代表參加。

我們回憶小學時代，即可判斷老師教的好或不好，何況在大學裏，一個老師的教學態度和學術知識之供給，更應由學生的評價來判定，因此，我們應該讓學生參加有關教學會議和評價的機會。

4 學生刊物出版自由的問題：

這是許多同學特別關心的問題。目前，所有在學生刊物上發表的文章都要先送到訓導單位審查，而審查的經過和核定往往不能使作者和編者滿意，甚至因為文章的內容曾有同學受到校方嚴厲的處分。

我曾參加過一代會和代聯會的學術工作，大三、大四時當過代聯會學術部總幹事，並曾經主編過三期的台大青年，唸研究所時，並協助學弟編過六期的「台大華僑青年」。因此，我深知辦刊物同學與學校打交道的辛酸和苦悶。雖然，現在和二十年前的情況已有不同，但，同學們編刊物時所遭到的困難是沒有兩樣的。

學校對學生刊物的事先審查與否，並不是校方所可以作決定的，但是不論從教育或文明發展的觀點來看，我們都必須重新認真檢討審查學生刊物的作法。

在這邊，我要提出幾點建議了。

(1) 學生刊物的審查尺度應該依照新聞局和警備總部檢查社會上各種刊物的尺度而放寬。

學生刊物的審查沒有理由比社會上的尺度還嚴。

(2) 每學期初，由班代和社團負責人選出本校教授、副教授或講師等十人，負責學生文章的複審委員會。學生如果不能心服訓導人員的審查，

台大言論自由大辯論

只要經過複審委員會三位先生的支持，就算通過。

教授意見自由和學生意見自由之間相互的問題——

教授意見自由和學生意見自由是成正比的，顯然在當前情況下，學生的意見自由需有許多教授的支持才能不斷提高，但如果教授的意見自由不高，教授就無法支援學生。反過來，學生也要支持教授爭取意見自由的努力，當教授們爭取意見自由遇到挫折時，同學也應該熱切的表示關心。我們今天討論意見自由的問題不只是行政制度上的問題，而是關係中華文化興衰和民主文明的問題，希望大家繼續關懷意見自由這個問題。

**有「獨立的」大學，
才有「自由的」大學**

李鴻禧教授： (台大法律系)

大學為何獨立？如何獨立

剛才，劉福增教授就時間、台大來談意見自由，我換一個觀點從空間來談。

我是學憲法的，「意見自由」這個題目是屬於憲法的範圍，憲法主要包括兩部份，一部份是保障基本人權，另一部份規定國家重要機關的組織。在開發中國家的憲法多重在規定國家機關之權和組織，而已開發國家多重在保障基本人權自由。

言論自由更重要的是要有把意見表達出來的自由，文明先進國家，除了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甚至把大學的學術自由另外劃分出來加以保護。大學在研究學術時，縱的方面要傳承本國文化，保存文化精華，在橫的方面能和世界潮流和各國狀況作比較，評價其間的得失，而從過去的歷史及其他國家的經驗中對現有狀況作批評，所以，大學的自由常會受到外力的侵犯。但在文明先進國家，對大學自由予以特別的保護，小心的維護。因其確立了民主自由的制度，明白大學自由是不使國家社會不致於腐化、僵化，而能秉承自

有文化傳統，加以推陳出新，日益精進。

現在的大學，爲了要發揮在國家社會上開發未來、研究知識的功能，必須有一群人來從事本國歷史文化的研究，一方面，也必須培養一批繼承的學者。這要提供一筆很大的資金和設備來配合，如果這時候出現了外力來影響這筆資金和這些設備的設置，是相當本末倒置的。

通常，公立大學的經費是來自國家政府的預算，私立大學則來自財團法人，如果這時候，政府預算或財團法人擁有影響學校經費的權力，或是教授的研究計劃、報告不能配合他們的意思，就把教授解聘，摧毀其研究計劃，不但大學的功能無法發揮，反而使社會日趨僵化、老化而已。從這個角度來看，世界各國都極力保護大學的學術自由。

我們除了要積極確認大學的教授、學生從事研究、教學和學習的獨立與自由，並且，由教授和學生來制訂大學的行政方針。另一方面，要防範任何可能妨害學術自由的情況出現，特別要對學校的組織和職權作一個很好的設計，使學校的教育行政不會干涉到學術自由。

我們看世界各國，許多聲譽好而悠久的學校多是私立大學，政府不對大學作干涉。西歐不僅有不干涉大學的習慣，現在已成爲其共識。在先進國家，對私立大學或是公立大學不予干涉，即使許多私立大學也要由政府的預算來支持，但對學校也沒有任何干涉。往往，學術高深的學者都留在學校作研究，不會到政府的行政機構。且一般都是由教授來組織校務會議的委員會，對自己的學校獨立的保護，都是很值得我們參考、學習的。

一般的行政官僚都很習慣於行政機關的劃一和統御，但，大學應該不同於行政機關，使其有其獨立的行政。反而是一些較落後的國家，移植大學教育後，都由一個統一機關以中央集權制度來管理大學，也許初開始沒有什麼不對，但漸漸的會出現大學對學術文化無法推陳出新、日益精進的現象。大學如果受中央集權的管理而整齊、劃一，大學絕對無法生根、進步。

日本的大學移植了歐美的大學教育配合其本國的傳統文化，以東京大學爲例，最近出版了一

台大言論自由大辯論

本由全校師生共同討論所提出的「改革大學制度的報告書」當中一段話：「由政府掌握廣泛的大學行政權力，對所有的大學實施中央集權式的統治，在日本還是學術落後的時代，說不定還有某種意義；但在現代日本社會各種環境，而且要維持相當的學術水準，只有尊重學術的獨立與自由，保障大學的政治獨立，才能使大學進步。」曾有一位學者主張：「在民主先進國家，早已將教育自由化為一種社會共識，但在開發中國家，最好能將教育自由以及大眾傳播的自由和大學自由合起來，使它獨立於行政和立法、司法之外，構成和三者互相牽制的重要力量。如果經過一段時間，使教育獨立而成為三者制衡的力量，並配合學術獨立與自由，則社會就不會僵化和老化。」

大學為什麼需要自由

我們講自由實際上就是大學意見自由的母體，我個人主張大學教育自由有下列幾個理由：

1. 大學的使命一般是對現存社會的客觀批評和檢討，藉這個來尋求新的真理，開拓人類所未知的新世界。而且以學術成果來發揚光大，並培養具有優秀知識創造的人才。我們社會中常有兩種力量來推動社會的進步，一個是政治力量，一個是學術機構。但前者不如後者有長遠的眼光和充裕時間來作研究討論。而政府和議會只顧感到政治利益和現成情況，如果政府無法兼顧學術的意見，則社會將會發生很多問題終至於跟不上時代的潮流。那麼，這兩者之間要如何來作協調呢？應當是政府和議會要相當尊重學術界的自由，同時，學術界在作研究時也能注意到現時狀況的變化，特別是現代社會變的很快，常常使人要追尋新哲學和新思想來配合。一個時代常常會出現一些異端、邪說，這往往變成後世的主流學說和普遍的思想。所以，如果不能支持學術自由，則好像是壓抑了國家未來學術思想的幼苗。
2. 現在的政治很難避免政府的干涉。如果教育能夠獨立於政黨之外，使政黨的現實利益影響排除開，則教育才不致陷於混亂。
3. 現在是知識時代，要使知識集成一種教育的方向，光一個學術界本身是沒有辦法的。

大學教授的意見自由和學生的意見自由

大學教授的意見自由在傳統上是較有保障的，大學教授有研究自由、演講自由……等。在先進國家中，大學教授不僅對其學術研究有提出意見的自由，而且本人在其大學中也有全然的意見自由。這些教授在系、院、校中都有代表來組織。先進國家的作法是：

1. 大學校長和教務長由大學教授代表會議來選舉產生。
2. 教授之任用與否由教授在系務會議中來決定。而且大學的人事獎懲、升遷、退休由大學教授來決定。有關教學研究的基本方針、課程安排、招生、成績、學院各系組織、運行、資金分配都由教授來評定。所以，在這些國家中，大學的內部是不像我們這麼統一的。

而大學自由的保障方法，最重要的就是一一終身聘。

我們再談到學生的意見自由，過去的大學是在培養一些精英，就個人所好來作研究。但在本世紀，大學生人數已有大量的增加，進大學不再是少數精英的權利。過去學生沒有很明顯的保障，而視教授的意見來決定，學生的個性尊嚴不是整個大學教育的任務，這樣一來，學生愈來愈鬱悶，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代全世界普遍發生學生運動，七十年代還有許多討論，這個學生運動的功過如何，歷史會給我們一個交待。

現在的大學教育目標和過去不一樣，除了增進學術知識外，更重要的是要使大學學生出了社會後能將個人的學識和謀生的技能配合起來，貢獻社會。但為了培育謀生的技能却不能因此排除自由的胸襟，在這裏有個相當大的矛盾，一方面要他服從權威，一方面要培養他的獨立，所以，在這時候，困難而複雜。但就民主憲政理念來說，大學生的參與也有一些問題存在：

- (1) 大學生對大學的管理只是為了學習上的方便需要，不是為了學習如何管理學校。
- (2) 大學的管理是相當難而複雜的問題，需有相當的長遠眼光和深厚知識，一般青年是無法勝任的，除非直接關係到學生切身問題，學生們也

台大言論自由大辯論

不會感到興趣。

但，我們却不能因此忽視學生意見自由的重要。我個人認為在大學管理方面，學生至少要扮演消極功能的角色。比如說，大學教學的設計由大學教授來做，可是執行不好的時候，讓學生有正式的管道來提出自己的意見，而且受到相當的重視。

大學生對社會的變化相當敏感，這對大學教育是有幫助的，一般的大學教授對政府等行政單位來說是相當進步的，但對學生而言往往有所不足。所以，這時候容許學生提出自己的意見，正好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而大學生入學時已年滿十八歲，在法律上已是具有行為能力的人，所以其在大學中也應該享有意見自由的權利。

另外，我以為一個大學生的身份最為單純，比較沒有既得利益的障礙，顧忌較少，這種意見非常的寶貴。年紀一大，有政黨、經濟、妻兒的顧慮，反而沒有這麼的客觀。

我認為一個大學生較能用心去思考複雜的問題。在日本大學中，我印象深刻的是規定大學中不得有政黨實施和組織，從來沒有人反對這項規定，即是尊重大學的自由之最好表現。

有些人以為過去的學生運動和自由主義是造成大陸淪陷的原因，而有人也不停的形容五四運動的影響，我想這都是不必要。

如果大家可以將憲法中的自由意義，配合理論和實際情形來加以探討學術自由和意見自由，才知道要如何來下藥方，如何來迎頭趕上歐美國家的民主、自由。

「自由」的前提

張忠棟教授： (台大歷史系)

對於知識份子心裏的意見有適當的管道讓其充分表達出來，對國家和社會是有幫助的。反過來說，如果知識份子的意見不能表達出來，對國家、社會是種損失。

我想這種理想在校園中也是應該存在的，學校同學對學校和社會也有感想要表達，我想這就

是意見表達的自由。但我們另外要想到，一方面我們要求有表達的機會，一方面我們要以平和、婉轉的態度經過精密思考理性的表達出來，在這種前提下，我很贊成同學在校園的充分意見自由，因為時間不多了，我就講到這裡。

校方的答辯

曹壽民先生： (台大課外活動組主任)

關於李教授提到，國外沒有訓導處的問題，我是全同意，可是我在美國留學的大學中除教授、校長外，還有許多位副校長來負責學生活動，其意義和訓導處應該是差不多。

對於劉教授提到教授可不可以學生刊物上發表文章的問題，我個人在學校負責學生出版刊物的管理，裏面的管理規則中指出：「本校學生社團出版刊物，以刊登本校在校學生文稿為限，但由左列各款之一而其篇幅在十八分之一以下者不在此限：①師長文稿。②科學技術等專門學術問題。③校內演講稿及訪問稿經當事人同意者。如果我們以這條規定來看，師長的文稿是可以批准刊登的，可是，我們可以討論幾分之幾的規定是怎麼出來的，我想大家可以提出意見來。

哲學經濟學

四〇〇頁 / 二〇〇元

這本書寫作的的方法與中外經濟學家都不相同，它以簡單的五個模型，解釋了古典經濟學、馬克斯經濟學、暴力經濟學、現代經濟學、民生經濟學，和第三種經濟學的新思考，是散文式的不是數學式的，所以很容易懂，而且充備了道德的感性，章章令你感動！

出版：楓城出版社 郵撥：104063號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13號

侯立朝 / 著

醫訊問題及其背景說明

三月十六日下午七點，在台大綜合大禮堂，由大學新聞社主辦的「台大意見自由座談會」上，醫訊社發表了這一份意見書，因和「意見自由」問題有關，本刊特予登出。

一、何謂「醫訊問題」？

醫訊是台大醫學院的學生報紙，已經由醫訊社持續出刊十三年。十三年來，醫訊社一直是一個開放給醫學院同學自由參加的、獨立操作的社團。由於創社時期受到學校無理的限制，乃劃歸於醫代會。醫學院的書畫圖書館和社會服務團，亦在未獲准登記為獨立社團之情況下被推入醫代會。這幾個社團長期以來就獨立地運作。「醫訊社」一直在民主合法的手續下，自選社長，獨立出版。今年，醫代會主席曹永昌，爲了「學校求好心切」，「達到學校的期望」（見曹永昌文），宣佈解散醫訊社。所謂「醫訊問題」就是「解散醫訊社」這件事。

二、問題的發展：

醫訊問題出現後，醫訊社同仁曾一再與曹永昌同學、訓導處主任林仁混及醫學院院長彭明聰一再交涉，企求以合法的文明方式解決。但是從曹、林二君的回答中只得到「現在已經沒有醫訊社了」的回答。而醫代會主席更在三月十日以魚目混珠的方式，出版了一期「台大醫訊」。此事已由醫訊社發表聲明：「這一期『醫訊』並未經『台大醫訊社』同意出版，其『正當性』（Legitimacy）尚處於爭議之中，特此嚴正聲明。台大醫訊社社員一同」。

三、「台大醫訊」是什麼？

台大醫訊是醫學院學生的輿論公器，不是「醫代會訊」，因此不是醫代會的宣傳工具。

四、「醫訊社」合法嗎？

合法！十三年來，醫訊社就是一直以民主的方式進行新舊社長的更換。民主運作並未違反所謂的「醫代會組織章程」。事實上，醫學院內的社服、書畫兩社長期以來也是一直以這種民主方式合法地運作的。

五、醫訊社在醫學院扮演的角色：

醫訊社是醫學院內一個人文性的、思想的、新聞及輿論性的社團。多年來從社會上各界，包括衛生界、文學界、教育界、思想界及文化界吸收營養來滋潤醫學院內被自然科學禁錮，被自然科學疏離的心靈。因此醫訊社除了出版報紙之外，社內的閱讀、討論、座談成爲同學們人格成長、知識成長，激發人文關懷的重要方法。在此必須強調，醫訊因此是醫學院內唯一具有思想、人文活動的社團。我們認爲這是塊文化氣息濃厚的園地，是彌足珍貴的。無奈如今學校不但沒有大力扶植，反而予以扼殺。爲什麼？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六、醫訊問題發展到目前的情勢，至少呈現以下諸端的窮困：

- (1) 言論自由的窮困：從以往屢遭審稿困擾的輿論性報紙，更淪爲醫代會的宣傳工具。
- (2) 學生自治權的窮困：從民主運作的開放性社團，淪而爲訓導處「求好心切」、「期望」的派任。
- (3) 民主的窮困：在人類歷史艱苦發展產生的民主思想，却在醫訊問題上呈現大開倒車，一人專斷的局面。
- (4) 理性的窮困：醫訊社同仁一再以合理、合法的解決方式，要求於醫代會主席及訓導主任，却竟而遭到這種毫無妥協機會的處理。
- (5) 社會關懷的窮困：顯然醫訊社同仁強烈的社會關懷興趣，是醫訊問題的潛在原因。醫訊問題的出現等於宣佈了這條路「行不通」！

謹代表醫訊社，就「醫訊問題」提出上述「五項窮困」之淺見，敬請四位師長指教。

台大醫訊社社員一同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三月十六日



陳鼓應教授全家福。

陳鼓應

海外言論選輯

〔編按〕

三月十八日，國防部長宋志部長在立法院答覆費希平委員之質詢時稱：陳鼓應在海外曾作「媚匪」言論及參加台獨活動，若申請回國必須接受法律的「偵審」。目前，「前進」創刊號已刊出陳鼓應先生的越洋訪問，認為宋部長的指控是件誤會，根本子虛烏有。「縱橫」月刊則訪問了陳先生的好友王曉波先生，對宋部長的各項指控一一提出了明確的證據作為答覆。

陳鼓應先生一向是「夏潮」的作者和朋友，自他六十八年放逐起，我們一直予以最大的關懷。根據我們的了解，陳鼓應先生的見解與政府並不一致，但與「媚匪」或「台獨」無關。陳鼓應先生的言論只代表他個人作為中國知識份子的見解。陳先生不在台灣無以自辯，基於中國知識份子的道義，本刊有為陳先生辯白的責任。

鑑於宋部長的答覆中，連有關日期都發生錯誤，可見宋部長的情報並不正確，他所得到的報告內容是否正確更當懷疑。除宋部長應立即徹查錯誤之情報來源外，本刊為正視聽特刊出「陳鼓應海外言論選輯」。陳先生的言論當為其自辯的最有力證據。

從六十八年出國後，至七十一年二月，陳先生發表過的言論如下：

「知識份子對現實之回應——從台灣經驗談起」（七十年十月七日港大講稿）

「民主運動與台獨大有區別」（「自立晚報」七十一年一月十日）

「先秦諸子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中國報導」七十一年二月七日）

「訪陳鼓應談台灣黨外運動」（「中報」七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日記者訪問陳鼓應、高準談中國統一」（「中華雜誌」七十一年三月）

「台灣的現狀與未來——李嘉、戴國輝、陳鼓應的國是對話」（「生活與環境」七十一年七月）

「美國言論自由運動——在聯邦調查局的監視與干預中成長起來」（「生活與環境」七十一年九月）

「黨外不可走政客路線——從康寧祥政客模式談起」（「縱橫」七十一年九月）

「南京大屠殺之真相與日本鷹派之動向」（「中華雜誌」七十一年十月）

「不可以言入罪」（「生活與環境」七十一年十一月）

「旅美華人致中共領導人的呼籲信」（「生活與環境」七十一年十一月）

「從個人經驗到社會經驗」（「夏潮論壇」七十二年二月）

除此之外，尚有陳先生於七十年訪日期間接受「文藝春秋」之訪問稿未能譯成中文，以上是本社蒐集到的陳先生在海外這段期間所發表的全部言論。以下為陳先生以上言論的選輯，出處不另註明，小標題是編者所加。

清議的傳統

清代以前知識份子的抗君傳統，上自莊周而下至黃梨洲爲衆所周知以外，像晉代鮑敬言的「無君論」（見「抱朴子」結鮑篇）、宋代鄧牧評「君道」（見其「伯牙琴」君道篇）、清初唐甄的「抑尊」思想（見其「潛書」抑尊篇），對君主專制都做了強烈的抨擊。即令到今天，若把他們的意見用白話寫出來，不免要惹禍。大家都知道譚嗣同說過這樣激烈的話：「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其實唐甄比他更早就說過：「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他的一些話用現代語言說出，也定會受到「有辱元首」入罪。

晚清以後，知識份子以反帝救亡爲主流的抗議運動，更是風起雲湧。由於時間已到，不再多說。總之，中國知識份子是有它長遠的抗議傳統。康有爲所說的：「感國難，哀民生。」「登高極望，輒有山河人民之感。」這種心情，爲歷代知識份子所共有。

先秦諸子都有很強的時代感，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各家之中，孔子算是個溫和的改良主義者，但仍不見容於當道，到處飄泊。現在我們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像陶百川先生這樣，說了幾句希望「台灣要好」的話，就受到了圍剿。先秦各家對已趨崩潰的舊制度，有著不同的態度。除了儒家之外，其他各家都較激進。墨家對於僅憑血緣關係的親親政治有強烈的批判，道家是現行制度的否定派，法家應該屬於當時的革命派。法家政策的推展，對既得勢力的貴族集團打擊得最厲害。當然法家有很大的缺點，若從今天的觀點，法的制定就缺乏人民性。但法家也受到很深的誤解，如果我們細細地讀一讀韓非的「孤憤篇」，對法家就會有較深一層的認識。現在港、台講中國思想史的人，多站在儒家的立場看問題。講先秦思想的人，比先秦諸子要保守得多，所以先秦諸子的抗議精神自然遭學界淹沒。台灣講儒家的人，「逢君之惡」者不少，完全失去孟子那種「說大人則藐之」的氣魄，更沒有他那種「望之不似人君」的輕君氣魄。

台獨的陷阱與困境

初到美國遊歷的黨外知名人士，常受到不少熱心人士的歡迎，當然這和迫切要了解鄉情的心情有關。不過時常出現一種現象：剛從島內來的人，一經被某些地頭接走之後，就會被包得很緊，圈外人無法得到聯絡見面的機會。有一些不能返台的而又影響到台獨組織內的領袖權時，就難以避免遭受被排擠的命運，先是彭明敏、郭雨新，後是許信良，都有過這種經歷。

其實海外台獨的組織，正如最近發行的一份台獨刊物上所說的：「海外台獨進行數十年至今，範圍所及的台灣同鄉是三萬六千人。海外台獨運動所及僅勉強可算佔台灣同鄉的百分之十。」他們在檢討中說：「海外同鄉支持台獨有島內支持黨外那樣熱烈嗎？紐約地區台灣同鄉近萬人，大紐約地區台灣同鄉會或台獨每次活動集會時，到場同鄉大都在三、五百人間，八〇年的中秋晚會，更只到百人之數；東京地區台灣同鄉在七、八萬之譜，七九年的二、二八紀念會，連難得露面的彭明敏前往親臨主持，到會同鄉也是百人之數。可見海外台獨運動不能進展，是由於這個運動長久下來的領導階層基本有問題所造成的。」這裏只指出「台獨運動不能進展」的片面原因，但由此也可以知道海外台獨實力之小以及不獲大多數台灣同鄉的支持。留學生到異國，同鄉會聚是很自然的事，參加同鄉會決不能與台獨組織混爲一談。然而近年來島內輿論竟不當地製造台獨的聲勢，甚至常把參加民主運動的人打成「台獨」。由於輿論常把台省籍的黨外人士描繪成「台獨」，以致造成批評台獨就是打擊本省人的錯覺。很少人去了解近年來海外台獨的論調和做法，不僅無助而且有害於島內民主運動。

總之，對於島內的民主運動者，乃至部分有地方主義傾向者，理應包容（我到香港之後，才體會到廣東人的地方意識比台灣還強）。甚至對於有台獨傾向的人，如是觀念問題，可透過討論的方式去說服；如是參與暴力組織，則訴諸合理的法律途徑去處理。

論「高雄事件」

今天，島內在高雄事件之後，政府的處置有不當之處，而高雄事件之後，又有林義雄滅門慘案，接着又有陳文成橫死事件……。

這一連串的政治事件，給予台灣社會很大的影響，是可以斷言的。對高雄事件，國民黨的處置是不適當的，這明明是要求社會開放、要求政治參與的一種運動，卻硬把它當作十足的台獨運動來處理。高雄事件發生時，有一些參與運動者是有較濃的地方色彩，卻不應該把他們當作台獨。

黨外運動，一般是主張言論自由，改革法律制度，人權的保障。這些方面的努力，相當得到民衆的共鳴，這是實際情形，總之，黨外運動的主流是民主化運動。

島內由於高雄事件以後，政府的壓力大，黨

外採取了低姿勢，但是對於前述他們努力的方向，依然在進行之中。現在黨外覺得高雄事件有些盲動的傾向，比較穩健的方向是他們現在所採取的。

另一方面，在海外——主要是在美國——統一派由於「四人幫事件」，遭受重大的打擊，真正的活動幾乎完全停止了。海外的台獨運動認為高雄事件以後，中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是失敗了，所以變成了非進行暴力革命不可的主張。

海外與島內，運動趨向兩極分化的樣子，這因為海外台獨的主張與台灣內部人民追求他們當然的權利，是兩碼事。台灣人只為了一點點權利要求，就馬上給戴上了台獨的帽子，這是錯誤的。

總之，重要的是，現在台獨運動的主張，對島內的民主化運動，變成不是支持，反而是妨害。所以我對台獨運動採取批評的態度。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美麗島」有別於台獨

我逗留美國的這段期間，才深一層認識到島內參與選舉運動中部分具有程度不同的地方主義者，與海外台獨組織者，在想法上有很大的區別。海外的台獨份子，宣稱「台灣從來不屬於中國的領土」，他們不是漢族，也不是中國人。反之，島內的地方主義者經常在言論中稱自己是「在台灣的中國人」。何況島內的民主運動者大都並不具有排斥性的地方主義色彩。高雄事件之後，黨外以制衡作用的發揮為主題，而海外台獨則否定政黨政治的可行性，以為改革是無望的，主張惟有訴諸暴力革命才是唯一可循的途徑。在這主要之點上，兩者之間是背道而馳的。

即使拿「美麗島」雜誌來說吧，官方輿論不斷將之歪曲為「台獨」刊物，但實際情況卻絕非如此——我們且看看「美麗島」發行人在該刊發刊詞上所寫的話吧：

「我們認為：在歷史轉捩點的今天，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讓民主永遠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

，是在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對中華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貢獻，更是我們新生代追尋的方向。」

在「美麗島」雜誌的一篇社論裏，又寫道：

「中華民族這一百多年來，經歷了兩次大的『民族反省運動』和『社會改造運動』以後，民主是必需的。一個優秀的民族，經過反省、改造以後，不容別的民族來蔑視、欺負絕大多數人，這就是要民主。我們相信，懷疑我們民族實行民主的能力就是懷疑我們民族的優秀。一百多年來，勇敢的中華兒女沒有懷疑過這一點，所以，一百多年來中國人血淚的夢就是：民主。」

這從中華民族的立場與眼光，都是台獨人士所短缺且要加以排斥的。

至於「美麗島」雜誌的紅、綠、黃三色旗，其實是台灣鄉村風光——紅磚瓦農舍、青綠的稻田、金黃的午後陽光的象徵，施明德的太太艾琳達在美國也曾作過這樣說明：「這些顏色只是用來代表「美麗島」雜誌，和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團體完全無關。」

駁台灣民族論

我們從「台獨」的刊物上，知道他們有所謂「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主張，認為「台灣從來就不是中國領土」，觀念十分極端，把歷史事實歪曲到了離奇的狀況，以至連多數台灣同鄉也不能接受。在美的「台獨」份子經常向同鄉們散發兩本書，一本是柯喬治的「被出賣的台灣」，另一本是王育德的「苦悶的歷史」。他們將這兩本書當成「經典」著作，但柯喬治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老牌特務，書中充份表露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心態，王育德則明顯地站在日本軍國主義的立場來講話。

從台灣到美國來的新移民，總數也在十萬以上，但台獨的活動卻始終限於一個小圈子；這種情況，最近曾引起了自稱為「左派」的部份台獨份子檢討，他們在一本「海外政論」的刊物上，認為台獨運動的停滯原因，主要是「領導階層基本上有問題所造成的」，他們並對台獨的既有組織和活動，作了很多的揭露——比如說，一有事情發生，便立刻跑去向美國當局遊說，「把台灣的獨立希望於國際的干涉」；又如一有爆炸案子發生，「（台獨）聯盟的人就趕緊去募款」；成員很雜亂，「什麼階層的人都要照顧，甚至帶資本逃到國外來的那些人，也要去吸收他們。」

尤有甚者，「台獨左派」還提出了一個什麼

「台灣民族」的奇怪說法，認為「台灣人」是與中華民族、漢族不同的「另外一個民族」；當然，他們自己也知道，這論點在社會人類學上是完全不通的，因此不得不聲稱「台灣民族」不是一個人類學上的提法，而是一個政治地位的提法——例如他們之中有人說：「一個民族是在壓迫中產生的，是政治定義，而非文化定義。」要駁斥這種謬論，其實很簡單，舉一個例說吧！假如哥哥當了部長而弟弟是「分歧分子」，那末，根據他們以政治地位界定「民族」的說法，豈不哥哥和弟弟變成不同的民族。其實，政治地位的不同——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我們只能說是可能產生壓迫的問題，而不能說成是民族的問題；舉歷史事實為例，當年南渡江左的晉皇朝與江南地方勢力的衝突（有如東渡台海的國民黨政府與台灣地方勢力的矛盾），無論如何不能因此而將以「中央」為名的「統治集團」說成是另外一個「民族」。照這些人的邏輯，那麼謝東閔、林洋港是否屬於「另外一個民族」呢？而一九四九年後從大陸到台灣來的外省人，他們又是否算是「台灣族」？如果像他們所說的，只要「認同台灣」的就是「台灣民族」，那麼假如我「認同台灣」是屬於「台灣族」，而我父親「認同大陸」是「漢族」，豈非我們父子竟成兩個不同的民族？

台灣同胞毛骨聳然

台灣的人對文革期間「四人幫」所採取的極端政治手段，都感到毛骨聳然，這點我也有同感。我希望他們不會再蹈覆轍。比起當時，現在固然稍好，但封建官僚主義仍舊根深蒂固。還有讓人感到軍隊的壓力極大。我認為，還必須進一步改善法律制度，政治勢力方面的人事變更，要依法實施，任期制和定年制也要確實施行。台灣和大陸的民主運動，不能一概而論。統治者應該更誠心的反映民意。我反對以濫捕的手段來處理問題。

我們認為：王希哲、何求在這幾年間，基於愛國的熱誠，更本着「思想解放」、「獨立思考

」的精神，通過筆墨，對他們眼中種種不合理的社會現狀進行批判，對一些合理的現象則加以讚揚，甚至對國家的未來前途，不懈地進行探索，提出誠懇的意見。縱使他們的某些觀點，與當局的想法相左，只要不是公然鼓吹暴亂，也應該受到尊重，更何況他們為中國公民，應該享受到憲法所賦予的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這次王希哲和何求的重判，以及廣州市「人民法院」負責人的不肯透露判刑的證據，使我們不能不相信歷史又在重演——這次審判是以思想、言論入罪的。另一方面，其他被捕的民刊編輯仍然下落不明。毫無疑問，這些做法會嚴重阻礙「中國」邁向民主法治的道路，亦會嚴重影響到海外華人對當局推行的政治改革的信心。

抗議中共迫害言論自由

我手邊沒有任何有關王希哲判罪的資料，因此無從在罪名的證據力方面進行討論。在這裡，我只能從台灣的經驗和格局來談談大陸上發生的這類案件。我個人的看法是：

(一)不能以言入罪：無論是資本主義式民主也好，社會主義民主也好，凡是發生以思想言論去定罪的事端，都為公論所不容。近年台灣發生的李慶榮案、張化民案，以及大陸發生的民運份子案件，罪因多起於思想言論。在現代政治觀念裡，發言權的保障，已寫入憲法中。居於維護人民的表達權，我們理當維護王希哲、何求等人的言論權利。

(二)不能阻塞民間輿論的管道：文革沉弊的重大教訓之一，是民意廣泛的受到壓制。民意能透過什麼適當的途徑來表達，是普遍關切的問題。民辦刊物被禁，輿論管道更加窄隘。有意見的知識份子向外投稿或與外來者互通消息，通常總是在無助的情況下才尋求聲援。因此，首要在於國內增闢民間論壇。

到現在為止，王希哲的被判重刑，廣東人民

法院所透露的籠統罪名，它的具體罪證是很薄弱的。

對於王案，我們要求是：一、應尊重他們的發言權，不得以言入罪。二、應將被控具體罪名及審判記錄予以公開。

如何妥當處理歧見的問題，當道者也經常在討論，但朝令夕改，沒有依法行事的習慣，而且所依的「法」，又過於嚴苛，立意不在保障言論權。在當權者之中，不少人仍存著這種觀念，以為不鎮壓便會有蔓延開來的後果。事實上，問題絕不是靠人身囚禁解決得了的。

囚禁異己，不僅在人權帳單上將留下污點，而且對國家的統一事業具有莫大的破壞性。

王希哲等案件，雖由「廣州人民法院」執行判決，但輿論都將視它為中共當局的一項決策。它不僅影響王希哲個人的前途，更將不利中共的國際形象。

對在台灣同胞及海外華人而言，囚禁政治犯，是講求民主法治國家所不應有的現象，判重刑，則尤失民心。願「廣州人民法院」在二審時，慎重處理！並願海峽兩岸當局，能認識到釋放政治犯實為政治競賽的第一要務。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對黨外的期望

近年來我很少發表文章，因為客居他鄉，總覺得美國不是我發言的地方。同時為病痛所纏，健康情況陷入低潮，提筆便覺吃重。世事的衝擊，雖然時有感發，却只得鬱積於胸。

去年秋天，我經香港去日本，對台灣民主運動發表了一些口頭的意見，仍是居於關懷的心情。像我這樣的一個參與者來說，對於抗議運動的「血肉感」自然難以因遠隔重洋而淡忘。那麼漫長的歲月，在生命中最寶貴的時光裡，我們多少人曾為它絞腦奔波、身受屈辱而仍全力以赴；我們多少人曾為它而失去職業、而被逐、而受捕、而遭囚、而妻離子散，而家破人亡。一個掙扎上台的成功者或代表者，是踩著多少人的血淚走出來的。多少青年為領隊的政治理想所激發而投身

其間，因而當一個為千萬人所關注的運動眼看它可能走向歧路口上時，怎能不擔心？怎忍袖手旁觀呢？

我們必須認清：黨外目前的作用，決不在於分權分勢，爭取幾個位子，而在於繼續擴大它的發言權——提高它的抗爭權。

回顧黨外的「民主運動」，本質上是一個「抗議運動」。抗議運動乃屬民意表達的範圍，它離真正的民主（人民作主）道路仍甚遙遠。現階段的黨外，在反映民意、爭取民權、抗擊強勢的原則上，必須鏗而不捨。放棄這些原則，而著意周旋於執政黨的協調磋商的技藝之中，則黨外勢必遁入權位的窄門，而淪為客廳裡的民主花瓶而已。

談到美國的政治——從政策到政客，完全是站在它本身的利益著眼。「利字當頭，實力掛帥

對抗中共的和平攻勢

關於臺灣的前途，理論上有幾項選擇，武力解決，或維持分裂的現狀，或臺灣獨立，或是通過談判尋求和平統一的道路。只要觀察現在的內外情勢，武力解決和臺灣獨立都不可能。維持分裂現狀的話，那麼臺灣由戒嚴法所造成的狀態將繼續下去，而且上層的政治壓力和僵硬化，將與民衆在質的方面日漸提高的要求，越來越不能相容。處理不當的話，今後三、五年內，內部將發生不幸狀態，特別是選舉期間緊張關係將趨激烈化。總之，除了大家集思廣益，通過各種層面的對話和接觸來探索祖國和平統一的道路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的。

首先，海峽兩岸的統一問題是全中國人的問題，不僅僅是國共兩黨之間的問題，如果黨意能夠包含民意，甚好，否則應以民意為依歸，不容違背民意，而以黨意為主。

第二點，統一之後，臺灣的經濟、社會、生活方式等，在九項提案（編者按：指葉劍英的「九項建議」）之中，主張不變的。這種看法與社會發展的法則不合，無論什麼生活方式或社會制度，都不可能一成不變的，必要在漸進的過程中，向着民有、民治、民享，或者是民族、民權

、民生的方向改進。臺灣的生活方式與社會制度不良之點也有不少，同樣大陸的生活方式須要改善的也有，比如說鬥爭頻繁，官僚主義跋扈，單調枯燥的生活等等，就應予改善。因此之故，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不變，這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

第三點，是關於軍隊的，在臺灣的軍隊應對付外來的敵人，特別是蘇聯人的擴張主義，不可以因此而增加人民生活上的負擔。

第四點，臺灣與大陸當局，對待本省同胞的態度與設施方面，都要充分了解同情他們遭受的種種歷史創傷。

第五點，是有關過度中央集權的問題，就是在統一之後，爲了避免中央集權的弊害，應檢討國體，改爲聯邦制的問題。

最後一點是，大陸對臺灣呼籲和平談判時，必須盡量減除「統戰」式的宣傳壓力，並在各種設施上減少臺灣同胞對統一的疑懼。臺灣方面也不應該在兩岸對流互通方面，拒人於千里之外，要能跨出「海角樂園」，對軍國主義侵華歷史造成的分裂局面，展示協同合作，共建國家的歷史責任感。海峽兩岸或官或民，都要心懷全國格局，致力減少分裂所帶來的不便，以及敵對帶來的惡果。

」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唯一目標。它的外交形象早已由「世界警察」淪爲「武裝流氓」，目前正在進行中的以色列侵略戰爭，美國銷售以色列最新式的坦克飛彈，用來燒殺滅絕成千上萬黎巴嫩的老弱婦孺，美國民意大爲不滿，但官方依然背道而行。這類借刀殺人的事，在美國外交史上並不新鮮。

正因爲第三世界親歷美國外交政策的慘痛經驗，使我們不能不放鬆警惕。康寧祥在演講中表示，自斷交後，國民黨官員不曾受到美國官員如此禮待，因而認爲這是「莫大的光榮」。從康寧祥的一些談話裡，實反映出他和國民黨同樣的依外心理。我們應知道，黨外的光榮與否，是無需靠外國職業政客來加冕的。

以歷史的見證透視當代政治 以犀利的批判剖析現代社會

大地生活

1~10期合訂本

代表著戰後在臺灣新生的一代，
對民主、自由和法治的一項努力。

訂價：國內每卷台幣200元
國外郵費歐美美金14元
亞洲美金10元 港澳港幣50元
（一次合購10本以上七折優待，
5本以上八折優待）
郵撥帳號：555202黃溪南

憂之炎的 中國百感



孔子與傻瓜

據說，孔丘是聖人的緣故，所以被尊稱為孔子。可是，當然的，並不是說春秋戰國時代的人通通都是聖人。那時還有賢人、有貴人，也有凡人，當然也有傻瓜了。

這事情從辯證法研究起來，現在既然還有傻瓜存在，當然聖賢者的孔子也還存在才對。這樣說來，聰明人聽了，一定會嘲笑說：

「別說傻話吧！你知道今天是幾世紀了？怎麼還有孔子存在？」

可是，傻瓜會立刻反問說：

「假如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孔子存在，那麼為什麼不管刮風或下雨，要年復一年的掀起孔子批判運動呢？」

中國自聖人還活著的時候起，就已經有批判孔子的傻瓜們。

孔子當代理宰相那時候，把反對他思想的眼中釘少卯正殺了。當時，孔子說不出殺害少卯正的理由，只說：「少卯正是很壞的人」而已。他

就是害怕受到傻瓜們的批判，所以才這樣說的。

中國的封建時代，在握有權力的人們說來，是非常方便的時代。要想除掉一名反對者，根本就不需要什麼罪名或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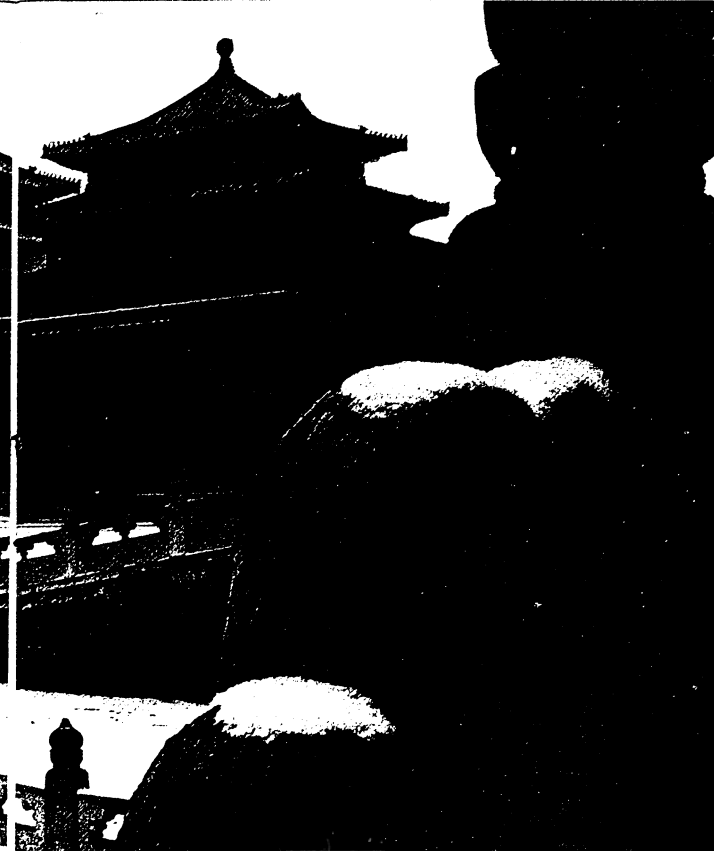
不像現代的要到處開會討論，或請來幾位理論家，調查研究十天半個月，或像舉起刀來左思右想，須怎樣才能一刀將個假孔子批判的爛蘋果劈成兩半那樣，是大不同的。

魯迅也是一位愚笨的老前輩之一，他曾很熱心地反對過孔子。

可是很奇妙的，當時住在山東孔廟一帶的聖人子孫們，却沒有一個人跑到律師那邊，告發魯迅誹謗他們祖先。然而，明明不是聖人子孫的一位化名「狄克」的張春橋，却有了異見。

這位「孔張」先生，後來獲得皇后的青睞而榮昇，差一點就當上宰相。假如他歷代祖先的風水很好，說不定他真的會登上首席之位都不一定。果然這樣，中國又不知有多少傻瓜，要陷入與少卯正同樣的命運了。然後「孔張」先生所作的各種輝煌事跡，一定會受到詩人院長的吟詩頌揚，他的聲名也將遺留後世而不衰。

所幸，四人幫的醜事揭發了，一舉被清除掉。此事受到中國人民衷心的喝采。可是，在這果敢事件結束的背後，又隱隱然的出現了孔子的陰



影。那就是所謂的「禮」或「正統」。

在孔子的學說理論中，以往最受為政者珍視的秘訣，就是這「禮」或「正統」。關於「禮」字問題，中國的歷史學家楊國榮，已作過很明白的解釋。但林彪一夥人却妄加歪曲利用。這個問題，往後傻瓜將再加敘述。

又，關於「正統」問題，傻瓜最近有了很大的發現。

從前常常見到這樣的事情，那就是說，有兩三個協會，為了要顯示自己與別人在本質上有所不同，頭上往往要加個「正統」二字。所幸，大眾並不作與跟著模倣。否則，很可能會出現正統薔薇族協會等東西。

這正統思想，自古就已出現在種種場面。譬如小說「三國演義」之中，就有劉備其人，文武兩道都不行，才智不如曹操，色道也不能與孫權比擬，但只因他與皇帝同姓的緣故，竟然變成皇位的繼承人。換句話說，這就是正統思想了。

到了清朝時代，因為發生過同姓兄弟搶奪帝位的事情，於是這種正統思想終於發展到皇帝的遺囑了。當然，這也發生過假遺囑事件。

誰也沒有想到古時皇帝的遺囑問題，會發生在現代無產階級獨裁的國家裡。因此，當傻瓜們從報上看到這次的新聞報導時，不由的懷疑起自

己的眼睛來。

「這是不是一八七六年的印刷錯誤？」

此次一舉逮捕了四人幫之故，他們的同夥，或是他們培養過來的張鐵生之輩的妖怪或惡魔們，都被剝去假面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為政者的這種英明決斷和行動，受到了八億中國人民的支持。

可是，往後人民會不會繼續支持呢？這要看今後為政者的領導政策與方向，是否真正與人民的利益一致了。這與「你辦事，我放心」的六字或真或假的遺囑，絕不相關。

恰好，在西方聖人的誕生紀念日那天，東方聖人孔子的亡魂復甦了。這就是說：二十年前的遺稿（即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論述基本思想方法的「十大關係論」）被發表出來了。只是這遺稿有許多地方，確實被細心篡改過。

挑選這篇文章加以發表，其用心所在，是在於企圖宣告今後的施政方針與路線。其思想本身是很好的，內容也很正確。傻瓜也全面支持，當然八億中國人民也會加以支持吧！

可是，為什麼新酒非裝入舊瓶不可呢？究竟有什麼價值呢？這一點傻瓜實在想不通。

是舊瓶的牌子好看不成？真的嗎？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正統」兩字。

孔子似乎還活在今天的中國。因為孔子還在，所以傻瓜也確實還存在。



醫院院長 和傻瓜

年來，中國發生了一種奇妙的病症，病名叫做「集體狂熱症」，聽說它的傳染力極大，很可能蔓延到全國。不幸而感染到這種病症的人，個個不是變得癡呆了，就會變成瘋子一樣，完全忘却恐懼。既會使人大聲叫喊，又要使人失盡理性的這種病症，已使得衛生當局驚慌失措。

傻瓜也多少有些不安，假如像一九六一年那樣，全國人民陸續病倒了，那麼，追隨在「四個現代化」的旗幟下，在新任主席背後拼命進擊的人，就可能減少了。

翻遍醫學百科全書，連個病名都找不到，於是再翻看中國現代史，不由的大吃一驚。原來這種病症，是中國自古就已經有的一種病症。

這種病症的首次出現，是出現在很早以前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有一大群的北京大學學生，大聲嚷著在天安門前打轉，口口聲聲叫着「反對政府」或「要求民主、自由、科學」等口號。

可是這種行動，不僅毀掉國家在國際上的面子，甚至使政府的威信掃地。當局於是不得已試圖加以醫治。

所幸，中國擁有齊全的中醫和中藥。馬隊揚起大刀，威嚇驅散輕症的病患，將重症者送入醫院，對無藥可救的患者，則乾脆在長安街上大動外科手術。據歷史記載，當時因病患過多，北京的醫生又不多，加之又通是不曾受過西醫訓練的醫生，因此病症很快就四處擴散，流行了三十年，才絕跡不見。

可是意外的，這種病症又在一九七六年的四月五日復發了。從醫院公共關係室發佈的公報或是傳言，或是過來人所說的話而知，這種病症已潛伏很長一段時間。傳說稱，古時候中國人曾接受過名為孔子學說的血清注射，自此而後，中國人罹患這種病症時，其潛伏時間都要比外國人的更長，有時候甚至醫院院長都會完全忘記，中國還存在有這種病症。

病症復發當時，恰巧北京中央醫院院長身體老邁、視聽力俱衰，說話或是開藥方，都要假院長夫人或秘書們之手，而最遺憾的，就是醫院的總務部長已經去世，於是病症很快就蔓延起來。

四月四日，病人的症狀是，始終要聚集一起、痛哭流涕。病人們是在追悼總務部長的去世，陷入一片悲傷。醫院的秘書們看到情況不對，立刻同院長夫人商量，派出赤腳醫生，將引發人們生病的白色花圈，一夜之間全部撤走。不料這一作法反使人們的病症更形嚴重。至四月五日，終於爆發了中國歷史上永遠留名的「天安門事件」。

那一天，感染這一病症的群眾人數，多達十幾萬人。由於初期處置不當，有幾位病人，竟放火燒毀保健課的汽車以及赤腳醫生們的房舍。

那時，醫院裏的空氣變得非常緊張。職員們四處奔跑，也有一些人，為求心平氣靜，特意閉

上眼睛裝作睡覺模樣。

最忙的是院長夫人。當然，秘書們也跟她背後左右穿梭。秘書們所培養出來的赤腳醫生，個個都還是小孩子，人數也不多，僅憑自己一夥人，確實無法治療十幾萬的重症病人。可是就在這緊要關頭，出現了兩位大功臣。他們首先診斷出民衆所罹患的病名，斷定這種病症須以外科治療。於是立即進行手術所必須的一切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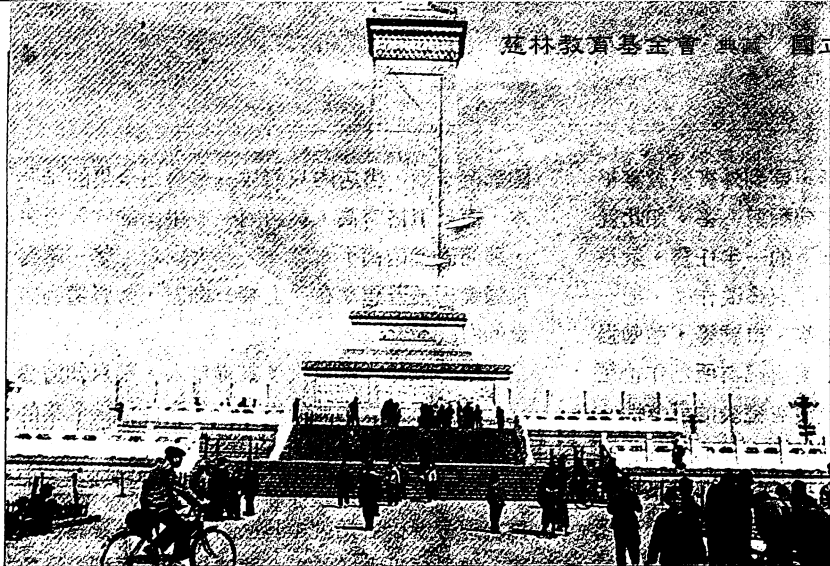
正式進行手術之前，非得先麻醉不可。麻醉工作從五時左右開始，利用廣播車進行。到了九點半，赤腳醫生就在保健課的支援下全體出動。在他們說來，這是首次獲得臨床實習的機會。手術的進行是禁止外人參觀的。因此誰也無從知道病人的治療狀況。只知道被當作手術台用的天安門廣場，其後封鎖三天，每天，日以繼夜用撒水車沖洗血跡。由此可知，這個手術，好像做得不很簡單。



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字報。

大手術過後，兩位功臣當然獲得院長夫人的稱讚與信任。又，「院長夫人派」相互密議，召開院內的全體會議，將長久以來不同「夫人派」合作的副總務部長，扣上一頂「散播細菌，使大眾發病」的帽子，把他開革了。兩位功臣中的一個人，在保健課長保舉下，當了總務部長。這個私人經營的醫院，要如何調動人事或什麼的，第三者是無權干涉的。

可是到了院長死亡之後，新任的總務部長，



「
 酷的鎮壓，而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
 哀悼周恩來「總理」的羣衆遭到四人幫極其殘
 月五日（清明節），十多萬圍衆在紀念碑周圍
 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一九七六年四

竟以院長生前的遺囑爲護身符，把院長夫人等一夥人關到地下室去了。於是這家醫院又再度交到人民手中，並宣言爲公立醫院。

人民大眾爲今後的醫藥費用可能更便宜而欣喜若狂，而原本是院長夫人的功臣們，一夕之間搖身一變就變成人民的功臣了。

從道理上說來，這是一樁很好的事情，人民大眾自此應該可以過個舒適的生活，不再感染那種疾病才對。可是，最近，爲着要請前時被逼下台的副總務部長復出的問題，老毛病又復發了。這事就不是傻瓜所能理解的了。

尤其是這幾天發病吵鬧的人們，試圖追究去年四月五日施行外科手術治病的責任。這樣一來，事情就要牽涉到那二人「合二爲一」的功臣了。因爲，他們決定前此的病名，而且操刀手術的也是以他們爲主，他們就是因爲這一「偉大功勞」而受到院長夫人信賴的。現在他們作出「勇敢的決斷」，將罪大惡極的院長夫人囚之於地下室。這樣看來，最近幾天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近百萬人，是真正的病人了。而且這病症可能會很快就蔓延到全國。

很遺憾的，新院長所接過來的赤腳醫生，爲數不多，不知道他要怎麼辦才好。

想到了院長以及其代言人的功臣們，傻瓜實在抑不住心中的憂慮和焦躁。

近二十多年來，中國青年之間，有兩句話在流行著。那就是：

「學得數理、物理、化學，天下便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駭怕。」

「即使撥撥算盤也好，決不當作家。」

前句話是說，只要學得理工學系的技術，無論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在社會上掙得相當的地位，在政治運動方面，也可以輕易突破難關。

第二句話是說，就算當了商店店員，或去從事農業人民公社的會計工作都好，絕對不去當作家。

爲什麼青年人在這二十幾年裏，那樣地不喜歡當作家呢？

自從一九五二年，魯迅弟子胡風的反黨事件後，中國的作家在基本上，被劃分成以下的三類。

其一是「傻瓜派」。「傻瓜派」喜歡說些真實話，在社會上一看到矛盾事項，馬上就要以文字表現出來，因此每次都被扣上反黨或是反祖國、反人民的大帽子，遭到壓制。傻瓜派只得一輩子一邊勞動一邊改造思想，或是悔改以往的所作所爲，當一名清掃工人而已。

即使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一旦被貼上「傻瓜派」的標幟，也只好到圖書館去靜靜地整理或修補些古籍。而且每年還得去公安局幾次，證明自己的清白。反革命的帽子，不僅一輩子去不掉，而且還要麻煩到家人和親友。

其二是「奉承派」。是二十年間可以不寫一字而依舊列名於中國作家協會的人們。運途好的人，更可獲得人民代表或是友好協會理事等要職。



作家和傻瓜

平常開會時說些奉承話，見到外賓便設宴招待，按照「人民日報」的文句酬對一番。如此就可以完成任務之一半了。剩下的一半任務，就是替上級指示要培養的工農兵作家修改作品，把一大堆錯別字或不明道理的教條、口號等，勉強強修改成三流政治文學。設使自己有所創作也絕對沒有發表的勇氣，而且也沒有發表的可能性。何況在今天是對的事情，明天就會變成錯的狀況下，寫起東西來，很可能在一夕之間失去以往的地位。這種事情，聰明的人是絕對不幹的，因為太愚蠢了。

屬於第三類的作家是「御用作家派」，為首的當然是郭沫若老先生了。老先生曾經寫過頌揚蔣介石功績的文章，也寫過稱史大林為爺爺的詩章，更把毛澤東捧作太陽，最近又發表了頌揚新主席的新著作。傻瓜唯恐他當時不小心抽錯部份文稿，將早先頌揚四人幫的文章拿出來而替他捏了一把冷汗。傻瓜可以有十足的信心賭注，老先生家裏至今還保存有那份草稿，沒有燒掉。

這十幾年來，四人幫把中國文化界完全掌握在手中。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國文化的發展都停頓下來了。

可是，有一部分熱愛毛澤東甚於自己祖先的「日本朋友」，却要反駁傻瓜的意見。傻瓜要請教這些朋友，這十多年來，中國究竟有過什麼文化上的成果？

最悲慘的就是作家，上一代人成了階級鬥爭的對象，不是被鬥了，便是在失意中自殺死亡，而年輕的一代，便走向「好鐵不打釘」了。有抱負、有骨氣的人們，誰也不願意加入「御用作家派」陣營。只有少數野心家，拼命地想往上爬。然而這也會在轉眼間遭到嚴重的打擊。這樣，究竟有幾個人能殘存下來？

日本的學者或青年，好像都很喜歡閱讀中國作家魯迅的作品，可是在中國，魯迅的作品却未必受到應有的評價。四人幫將此一罪過轉嫁到舊當權派的文化界泰斗周揚身上。據說那四個人從前在上海的時候，曾以周揚為首，藉著中國共產黨在文化上的領導權力，對魯迅施加過壓力。或許就因為這個緣故，新「中國」成立，周揚當了文化部長後，也仍然給魯迅的作品以掣肘。

有關這一點，傻瓜很瞭解。因為傻瓜還在中

國那個時期，書店內只擺放一些魯迅全集的精装本，而且價格奇高，從中國一般平民的收入看來，那簡直就是高不可攀。因此大家只能望一望書皮過癮，誰若想拿在手上翻一翻看，勢必遭到店員的白眼。

情況如此，所以大多數青年人，都只知道魯迅之名而不會讀過他的作品。何況能讀破全集的人便少之又少了。

不料，四人幫被捕後所發表的資料，竟然把副總理張春橋自始就領頭反對魯迅之事暴露出來了。使得傻瓜大感詫異，同時終於領悟到當時魯迅的境遇是何等的艱難、複雜。

對於某些人來說，有時候，早死一點，可能反而是一種幸福。假如魯迅今天還活著，你想情況會怎樣？

他縱然可以逃過一九五二年的那個大災難，恐怕也過不了一九六七年的危橋吧。一位有榮譽的近代中國文學家，同時也是思想家的魯迅，也可能會到北京圖書館去當一名清潔工吧。他的獨生子周海嬰，也可能落得在北大荒的勞改場耕作土地，無法到日本參加紀念他父親的盛大儀式了。

傻瓜少年時候喜歡玩足球，放學後，書包一扔便往外跑。因此作文時，只在課堂上寫一寫而已，勉強可以獲得滿分。不料我的作文簿竟被母親的好友許廣平女士看到了，她深深感嘆說：「今後的中國很需要作家呢！」

回想起來，許女士一定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國青少年步上魯迅所走過的路。可是，為什麼他的獨生子周海嬰却不走向作家之路呢？

唯一可以說的，可能是中國不需要描寫真實、批判社會矛盾、據實描繪人民生活的作家吧。那麼要怎樣才能使中國文化再度發展起來呢？

但願天安門廣場上的青年們的吼聲，能更為響亮一點。

書介



蔣勳
詩集
「母親」

「母親」是蔣勳的第二本詩集；早在這之前兩年，他的第一本詩集「少年中國」曾廣泛受到海、內外讀者的矚目。

蔣勳的「少年中國」詩集的誕生，對此地現代詩的發展而言，無疑是相當大的震撼！回憶七〇年代以降的現代詩壇，我們將不難看出其影響與重要性；首先，蔣勳以極其樸素而真切的聲音，找回了失落數十年的中國現代詩魂，在他的一首首文字易懂、意思明確的作品中，我們強烈地意識到詩不再是遠離社會、人生、現實，甚至是荒謬、模糊、空洞的東西了，詩乃是建立於活生生的歷史、文化和同時代人的經驗中，是一種有生命力的藝術。再則，由於這種回歸到「人」本身來的美學認知，現代詩展露了它豐富的民族個性，不再貶抑為西方審美標準下的附庸產物，從而能更平實與客觀地反映斯土斯民的現實生活。

而「母親」基本上也是延續者這樣的精神而完成的作品！

「母親」搜錄的是一九八〇年到八一年這兩年內所寫的四十幾首詩，其中還包括了一首五百行的敘事詩「母親」，就作者所言，這是他「最想寫的一個題材」，因而，以此為詩集的總題。

「母親」這本詩集，作者以一長序交待了他對詩與生活的看法。蔣勳說：「詩只是生活的餘

燼罷了。如果找不到詩，只是因為找不到勇敢而熱情地生活著的人吧。」他又說：「如果生命可以不斷燃燒成火焰，為什麼我要低迴在這逐漸涼冷下來的餘燼四周？」基本上，蔣勳是一個忠於生活的創作者，他不喜歡斤斤談論「詩」該如何寫，是什麼，他只願認真地去生活，誠懇地去寫詩，此種觀點，對台灣的現代詩壇而言，自然是一大突破；它重新塑造了以人本出發的審美觀，更檢討了長久以來存在於詩壇的僵斃、虛矯的形式主義詩風。讀了這篇序言，相信有助於讀者更深入去欣賞蔣勳的作品。

這本詩集四十多首詩當中，有個人生活的幽思、靜觀、反省；也有在面對悲苦生命時，發自內心的悲憫與祝福；更有在時代洪流的排盪中，深厚雄渾的批判與經由犀利的批判之後無盡的體恤與關懷。

因而，蔣勳的聲音雖是激昂、淒厲，却不失一番深邃的思省！

收於「母親」這冊詩集的作品中，有些是那麼激亢、那麼劇烈的疼痛，表現得那麼悲憤，譬如「東京夜」、「悼席德進」、「家鄉的女郎」、「我懷著巨大的憂傷」；另有些則呈現出繁富的風貌，像是走過了一片廣大的原野，凝視著欣欣向榮的萬物，除了讚嘆，心中還有一份深深的謙卑，是面對生命的磅薄與廣博時的一種虛懷與寬容，譬如「給鑑真和尚」、「島嶼」、「祝福」、「青春」、「種子」、「寫給雅美的孩子」、「寫給李白」、「中國——我對你一聲聲嘆息」、「大雁」，還有那首氣勢雄渾的五百行長詩「母親」。其它則傳達了作者走過城鎮、鄉間、遠渡異國、他鄉，在自己的泥土上翻滾時的感傷、體悟，在離鄉背井的異國上對家鄉的關懷與眷念。

這是一本很難得的詩集，它以誠摯的筆觸，刻劃了這一片土地上人們的生活，無論是辛酸、痛苦、或是喜悅、歡騰，都流露無遺。

母親

郵撥／189456 定價／七〇元
出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蔣勳

■本刊編輯部

今日台灣兒童



快樂的天使

台灣三十多年來的安定和經濟的發展，基本上已提供新生一代的兒童，一個不虞匱乏的物質基礎。不管在山地，在農村，在大城或小鎮到處均可看到健康、歡樂、可愛的兒童。但是，錯誤的發展觀念所建構的環境和價值觀，正逼使我們的兒童逐漸陷入另一種不安定和匱乏……。



低階層社會的殘障兒童

錯誤的發展所導致的悲劇中，最明顯的便是殘障兒童的逐年增加。而受害最深的莫如低階層民衆，他們因為貧窮而更接近污染區；也因為貧窮，而無法受到正確的醫療服務，因而產生更多的殘障兒童。我們的社會並沒有一套健全的制度，向他們伸出援手。許多父母便將他們殘障的幼兒置於公共場所，希冀在引起路人駐足觀望之餘，因為同情而給予施捨。



協助家庭謀生的兒童

一般兒童的生活，不僅嬉戲和接受學校教育，他們也在從事簡易的日常工作中受到鍛鍊。但是，家境不佳的兒童却必須出外工作，協助家庭謀生。他們有的成爲地下工廠的童工，甚至成爲野台戲班扮演小丑或跑龍套的小戲子……。這些童工的處境是隱藏的社會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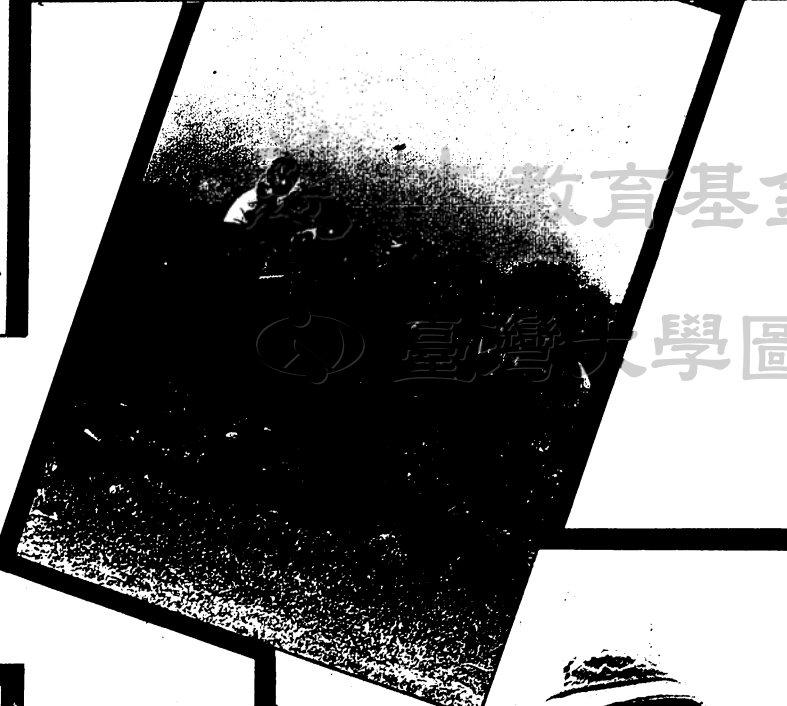


林教育基金會典藏



在田野中工作的兒童

在農村的兒童，協助家務和農務是很平常的現象。雖然他們也有被剝奪教育和遊戲的時間的現象，但是，他們的處境，比起地下工廠的童工是有天壤之別。





兒童的天地

隨著經濟的繁榮，我們的社會似乎愈來愈無法提供更佳的环境給兒童。城市缺少空間和綠地，看電視成為都市兒童最主要的娛樂。相形之下，鄉村的兒童戲於田野間，擁有更歡樂的童年。



論殺人不見血的 「醫療廣告」

■思明

楔 子

- 奇應丸驚風散藥效太驚人·當心寶寶服用送小命（民生報72.2.23.）
- 病人服用過量抗生素·將會造成病毒性肝炎（中國時報72.3.4.）
- 藥物過敏·五人喪命 衛署通令停用「痛可寧」（民生報72.3.8.）
- 濫用抗生素·現象太普遍（民生報72.3.16.）

上面幾則最近有關醫藥的新聞，令人觸目驚心。平常我們對於在電視廣播以及報章雜誌上虛偽不實誇大的醫藥廣告，却能處之泰然的接受，而沒有人（有也非常少）提出異議。您知道嗎？當我們保持沈默時，我們的消費者基本主權已經受到剝奪；當我們對於吃虧上當，以「能忍則忍，吃虧就是佔便宜」的傳統精禱來相對待時，却是引來更多的欺騙及對消費者主權的戕害。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型態中，廣告所扮演的角色，可說是居間左右的重要功能，若任其濫用，而致誤導了消費者的消費意識和行爲，則後患無窮。有鑑於此，今日消費者運動已將消費者主權提昇爲每一國民的基本人權；納稅就是消費（雖然是義務但涵義上亦是消費），人民有權知道政府如何用錢及其機構運作績效的良窳。權利是積極爭取得來的，但要爭取則必需先要瞭解真相，所以筆者乃從與我們生命健康有關的醫藥廣告著手，介紹一、二，以饗讀者。

被扭曲的消費者需要

政大法律系客座副教授蘇永欽博士在其一篇消費者保護法——一個新法域的誕生？——文中對於不公平權力分配的消費者與生產者關係如何受到廣告的影響有如下的分析：「被扭曲的消

費者需要——隨著市場愈趨複雜，商品種類的爆發，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很少再有直接溝通以了解商品的機會，主要的媒介就由廣告擔負起來。廣告成爲工商業的必要投資和消費者的消費指南。然而它一方面 是消費者主權的見證，另一方面却也使消費者的真實需要受到系統的扭曲。美國著名經濟學人，『富裕社會』的作者蓋布瑞斯（J. Galbraith）就曾慨然系之：『想像中的消費者的真實需要在企業家一手導演的消費社會裏已經不存在了。』……如果廣告或其他所謂『行銷策略』（Marketing），利用資訊溝通結構上的天然優勢，妨礙消費者的真實需要反應於市場，就有加以規範的必要了。型態上諸如利誘廣告（Wertreklame）、暗示性廣告（Suggestivwerbung）、騷擾性廣告（Belastigende Werbung）、誤導廣告（Irrfuhrende Werbung）、兒童廣告（Kinder-Werbung）等，實質上干擾了消費者的決定自由。……」

消費者因受到廣告的影響，使真正的消費需求被忽略，而不必要的消費需求（非自然的真實需求），可說常是由廣告喚起的甚至是廣告製造的需求。因此廣告的適度規範就成爲民主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中消費者保護的重要課題，也是自由經濟制度下的必然趨向。

醫師業務廣告與消費者保護

筆者現在就有關醫師方面的廣告規範，由法律的規定與現在泛濫在傳播界的違法廣告說明如下：

一、醫師法

第十八條：醫師對於其業務，不得以自己、他人或醫院、診所等名義，登載或散佈虛

環境與公害

偽、誇張、妨害風化或其他不正當之廣告：其管理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訂之。

二、醫師業務廣告管理辦法——立法依據即醫師法第十八條行政院衛生署71.11.18.衛署醫字第40二一八五號函辦理。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醫師業務廣告，係指利用電視、電台、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戲院幻燈或其它傳播工具為宣傳方法者。

第四條：醫師業務廣告，應以文字或語言為之，不得以圖片表示，其內容以左列為限：

1. 醫院診所名稱、醫師姓名及性別、證書及執照字號、通訊地址、電話、交通路線。
2. 診療科別及診療時間。
3. 開業、執業、遷移執業處所、復業、停業及其年、月、日。

第八條：醫師登載或散佈業務廣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由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依醫師法處以罰鍰，得視情節輕重移付懲戒：

1. 虛偽誇張者。
2. 妨害風化者。
3. 歪曲事實者。
4. 利用公開答問作宣傳者。
5. 廣告未經核准或擅自變更核准後之廣告內容者。
6. 假借他人名義宣傳者。
7. 以醫師學位作宣傳者。
8. 利用出售醫療刊物刊登廣告者。
9. 利用祖傳或秘方作宣傳者。
10. 以專治癌症、性病或其他疑難雜症宣傳者。
11. 以整形美容為宣傳者。
12. 其他利用大眾傳播工具為不正當之業務宣傳者。
13. 其他違反本辦法規定者。

三、違反前二項所列舉事項者則有醫師法第二十九條之規定懲處之一——「醫師違反本法規定之義務者，由衛生主管機關處以二百元以上、一

千元以下罰鍰，並得視其情節輕重移付懲戒。……」

由前面三項的規定可知法律在醫師廣告上的規範是詳細而週密的。而至於現在報章雜誌上、廣播（AM）及某些電影院的廣告，明顯而公開的違法醫療廣告不可勝數，合法的醫療廣告反而罕見，這種非法凌駕合法，以違法為常模的社會取向，不僅使法律蕩然無存，甚且會誤導人民於無法的亂民政治。更不消說其對於消費者主權的戕害是至深且鉅了（如附表一及二）。諸君可明顯的發現其違反醫師法第十八條及醫師業務廣告管理辦法第八條之各款規定。消費者天天在此種充滿暗示性、誤導性、甚至妨害善良風俗（如淫穢及鼓勵墮胎）的廣告下，其字句危言聳聽之程度，除了使讀者或砰然心動、或飽受威脅（好像有病才是正常的，反倒而疑心自己是否得病了？）之餘，更將大量可能不正確的醫學及疾病知識傳播給無辜的讀者。再加上傳播工具很少有系統性的介紹正確醫學常識，而大眾化的醫藥雜誌僅「健康世界」的規模和水準較好外，其它則付之缺如，再加上國內教育體制中由小學到大學，幾乎沒機會接受到正確的生理衛生與醫療保健的教育。在種種原因糾結下，報紙對於醫學常識的傳播上居於主導地位，更加深了大眾傳播中違法醫藥廣告對消費者保護教育扭曲的嚴重性。在錯誤的醫藥知識誘導下，而有不正確的求醫態度及求醫行為（師大衛教系吳就君發表在公共衛生季刊第七卷中指出台灣地區民眾求醫態度與行為是分離而不健全的，所謂的中醫、西醫、西藥房、民俗療法，或其一或其二以上合併的治療是常見的。）因之也造成台灣地區醫療體系不健全及無法建構完整的醫療政策及醫療制度，這是醫學界引以為憾的。這種醫藥廣告所誤導的求醫取向偏差，亦是台灣醫療制度現代化的一大阻力。類此層層引發出來的醫藥問題併發症，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嚴格執行違法廣告取締

至於醫藥廣告為何會落至今日此等紛亂的場面？揆其主因，除了罰則過輕稍有瑕疵外，乃是

環境與公害

執法者未能善盡其責而致刊登違法廣告者圖存僥倖之心（偶或被取締，只不過罰六百～三千元，小意思，比廣告費還便宜；嚴重或屢犯時，移付懲戒亦是警告而已。），以致於處罰失其原義而不能收嚇阻之效了。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並非「聾子的耳朵」擺著好看，有了良好的法律，仍舊有盡責的執法者，那麼一個健全的社會才得以建立。（註：此處的執法者乃指衛生局「通常是報章雜誌海報的違法取締」、新聞局「通常包括報章雜誌及廣播電視的違法檢舉和取締」、醫師懲戒委員會「管醫師懲治處理」。）

為何執法機關未能有效執行違法取締呢，這可就一言難盡了，一言以蔽之，行政官僚體系僵化有以致之。在下者（職員或小科員）抱怨法令處罰過輕，有罰等於沒罰。而上位者則聲稱上令無法下達，或基層的公務員辦事能力太差。所謂的民意代表的壓力或紅包攻勢，所謂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加上罰則的規定過輕，只有輕微的行政罰（而行政罰的特性是可以訴願、再訴願及行政法院層層上訴），使得法令的執行似乎是困難重重。豈不知除了前述的官僚作風外，大眾傳播無法自清自律，使得消費者保護運動窒礙難行、消費者教育嚴重欠缺（教育部竟然公開反對），以致消費者主權的被漠視。

令人失望的消費者保護法

再則由此我們亦可看出我國民主政治的困境，即實行了三十多年民主憲政的台灣，議會政治仍無法發揮確實監督政府及充分反應民意的積極功能，問題何在呢？研擬了兩年，邀請了許多專家學者參與，也辦了公聽會，並公佈法規草案接納民意的種種作法。却料不到訂出來的消費者保護法草案（現正送立法院審議），却是太令人失望了（見72.3.4.中國時報消費者基金會柴松林教授指出：十大事項未作規定。如何能保護消費者？），草案已經如此退縮，以後訂出來的法案能保護消費者嗎？想到此，真令人難過，一個社會運動最怕的危機就是將一社會問題制度化（立法）後，發自民間的草根性運動就此走下坡（一者因政府機構的專斷管轄權，再則民間易蒙於「我

要的，政府都給了」的假相而不再支持消費者運動。）豈不知一個改革的社會運動在此當兒，倒是更需要大眾的參與投入，監督政府機構的執行以及隨時反應法令不週全及改進，以迄社會問題的完全解決。

看到這幅行政官僚體系僵化的凋蔽景象，而民主政治的運作似是匍匐前進，我不禁要痛心的指出：難道為了建設一個三民主義模範省，為了建立一個健全的法治社會，我們不該大刀濶斧改革行政官僚的作風，確實依法行政，革除積弊取締非法，重建社會的新秩序。也藉此予消費者保護的措施能具體落實，達到積極保護消費者的理想目標。

保護消費者的第一步

蓋消費者與廣告的規範的關係，猶如疾病自然史三段五級的預防工作中的第一段第一級是促進健康（譬若消費者主權意識的喚起和消費者教育），第二級是特殊保護（譬若消費者保護法的有關規定、及其方法的保護措施。）總之，廣告的管理及良好規範是保護消費者的第一步，諸位以為如何呢？

在高唱醫療服務是一項基本人權的今日，為了使消費者得到最好的健康保障，為了使社會公義得到實踐，使全國消費者皆能獲得適時適質適量的醫療服務和指引，筆者在此誠心的呼籲有關單位——請重視醫藥廣告管理吧！

結語：爲了權利感情而爭 爲了人的社會價值而爭

消費者運動，「爭」的不只是錢的價值，更是人的社會價值（見蕭新煌教授「對國內外消費者運動的一些觀察」一文）。在此我願引用德國法學權威Rodoff Von Jhering的名言作爲註腳：

「堅決主張自己的權利，不是由於利益，而是出於權利感情的作用。」

「爲權利而力爭是權利人受到損害時，對於自己應盡的義務。」

公 / 害 / 日 / 誌

編輯部

| 項 目 | 地 區 | 公 害 內 容 | 附 註 |
|-------|-----|-----------------------------------------------------------------------------------------------------------------------------------------------------------------------------------------------------------------------------------------------------------------|--------------------|
| 公害追蹤 | 嘉義縣 | 被民衆自高雄縣林園鄉趕出的台灣阿米諾酸公司，轉移陣地到嘉義縣太保鄉嘉太工業區設廠重起爐灶，雖已謹慎的將公司名字改為台灣胺基酸公司，但是仍被當地居民察覺，引起鄉民激烈反對，聯名向代表會、縣府陳情，只是礙於該公司已獲經濟部核准在案，無法加以制止，只能以協商方式設法防污，不知道最後會不會再引起類似中門村事件。 | 72. 2. 6. 台灣時報 |
| 污染管制 | 全省 | 行政院衛生署籌設台灣地區空氣污染監視網，預定明年底前辦理完成，將可隨時掌握台灣區各主要都市的空氣污染狀況，採取機動管制。看來大家要想瞭解自己居住環境的空氣污染程度，要再等個二年了。至於什麼時候才能呼吸到不受污染的空氣，等著吧！ | 72. 2. 20. 各 報 |
| 垃圾污染 | 苗栗縣 | 由於有關單位的缺乏管理，苗栗市埔尾附近的後龍溪堤防已成為苗栗市第一大垃圾場，原屬市民們晨昏散步好去處的溪畔，由於廢物堆積如山，臭氣薰天，已無人敢再涉足了。 | 72. 2. 22. 台灣時報 |
| 工廠公害 | 桃園縣 | 桃園地區在近些年來，人口遽增，工廠林立，已經發展成為現代化的工業都市，這本是件可喜之事，然而却由於過於密佈的工廠設置，無形中帶來許多公害。據民衆反應，桃園地區的公害情形，實在非常嚴重，常可見到濃厚的煙層，以及聞到化學藥品惡臭，已經直接影響居民身心健康。但是很遺憾地，衛生單位的取締執行工作並不積極，民衆嘖有怨言。爲了萬全之計，咸盼有關單位儘速施展鐵腕，嚴懲違法業者。 | 72. 2. 12. 民衆日報 |
| 垃圾戰爭 | 彰化縣 | 員林鎮公所與東山地區民衆僵持近五個月的「垃圾戰」，由於現有垃圾場期限的到來，爭執愈趨白熱化，雙方各出奇招。東山地區民衆廿日再度將通往南東里土窟坑垃圾場預定地的道路以鐵柵欄鎖住，以防鎮公所進一步施工。民衆們認爲此一垃圾戰若繼續下去，勢必戰火升高，實非員林鎮之福。 | 72. 2. 21. 自由日報 |
| 鉛 污 染 | 台北市 | 七年前，台灣大學曾發表一篇有關汽油加鉛對人體健康影響的報告，當時檢驗結果已顯示，台北市民及交通警察都有相當嚴重的體內鉛污染，因此建議停止在汽油中加鉛，但沒有引起任何反應。據估計當時每天有四百公斤的鉛排入大氣中，七年後，台北市的交通流量已顯著增加，可見排在大氣中和沈降在馬路上的鉛想必更驚人。大氣中的鉛可從呼吸器官、皮膚或口腔進入人體，對人體造成慢性中毒；馬路上的沈降鉛可能排入河川，造成嚴重環境污染。可惜國內的汽車大部份只能使用加鉛的汽油，造成改弦更張的困難，不過爲了全體國民的健康着想，衛生署還是該早作定論。 | 72. 2. 16. 聯合報 |

石油革命與南北制衡

石油降價與策略的分析

■侯立朝



一、南方的石油價格革命

石油漲價對這個世界的經濟有衝擊，石油跌價對這個世界的經濟也有衝擊，可見這個世界的經濟是不健康的。

這個世界的經濟不健康的表現，就是在石油漲價之前，它是「加速經濟」，有高度的實質成長率，在石油漲價之後，它是「減速經濟」，即低度的實質成長率。1963—1973 三邊七國經濟的實質成長率如下表：

| 國別 | 經濟實質成長率% |
|-----|----------|
| 日本 | 10.2 |
| 法國 | 5.6 |
| 西德 | 4.8 |
| 義大利 | 4.7 |
| 美國 | 4.2 |
| 加拿大 | 4.6 |
| 英國 | 3.0 |
| 平均 | 5.3 |

這樣的實質成長率，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成長率要高，也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到拿破崙戰爭之後這一段歷史時期的成長率要高，所以說它是「加速經濟」，即加速成長的經濟。甚麼原因使它加速？客觀地說有這些原因：石油價錢便宜，初級原料商品便宜，生產技術進步，管理技術進步，資本充裕，勞工便宜，人口增加，市場活躍，消費掛帥，通貨膨脹，冷戰競賽，韓戰、越戰。前兩點原因，就是工業帝國主義對於「第三世界」資源的剝削；最後兩點原因，是戰爭刺激經濟需求；中間的生產技術進步、自動化管理、消費掛帥、通貨膨脹這幾點原因，才是工業帝國主義自造的本錢，即經濟觀念的改變、經濟技術的改變、經濟金融的擴張，用來剝削別人，肥大自己，而有經濟實質的加速成長。

如此一來，也就改變了世界的形勢。由戰後第一個十年的「東西冷戰」，演變到第三個十年的「南北對抗」，這中間還有第二個十年的「東西和解」的醜劇。他們提倡東西雙方「和解」，共同來壓迫「第三世界」。也就是提議由富強的北方（包括自由世界工業國家和蘇俄）來主宰貧窮的南方（包括有石油的國家和有資源的國家），這就刺激了南方的覺醒，要聯合起來對抗工業帝國主義的第一世界和社會帝國主義。在東方圈

子中，波蘭工人革命、匈牙利知識份子革命、捷克自由化運動，擔任了反蘇的角色，即反對社會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在西方圈子中，不結盟國家組織，OPEC（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以下均簡稱OPEC），擔當了反三邊的角色，即反對工業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從這樣的國際背景中，我們才能理解OPEC的精神。它代表了南方的覺醒，它代表了反工業帝國主義的剝削，它代表了反西方的壓迫，它代表了民族的尊嚴，它代表了個人的尊嚴，它代表自由反不自由，它代表了平等反不平等，它代表了自主反不自主！不是由於OPEC製造了經濟危機，而是由於西方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才逼出OPEC。所以，對於OPEC的認識及其自覺的人道的精神，決不能接受西方「媒介帝國主義」的傳播者所傳播的那樣，把一切的罪惡都推到OPEC的身上；必須用因果關聯、歷史關聯來理解OPEC的對抗功能和制衡功能所代表的南方人道精神，來抵抗北方的霸道作風。

即使在1960年OPEC成立時，驕傲的西方也毫不在意，他們一貫地認為南方人民是天生的愚！是天生的弱者！是天生的奴隸！是上帝替白人安排的工具，不必重視他們的要求，也不必重視他們的自由、生命和財產！往昔是我們的殖民地，今天他們獨立了，他們仍然是我們的工具，事情沒有變得兩樣。所以，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中，英法仍要以槍砲去鎮壓。到1960年OPEC成立時，他們仍然認為這是一個無聊的組織，給那些酋長們一塊巧克力糖吃，問題就可以擺平。甚至，日內瓦當局在1960年，還拒絕OPEC在該市設立辦事處，OPEC不得已才選定維也納作為會址。當然，西方七大石油公司和西方政府，都不承認OPEC的組織，甚至要「擊破OPEC」！直到1970年9月利比亞的格達費武裝革命成功，把石油自主權強制收回之後，西方代表才找OPEC商量，等於才正式承認OPEC組織；也必要等到1973年石油禁運和第一次大漲價之後才認識OPEC的抵抗力。到1979年石油第二次大漲價之後才認真地去檢討他們自己「停滯膨脹」的經濟。這兩次「石油危機」恰好又與1973年10月「以阿戰爭」和1978年12月「伊朗政變」連在一起。美國支持的以色列和巴勒

維政權，都被擊敗，西方經濟也因為這兩次石油價格革命的衝擊，由「加速經濟」變成「減速經濟」。1974—1982三邊七國平均實質成長率較前十年下跌一半，只有百分之二點五不到。OPEC這兩次油價制衡的成功，替南方被壓迫的人民出一口氣，但制服頑強的三邊國家仍須努力。1973和1979兩次石油價格革命如下表：

| 1973 | | 1979 | |
|----------|-------|--------|-------|
| 1月 | 2.59 | 1月 | 13.34 |
| 8月 | 3.06 | 3月 | 14.54 |
| 10月 | 5.11 | 4月 | 20.00 |
| 11月 | 5.17 | 6月 | 23.50 |
| 12月 | 5.17 | 12月 | 30.00 |
| 1974-1 | 11.65 | 1980-1 | 34.00 |
| ·每桶美元官價· | | | |

對於石油第一次價格革命給予世界的影響，尤耳金（D. Yergin）說：「1973年12月底油國的禁運與價格上漲五倍多，在五年後的今天看來，這次的禁運以及它的後果，無疑的可以列為二十世紀的一件大事。忽然間它改變了國際政治的權力均勢，甚至權力的本質。經濟問題和能源問題一度只是專家感興趣的課題，但現在却成為人人關注的政治大事。在財富與權力大幅度的變動下，工業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關係也急遽的轉變。當年OPEC成立的時候，報紙只有幾行字的報導。但今天，OPEC石油部長會議却成為世界新聞媒介一再刊載的重要消息。……1970年代初美國大舉進入中東石油市場，造成石油禁運與油價暴漲發生的條件。基本上中東和平仍無法消除國際石油市場的嚴重失衡。由於這種失衡，如有其他重大事件發生仍可能導致供給中斷，石油危機仍有復起的可能，其危害程度可能還要比1973年那一次嚴重。」他的話音剛停，伊朗政變，第二次石油漲價的衝擊就開始了。

1979年石油價格的大漲，是受到石油消費國預期心理的壓迫才暴漲的。因為該OPEC預訂分四季調整油價，可是在第一季末現貨石油市場，每桶漲到20—23.5美元，因而加速石油官價的調整。也就是由於這第二次石油價格革命給予世界的衝擊，三邊七國高峰會議才正式帶有決心地去控制他們自己的「通貨膨脹」，和認真地去

調整他們自己的「減速經濟」。如若不如此，他們仍會像 1974—1979 那樣期待有一個很快復蘇繁榮的夢，也就是懷念凱因斯主義的舊夢、和想「擊破 OPEC」的老夢。

二、北方三邊七國經濟的徬徨

1974 年的世界經濟，是一片漆黑不見光明。紐約、東京、倫敦、巴黎的霓虹燈暗然無光，「經濟大國」撩人的俗氣和誇耀的傲氣都不見了。但是他們的統治階層短視而又無知，却仍然心有未甘情有不甘地頒發一批「經濟學家」、在高唱「短期可以復原」的無聊之歌，這就是所謂三邊七國高峰會議的總調子。

1975 年三邊七國高峰會議，是爲了應付南方石油價格革命的會議。首先是法國總統季斯卡的提議，於 1975 年 11 月 15 日在巴黎近郊的蘭堡葉召開第一次會議。參加的是英、法、西德、日本、美國、義大利六國的行政首長，目的在於研商由於「石油危機」之後的世界「金融危機」產生的新問題，以謀求國際貨幣的安全，而安定世界經濟秩序。經過西德總理施密特的擴大提議，又把石油能源、國際貿易、經濟衰退、南北問題加入研商，廣泛而不切實際。研商的結果，對於恢復經濟景氣、消除保護貿易、安定匯率、節約能源、協助開發中國家輸出、技術移轉、收支赤字等問題，都未獲得實際的解決辦法。特別是對於石油危機沒有作長期性的注意，仍把它視爲是短期的「政治性」的突發問題，因而對經濟的長期繁榮，仍作樂觀的預期，暴露了他們大國的優越心理。

1976 年第二次高峰會議，六月間在波多黎哥的聖古月安舉行，此次會議增加了加拿大，成爲三邊七國會議。這一年的世界經濟由「停滯膨脹」到「暴跌膨脹」，出現了經濟危機的新類型而深刻化，才驚醒了三邊七國的優越感，也打破了凱因斯主義的理論。但是他們仍對舊屍體眷戀不已，以爲可以憑藉「總體經濟學」及「高度生產力」，就可以把經濟衰退克服，重新返回繁榮的夢鄉。所以，美國總統福特，提出「反膨」與「救衰」兩全其美的辦法，想在穩健的貨幣政策

中推動經濟復蘇成長。在宣言中他們說：「恢復均衡的成長似已在望，我們不願坐失此一良機。現在我們的目標是有效管理通貨的擴張，使這種通貨的擴張持續而減少失業，並避免新的通貨膨脹。」這是自欺欺人之論，既反不了膨，也救不了衰。

1977 年五月，倫敦的高峰會議，是在美國總統選舉卡特擊敗福特之後舉行的，福特的反膨救衰「兩全其美」的經濟路線被打敗。這一次會議的主題，在謀求經濟復蘇正常化。他們仍未覺悟「能源主權」、「資源主權」與「工業主權」、「技術主權」對抗的新形勢，所以在這一次會議的公報中，仍然充滿了工業技術的大國沙文主義，而要以美國、日本、西德負起經濟火車頭的任務，帶領世界經濟走向成長的正常化。他們說：「七國保證今年將達到經濟成長的目標，即使必須採取新的刺激措施，也在所不惜。」這仍然是以通貨膨脹來救衰，等於火上加油，自焚而自絕。

1978 年七月波昂的高峰會議，檢討了三個火車頭的各行其是。日本與西德控制成長，並擴充貿易盈餘；美國節約能源失敗，美元匯價下跌。公報在強調新的分工，它說：「我們將透過確保成長的措施及發展必要的技術，來增加就業。爲期減少國際收支剩餘與赤字，我們需要在不引發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來提高經濟成長，這將減少不穩定性的匯率變動。爲確保穩定的無通貨膨脹的經濟成長，面臨不同情況的各國，應採取不同的措施。即在國際收支有盈餘而又是通貨膨脹低的國家，應提高國內需求，其他國家則應採反膨措施。」這是美國、日本、西德三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說明，美國在抱怨了！

1979 年六月東京高峰會議，恰巧碰上第二次石油漲價先頭的衝擊，「能源問題」列爲首要問題。東京會議宣言說：「波昂高峰會議達成的協議，有助於改善世界經濟，若干國家有較長的成長，國際收支失衡下降，通貨獲得較大的穩定。但新的挑戰已經出現，在多數國家正趨平息的通貨膨脹，現在又死灰復燃。較高的油價和石油短絀，已經降低了我們每個國家經濟政策可以運用的餘地。它們將使工業國和開發中國家通貨膨脹惡化，並降低成長，不產油的開發中國家受害

更大。當務之急，是削減石油消費，並加速新能源的開發。」節約石油消費，從此年才真正開始，但通貨膨脹之火並未熄滅！

1980年六月，威尼斯高峰會議，由於蘇俄出兵阿富汗，使此次會議加進了政治問題，其主題有二：①將政治問題帶進會場，討論蘇俄侵略阿富汗的問題；②對經濟問題才作長期的估計，短期的樂觀消失了。因而，第一譴責了蘇俄的侵略。第二承認八十年代經濟的困境。必須有長期的規劃，才能獲致新的均衡；要打破經濟成長與石油消費成正比的關係，也要控制通膨即使造成高失業率也在所不計，替代能源受到強調。

1981年7月，渥太華高峰會議，美國明星總統雷根提議的「供給面經濟學」獲得確認。據美國新聞報導說：「美國總統雷根的貨幣學派立場，以及他對市場在各國經濟中須占有更重要的信念，都出現在會議的公報中。公報承認在與會七國中的大多數國家，高失業率是個難題，但却避免任何凱因斯式刺激就業之文字，即主張以克服通貨膨脹作為創造就業的穩固基礎，優先對抗通貨膨脹和失業。」美國的高利率，日本的隱形干預市場，都受到提示性的檢討，也都依然故我，各行其是。

1982年6月，巴黎高峰會議，是在八十年代經濟繼續衰退、和美蘇加強冷戰的形勢下，作成公報的。其中有兩個突出點：第一是要對蘇俄及東歐採取多角化的態度，這是針對蘇俄與波蘭相關的政治情勢而發的彈性態度；第二是要繼續壓低通貨膨脹，壓低偏高利率，以新技術來創造經濟復蘇和就業機會。由於這兩年來石油價格維持固定官價，以及通貨膨脹緩和，需求節制，利率高漲，經濟衰退在這個穩定的水平面徘徊，等待新的機會再出發。

這三次的三邊七國高峰會議，可以說是北方工業國家在兩次石油危機衝擊之後，所舉行的一系列圖謀翻身突破南方OPEC對抗的會議。主要內容的着眼點都是自利的，對於「第三世界」關心不多。並且他們還伸出另一隻手來偷竊「第三世界」的財物，而使「第三世界」有油源和資源的國家負債累累。

三、國際經濟秩序的理想

南北問題，就「南北」的指稱來說，「北」是指工業先進的國家，即「已開發」的國家；「南」是指工業落後的國家，即「開發中」和「低開發」的國家；前者地理位置多在北方，後者地理位置多在南方。就「問題」的指謂來說，本質的問題就是世界經濟「公平」的問題，現象的問題就是世界經濟「貧富」的問題。

在十九世紀時，南方仍多為北方的殖民地，國民所得的對比是20比1；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些南方國家紛紛獨立，但過不多久，即由「希望的革命」走到「挫傷的革命」；脫離了「老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剝削，但又跌進到「新帝國主義」的陷阱，受到資本與技術的剝削。國民所得的對比是100比1，比十九世紀增加80倍。

自有「南北問題」以來，討論的主題不外兩個：①南北差距的形成是誰造成的？誰該負責？②南方貧窮的真正原因何在？如何去解決？解答這兩個主題也有兩個說法（不是一面倒的）：

第一，是說形成南北的差距，完全是「新、老帝國主義」（意指西方工業先進國及其前期的商業主義國家）的國家一手造成的；老牌帝國主義的國家，要對其殖民地（土地佔領）負責，因為它把殖民地當做原料搜集場和製造品的售賣場，剝削當地的資源和人力，並加以武裝佔領；新牌帝國主義的國家，要對新興國家不平等的貿易、金融侵略和技術侵略（資本佔領）負責。雖然沒有武裝佔領，却要以「政治模式」或「經濟模式」強迫別人接受，作為其冷戰的工具；而這兩型的帝國主義者，又都剝削「勞動力」；所以「生產三要素」都被他們佔領了，如何不產生差距？又怎能不使南方貧窮呢？這個說法不是馬克斯的創說，在馬克斯之前就有人說過的，現在美國仍有人在繼續這樣說。

第二，是說南方的貧窮就是因為它貧窮！就如馬太福音中所說的那樣：「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這種貧窮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貧窮，而非「後資本主義社會」的貧窮，根本與「剝削」沾不到邊；現在「第一世界」（北方工業國家）的富有，並不是由於奪取而來，而是由於生產更多的東西賺錢所致；所以，現在沒有甚麼

「帝國主義」，也沒有甚麼「殖民地」，沒有甚麼「掠奪」，沒有甚麼「剝削」，只有這個「自由世界」或「民主世界」，還有那一半「共產世界」，如此而已！

第一個說法，是歷史的而又現實的人道的說法，同情「第三世界」。第二個說法，是反歷史的、反事實的護航的說法。護航的說法，只承認有「第一世界」（自由世界）和「第二世界」（共產世界），而不承認有「第三世界」（OPEC、77國集團）是很荒謬的。

在臺灣思想的政治的經濟的顯學界，是依附於第二個說法，所以是無知而又荒謬的！而他們又鼓吹台灣要往「第一世界」跑，則更是荒謬的無知，自絕於世界。因為「第一世界」不僅是「夕陽世界」，更受到「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兩面的夾攻！博學如熊彼得（J.A. Schumpeter），就對它打過「送別」的招呼。

早在OPEC對「第一世界」作油價對抗之前，聯合國對「第三世界」就曾經提出兩個十年的開發計劃。由於「第一世界」的自私自利，只知道實行「新帝國主義」的新掠奪和新剝削，使這兩個「開發十年」和「免於飢餓」運動徹底失敗。這在「世界銀行」總裁麥南馬拉1972年世銀年會報告及UNCTAD秘書長普利畢虛（R. Prebisch）1968年第二次大會的報告中，可以證明的。而「第三世界」中真正接受過西方教育而又澈底了解西方的知識份子（如雅曼尼、阿布沙等），也已經「大覺醒」！他們深深了解如果「第三世界」沒有自己的智慧、力量、權力基礎，就永遠別想在「第一世界」底下翻身。如果借力於「第二世界」（共產世界），則問題更糟！因為強盜式的資本主義與流氓式的共產主義，在本質上是一個東西。於是，在國家獨立的脚步之後，就得要把「石油權力」從帝國主義的「七姊妹」石油公司的手中收回。進一步運用這個權力，來轉變，和作為逼使「第一世界」技術移轉和公平貿易的條件，爭取世界經濟公平的條件，而不是把兩個世界推進熱戰，共同毀滅！這就是南方油價革命的目標，也就是費瑟、巴勒維、格達費……的目標，而由石油部長們去執行的。

所以，在石油價格完成第一次革命之後，「第三世界」即在1974年4月聯合國特別大會，

提出通過了「新國際經濟秩序宣言」；主要的目標是在於要求「不論各國經濟與社會制度如何，所有國家在公平、主權平等、互相依賴共同利益及合作的基礎上，以求糾正不平等及現有的不公平，使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日益擴大差距的消除成為可能，並為這一代及下一代和平及正義下穩定的確保加速經濟及社會的發展。」主要的步驟有六項：①為世界上最窮的25國設立基金。②原料商品價格應予保價穩定，並應與製造商品價格維持一定的平衡，工業品不能剝削原料品。③第一世界應對第三世界作合理的技術移轉，而不是資本剝削。④應在貿易市場上給予「第三世界」真正的優惠，和提高進口所占的比例。⑤多國籍公司在主權國內政府有權干預。⑥有資源能源的國家，有管理的自主權。這些意見，而後又在1974年12月第廿九屆聯大中通過的「經濟宣言」（國家的經濟權利和責任），布告於世界，美國代表雖然大叫「多數專制」，但亦莫可奈何！這就是OPEC的戰略目標，也就是「第三世界」的理想！它不是要打碎「第一世界」，也不是要「埋葬資本主義」，而是在求改變「第三世界」的貌面，從貧窮走向富裕，過着像「人」的生活。

如果想叫狼不吃羊，沒有武器去趕跑狼是不行的。「第一世界」就是狼，「第二世界」是披著羊皮的狼。可是，這兩頭惡狼，善於「做賊喊捉賊」，善於叫「狼來了」，掩飾自己，傷害別人。「南北會談」就是羊與狼的會談，當然不會成功，北方工業狼國是故意在拖時間，最後是不歡而散，一事無成！「南北會談」又叫做「國際經濟合作會議」（CIEC），由工業國八國、產油國八國、十一個開發中國家共同組成。從1975年12月一直開到1977年6月，中間斷斷續續，折騰百出，最後聯合公報說有20項達成協議，21項未達成協議。未達成協議固然是空的，已達成協議也是空泛的，主要的爭執點在於：工業國家要求監督石油供應，第三世界要求取消二千億美元債務，雙方都不讓步。以後再談一百次也不會有甚麼結果，三邊七國高峰會議的表現就已經足夠說明工業狼國的性格，那裡會以人道待遇給予「第三世界」！所以，OPEC的「泰夫報告」（Taif Report）說：「事實的發展，

賦予本組織一個全新的責任，我們完全接受這項責任。我們將會同其他開發中國家一同擬定一個與工業化國家進行談判的共同方案。我們將運用一切力量，促使工業化世界透過創造性能力的轉移，使得開發中國家和我們的地位得到真正的改變。除此之外，我們還要進行經濟和金融制度的改革，這項制度迄今一直控制着舊有的秩序，因此不能再被接受。我們決心參與此一偉大轉變，並且要在必要時導引這項轉變。」（JJSS：「世界的挑戰」尉勝蛟譯）由此可知，OPEC不僅僅是為了石油利益，而且還有理想目標，即人道主義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四、石油降價的彈性策略

1983年3月15日，OPEC在倫敦會議中議定，把每桶標準原油降價5美元，由原來34美元降為29美元，以維持石油市場穩定，協助世界經濟景氣復蘇，並發展其個別國家的經濟權利。

在這一次石油降價之先，英國北海原油先跌價3美元，利比亞降價5.5美元，現貨石油市場在去年秋季就一直走跌，引起了「媒介帝國主義」的大力宣傳，以為這是「擊破OPEC」的好機會，紛紛散佈流言說：OPEC要瓦解，OPEC要分裂，OPEC名存實亡！石油削價戰爭在所難免！等等。當「媒介帝國主義」在作如此惡性傳播之後，回頭再看看「金融帝國主義」的臉色，才發現「金融帝國主義」的臉色很不好看。因為如果OPEC瓦解，石油削價戰爭爆發，他們放出去的七千億美元的高利貸，就全部泡湯了！這是很嚴重的事，這將是一場大災難。所以，他們把這一次石油跌價的危機，叫做「逆石油危機」（Reverse Oil Shock）。

於是，他們馬上約制「媒介帝國主義」那種傳播法，而要對「逆石油危機」提出警告。所以我們在本年初的國際輿論中發現兩種情況：一種是站在打擊OPEC的立場，一種是站在維護金融帝國主義的立場。前者希望OPEC瓦解，油價暴跌；後者不希望OPEC瓦解，油價下跌要有一定限度；所以是很矛盾的，矛盾統一於金融帝國主

義的利益。這一點，OPEC的部長們非常明白，也非常清楚金融帝國主義的心理，所以在幾次會議故意不達成協議之後，仍然優閒處之，等待「媒介帝國主義」代理「金融帝國主義」改口之後，再作決定。這就是從日內瓦、巴黎、到倫敦多次會議的過程，延遲到3月15日才宣布統一降價，爭取到彈性策略的勝利！

必須知道，OPEC固然在七十年代因美元貶值、工業產品暴漲，提高了油價而獲得很高的收入；但是金融帝國主義的三邊國家，却在石油漲價之後，以膨脹的金融資本，對第三世界中有資源能源潛力的國家，放出高利貸，收取利息，其數額累積之大，超過了OPEC十年累計的收入一倍；而且鼓吹OPEC作經濟開發，以高價的工業品吸回石油美元，又獲取了高額的利潤，可以說是「利息」與「利潤」雙重的獲利。就以金融帝國主義在七十年代對「第三世界」放高利貸來說，1982年是1971年的八倍，累積已達七千億美元。據美國國務卿舒茲在國會作證時估計，墨西哥的外債是六百四十億美元，巴西的外債是五百五十三億美元，委內瑞拉外債是二百七十億美元，阿根廷外債是二百五十三億美元，智利外債是一百一十八億美元，哥倫比亞外債是五十五億美元，南韓外債是二百億美元，菲律賓外債是一百一十四億美元，台灣外債是六十四億美元，西班牙外債是二百三十七億美元，希臘外債是九十七億美元，南斯拉夫外債是一百億美元。在1974年，只有三個國家無法償還外債本息，1981年則有25個國家無力還錢。因為利息愈來愈高，本利愈滾愈大，七十年代中期的利率平均是七點八，期末的利率漲到百分之十五，而總借款額也較期中增加三倍以上，較期初增加八倍。

可見，金融帝國主義的三邊國家，對於石油漲價的負擔，不僅完全轉嫁到第三世界的債務國身上，而且還有高利貸收入的賺頭。如果石油價格真正暴跌而且瀉下去的話，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國，只有組織「賴債大同盟」，來對抗金融帝國主義的美國和日本（西德只對東歐放債）。這就是當前紐約、東京、西歐真正擔心的焦點，也是留學美國的雅曼尼等石油部長們所完全了解的，所以OPEC能夠拖延到3月15日在

倫敦會議中達成石油配額和降價協議，就早已掌握了這個有利的背景，是謀定而動的智慧表現。

我們必須了解，石油也是商品，也受到經濟學中「供求律」的制約，在供多求少時價格下跌，在求多供少時價格上漲，供求平衡時價格不變，這是正常的情况。問題是石油是「初級商品」，而且是特別的「初級商品」，在它被帝國主義的「七姊妹」石油公司壟斷的時候，價格決定於壟斷公司，地主國毫無權力干預。他們爲了要壓低地主國的租金或稅金的收入，和爲了減輕工業製造品成本的負擔，以便剝取高額利潤，就故意把油價壓低，就像現在「第一世界」把「第三世界」的初級商品的價格壓殺一樣，這都叫做「剝削」！這種「剝削」不再是馬克斯所說的直接的剝削（壓榨勞動力），而是間接的剝削（壓殺價格），直接的剝削是「剝皮」，間接的剝削是「剝價」，剝皮是剝削，剝價也是剝削，都不合理，都要反對。有些「買辦現代化者」、「偽經濟學家」、「假學者」，不理解這種剝削形態的改變，就依附於「媒介帝國主義」的傳播之下，而說現在沒有「帝國主義」，沒有「剝削」，沒有「殖民地」了，一切都不是「零和遊戲」，而且「相互依存」。這是無知的！這是錯誤的！新帝國主義的形態，是「技術帝國主義」，即「資本帝國主義」，即「金融帝國主義」，它所表現的是「技術占領」，是「金融占領」，是資本占領」，而不再是「土地占領」。所以它雖然與老帝國主義的「土地占領」不同，其本質仍是「帝國主義」，又可以叫做「科技資訊資本的帝國主義」。我們就是他們的「科技資訊資本的殖民地」，是他們零件加工的殖民地，是他們科技資本媒介意識的殖民地。

當 OPEC 收回石油所有權，也就是自主權之後，當然要調整被帝國主義七大石油公司所壓制的不合理的價格。從 1960 年到 1973 年，經過千辛萬苦，受盡無數恫嚇，也被戴過「紅帽子」，又被譏爲「現代化」的落伍者，且被美國支持的以色列打敗過。終於在阿拉的眷顧下挺身而出，他們以石油換來的鎗炮，抵住以色列的瘋狂（上帝也瘋狂）！再以「石油禁運」，抵住帝國主義的打擊，建立了一個國際石油的新秩序。從而以之作爲改變國際經濟舊秩序的一個先導力量，爭

取南方國家的經濟自由和經濟平等。

經過十年的制衡作用，三邊七國經濟狂傲的態度改變了，三邊七國經濟結構的脆弱性也暴露了。從「停滯膨脹」到「暴跌膨脹」，從「加速經濟」到「減速經濟」，讓整個世界明白：「第一世界」不是強大到不可動搖，「第三世界」不是弱小到無還手之力，只要團結就有力，只要有一件武器就可以戰鬥！爭自由是永恆的戰鬥，爭平等是永恆的戰爭，只要有「南北問題」存在，就有戰鬥！只要有「貧富問題」存在，就有戰鬥！1973 年第一次石油價格革命，是爭自由爭平等的戰鬥！1979 年第二次石油價格革命，是爭自由爭平等的戰鬥！1983 年這一次石油降價的革命性行動，是繼續的戰鬥！由於三邊七國在七十年代的十年中，未能處理好「南北問題」，經濟就必然處理不好，兩個世界經濟的差距愈大、貧富差距愈大，「第一世界」的經濟危機，就永遠不會解除，這是必然的。所以，一進入八十年代，「第一世界」經濟就大衰退了！由此影響到石油的需求，加上他們開發新能源和新油田，增加了石油供給量，在市場法則的運作之下，石油價格就降價了。可是，金融帝國主義由於自己利益，又無法壓迫 OPEC 大幅跌價。這就是 OPEC 爲了適應市場法則而降價，也知道金融帝國主義的虛弱而又能不受脅迫的降價，這是第三回合的勝利。

傳說一個母親在懷胎時，因補殺一隻穿山甲而生下了一個像穿山甲的女嬰……

「穿山甲人」

爲您報導了-----

馬來西亞身罹絕症的華裔女子張四妹的傳奇故事，附有圖片八頁。

四季出版公司 郵撥：105626
電話：392-9134 定價：新台幣100元



日本消費社會的形成

(中) 犬田 充／著 金 劍／譯

「公」與「私」的乖離

以上所述，是日本人全體對於高度經濟成長所作評價的大概。但一旦進入這些評價的細節，就不大一樣了。一項將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全社會的生活水平分開評價的統計結果，顯示雖然個別人的生活水平有近半數人覺得有所改善，但在社會全體的生活水平上，表示有所改善者僅有三分之一強而已（見附表）。

日本人民對其高度經濟成長之評價（%）

| | 改善 | 惡化 |
|------|----|----|
| 個人生活 | 48 | 20 |
| 社會生活 | 33 | 50 |

原資料：日本廣播公司（NHK）輿論調查所：「低成長時代之生活及意識」

1976年7月

但依據朝日新聞在一九七一年所做的調查，認為自己個人生活富足者佔二二%；認為日本全體的生活富足者佔三五%，即認為全社會的生活富足化的人佔多數。這兩種調查結果雖有不同，但可以假定「個人，即『私』的生活雖富足化了，但社會，即『公』的生活比較不富裕」，已成爲一般的感受。這就產生了公民關於經濟成長評價的「私」與「公」兩方面的評價上的乖訛。對社會經濟的高成長給予高度評價，這是一個方面。但生活滿足感却未曾相應地增加，這是另一方面。一旦觸及「生活的品質」，公民的評價便顯著下降。許多人的心中開始這樣嘀咕：人向來這樣孜孜矻矻、淒淒惶惶地爲生活奔波，到底爲了什麼？進入了七〇年代，這種感受逐漸開始普遍化，及至第一次在石油危機而加劇了。而到了七〇年代初，根據NHK「圖說戰後輿論史」（一九七七年，頁195），日本公民對高度經濟成長的反對者，從一九六九年的十九%，增加到一九

七三年的五九%，贊成者從一九六九年的四三%降到一九七三年的二二%！

社會性消費的不足

對於具有個人性質的消費，滿足感高；對於具有社會的、公共性質的消費，其滿足感較低。這一點，在論及六〇年代型日本大眾消費性格時，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關鍵所在。

而究其原因，是由於民間企業固然爲自身在管理與生產的合理化上殫精竭慮，爲了提高生產效率與生產力而鞠躬盡瘁，但是，對於不具任何直接的生產效果的社會資本之投資，却顯得猶豫而遲緩。一九五五年以後，這種情況益爲顯見。

從行銷（marketing）的一方來說，在「自由」企業的名義下，處心積慮地進行著和企業利潤有關的、充份滿足消費者個人慾望的行動。企業利潤的引導下，企業「自由」地選擇了討好和滿足個人消費慾望的一方——而「忽視」了社會的、公共的消費需要。

這種企業的自我中心（egoism）過度發展的結果，使消費變成了一種消費「文化」，最後却反而使消費文化再擴大，而陷於消費的停滯這個問題，已經成爲今日對消費社會之反省的一個主要論題。其實，所謂日本企業的自我中心，與消費者個人的自我中心主義，有密切關係。在當別人犯法則加以批評，自己干蹈法律則感到快感的日本人的自我中心主義之下，是斷無使日本的社會的、公共的消費提高之理。

幸福中毒症

一九七一年，在日本有一項民意調查，對日本全國二〇歲以上八一一四名男女，提出「你覺得自己幸福嗎？」的問卷題。

調查結果顯示：認為「幸福」的佔六三%。在這些人之中，男性佔五七%，女性佔六八%；

並且高學歷者佔六六%，中等學歷六一%，低學歷者五七%。從城市化程度來看，認為自己過得幸福的人，在東京都為六五%，十萬以上城市的居民六四%；小市鎮為六一%。

要曉得，日本人算是個怯於表現自己情感的民族。在日本人談話中很難有人問：「你過得幸福嗎？」因此，一旦有人這麼問，可以預想到日本人很可能會迤邐然做出肯定的答案來。但既便是如此，這種自以為「幸福」的比率之高，令人吃驚。這也許可以說是一種「幸福中毒」症吧！

對於這充滿著「富裕」的現代，日本人怎麼看呢？據一九七六年三月日本總理府所做的調查結果，日本人認為當前社會(1)很太平的，佔57.1%；(2)很安定，13.9%。至於覺得當前日本社會「很光明」的，只有7%；認為「寬裕」的佔6.7%，在百分比上顯著低下。正如這個統計指出，日本人民對當前社會的評價，只概括於「太平」和「安定」這兩個感受了。至於比率高達十七%的「無意見」者，不知是否因太平和安定而麻木了表現的慾望，就不得而知了。

對這個時代表達了反面評價的一方面，同調查顯示：認為這個社會(1)「沒有責任心的傾向很強」者，佔38.3%；(2)「人人都自私」，佔37.8%；(3)「變化太迅速」，佔27.3%；(4)「匆忙、急躁」，佔23.1%；(5)「不安、焦慮」，佔18.2%。由此可見，「無責任心」、「自私、自己本位」和「適應障害」，是這個「高度成長」社會的三惡。從而，在富裕化的同時，人們似乎比過去任何時代都不滿現狀、發牢騷。一九七四年，日本「國民生活中心」所做的調查，指出日本人對當面生活的批評意見，認為現在日本社會中(1)「不懂禮貌的人增加了」，佔34.5%；(2)「文化混亂」，佔20.5%；(3)「物質主義傾向增強」，佔18.2%。日本人今天雖然「衣食足」了，但是禮儀却跟著喪失了。

不滿足感的增大

據日本國民生活研究所發刊「都市中的消費者意識及消費行動」中指出：在一九六四年，當時日本每人國民所得為美金四四八元。但是在這個時代中，認為生活令人「滿足」者，為51.4

%；「不滿足」者48.2%；「沒有意見」者，0.4%。到了一九七〇年，每人國民所得提高到一五〇〇美元時，認為生活令人「滿足」者，僅48.9%；「不滿」者，43%；「無意見」者為7.8%。這告訴我們，以生活滿足感為標準的福祉，在這十年中，並不曾增加。在另一方面，一九六〇年代中期開始，認為生活比過去還困難的比率，却逐年在增加之中。

因為「高度成長」而導致公民所得的增加的結果，就使慾望以更快的速率往上高漲。因此，個人所得或社會的富裕雖然增加了，但人的滿足感却未曾相應地提高。

這種所得上升與慾望上升的競賽追逐，將成為一種無盡的循環。但我們又不能不知道：這種循環，是以一個「大眾市場」(mass market)做為它的基礎舞台的。而人在心理層面上的緊張、重壓和各種葛藤，也跟著逐漸嚴重化了。

向城市型消費發展

大眾消費社會形成過程中，顯示消費的城市化，即消費型態向城市型轉移這個特徵。

日本的城市化，其經濟成長之高，城市化過程之怪速，在世界上尚沒有其他相同的例子。就單以戰後時代來看，一九五五年日本城市人口比率為總人口的56.3%；一九六五年增加到68%；一九六九年，突破了70%大關。

這是因為城市裡有(1)變化大；(2)充滿各種刺激；(3)選擇性大；(4)各種資訊繁多；這些特性，形成城市的魅力，使人口向著城市集中。

當然，城市中也有它的缺點和害處：公害、交通雜亂、大自然的缺乏、住宅與土地最貴、人口混雜，等等。有人曾說：都市既是天國，也是地獄。從心理學上說，所謂「接近——迴避」兩種心態的鬥爭，在城市中尤為多見。現在，現代人對於城市及城市生活，表現出一種「正反兩面價值」(ambivalent)的心態。一九七二年，本書作者所著「都市化之社會心理學問題」中，對東京、京都、足利等三城市的居民做了調查，詢問他們家居城市時的心情。結果，認為住在都市真好的，東京人有六七%；京都五三%；足利四七%。認為不會覺得住城裡特別好的，東京是三三%；京都和足利都是四七%。相反，受調查

人中，覺得住城市很討厭的，東京是五九%；京都二五%；足利是一七%；相反地，表示住城裡也不覺得特別討厭的，東京是四一%；京都七五%；足利八三%。只有東京，表示居東京好和不好的兩端，比率都高。

消費的社會化

消費的都市化，換言之，依都市生活樣式對全日本進行改造的過程，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消費的社會化過程了。

消費樣式的地方色彩之急速消失，是日本大眾消費社會的特質之一。在所謂改正地域性發展差距的政策下，使各地的中央志向傾向益為明顯。到了一九六五年代，日本全國各地所得差距，也確實達成了顯著縮小的目標。這種所得差距的短小化，使日本各地表現出同一型態的「城市型消費」了。

這消費社會化的過程，從佔著消費支出的城市消費的比率（城市化係數）表現出來。此所謂都市型消費，在家計消費支出項目中，是指高度集中於大城市的十項——即高級酒類、房租、地租、西洋飲食、上餐廳吃飯、肉類、麩包類、服飾、和服、休閒用品、化粧品類等項目而言。

這都市化係數，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八年的六年中，顯示一點七的上升（即從一九五三年的14.5到一九六八年的16.2）。從都市型消費支出額的增加率來看，也有了十至十五%的增長。再從地域別來看，小城鎮城市化係數的增加率，尤引人注目。相對於大城市在六年間增加一點一點，人口十五萬以上的中型都市却增加了一點九點；人口在十五萬以下五萬以上的小城鎮則增加2.2%，鄉鎮則增加2.3%

成長的錯覺

如前所述：在漫長的人的歷史中，「停滯」一直是一種常態。而且，連貧困的不斷增加，也屬於這常態的一部份。而「成長」反而是長久歷史中比較暫時的、一時性的時代。對這個歷史事實，是育成於「成長」時代的我們所不知的。

管理學者彼德·杜拉卡在他的「管理」(Management)一書中說道：「一九五〇年代

和六〇年代，不單是企業上，連在經濟上，都碰到不折不扣的『成長』激狂」。那是一個每年銷售成長十%和利潤成長率十%同時成為經濟上的焦點的時代。

這種成長的瘋狂，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也曾三度侵襲了北美洲。那是一八七〇年代、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

跟著成長的瘋狂，對於個人誘導出一種堪稱為「前進的感覺」。這在社會心理學上，有重要意義。雖然還不到對未來抱有光明遠景的程度，但相信明天的生活水平和所得收入至少和今天一樣，或者會比今天好——這麼一種樂觀主義，成為越來越多的人所共有的想法。這種樂觀，又因人而成為不同程度上的確信。對於未來的樂觀，在大眾的範圍上，成為人們共有的展望與信念。而所謂對未來的「期待升高」的革命，便在這兒展開它的起點。

這「期待升高」的革命，又不獨於消費中為限。各種各樣的社會制度，逐漸變成了為「期待升高」而服務的工具。工會就是一個例子。今天，即使在工人的思想意識中，工會再也不是為了改革資本主義社會所內含的根本毛值而存在了。工人把工會早已看成是提高自己經濟生活水平的工具，並且為了改善自己生活水平，滿足自己升高了的慾求而加入工會，努力於工會的工作。

如果借用某一位美國社會學者的話，我們的社會已經開始了一種「享樂的義務」(must-have-fun-complex)情結，而且在衆多人的心中形成和固著起來。在日本，人民已經朝向追求其中日常生活的實在的需求之滿足，而舉國競奔。這種期待升高革命的進行，成為日本高度經濟成長的十年間的「常識」。不久之後，這「常識」又成為顛撲不破的「事實」，應為日本人民所接受了。

然則，只要稍微冷靜下來，就知道日本在成長上的無往不利，毋寧是一種奇蹟。正如卡德拿所說：「經濟景氣，缺少了確信和樂觀，是無法擴充的」。一向被當做「常識」而堅信不移的「事實」，果然不旋踵而粉碎崩頹了，而且使處置這種崩壞的合理的對策，尤為困難。使全日本瘋狂的期待升高趨於冷卻的事件，是第一次國際性的石油危機。



《歷史小品》

● 陳嘉

「我就是帝國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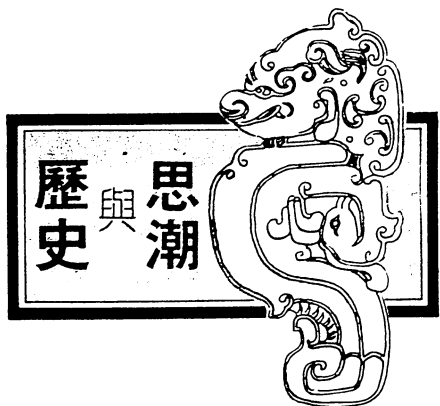
，……」

今年二月號「八十年代」（第三十一期）的「台語專輯」中有一篇談日據時期語言政策的文章。文章最後一段說「日人對台語始終未壓制」，這是嚴重違反史實的說法。事實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據台時期不但壓制了台語，且是用極粗暴的手段壓制。

明治維新後，日本極力模倣西洋列強，認為西洋列強才是文明之國，中、韓等亞洲國家都是野蠻、落後的。明治時期，日本倡導西化最力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在一八八五年就寫了一篇「脫亞論」說，日本實行維新政策，向西洋學習，已使日本達到文明開化，進為文明之國，不再是固陋、落後的亞洲國家，因此對屬於亞洲國家的中、韓兩國不必客氣，「應該學習西洋人的作風，將其分割處分」。他甚至認為中日甲午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這種思想在官方刻意灌輸下，更深植於一般日本人腦中。甲午之役，中國戰敗，日本人意氣更為囂張，用帶著輕蔑、侮辱意味的「支那」、「支那人」來稱呼中國及中國人。日本人統治臺灣正是以所謂大和民族的優越感歧視大部屬於中華民族的台灣人，動輒辱罵台灣人是「清國奴」，要台灣人不服從的話，回「支那」去。例如，一九一五年時，明治維新的元老板垣退助到台灣來組織「台灣同化會」，想要「化育台灣人使其與日本同化」，當即遭到在台灣的日本官民激烈反對，日本人的律師團體發表聲明，公然說台灣人是支那民族，蠢如豬鹿，無法和他們同化，不久，台灣總督府就下令解散「同化會」。一九二七年，宜蘭郡守因蔡培火頂撞他便大嚷說：「像您這班不從順的，在此台灣無用，回去支那好啦！」。日本人以台灣為殖民地，歧視、壓迫台灣人，對台灣人處處採差別待遇，絕不讓台灣人在政治、經濟、教育上與日本人享有同樣的權利。另一方面，為了消滅台人的漢人意識使台人忘記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乖乖的做日本次等的「忠良之國民」，乃積極推行日語，並刻意逐漸廢除漢文（至一九三二年

時，下令禁設漢文書房；一九三七年，限令全島報紙廢止漢文）。若是瞭解這樣的背景就知道所謂「日人始終未壓制台語」是絕無可能的事。

日人山川均在「殖民政策下的台灣」一文中指出：「有一個師範生，因在公學校的同窗會用台語演說，就被開除學籍，剝奪了充當教員的資格。」一九二八與一九二九年台中一中有四名學生因為在休息時間說了一句台語而被停學。像這類的事情所在多有，一九二八年的台中師範事件甚至引起極大的風潮，島內外的民族解放運動團體為此紛紛抗議，聲援台灣學生。事件發生在日本皇帝裕仁登基之日，據「台灣民報」報導：「當日於人格第一主義的教員養成機關的台中師範學校裏頭，發生內地人（按：指日本人）教員以民族的偏見、暴言、謾罵，侮辱台灣人學生，使之忍無可忍，以至滿場憤慨的眼淚滂沱直下的事件。這是台灣教育界，不！是台灣統治上的一大問題，豈可輕輕看過的嗎？」事件的起因是一個姓小山的日本教員兼舍監，在巡視寢室時「聽見二三台灣人學生在一塊兒說話，中間雜有台灣話」。學校的規則是絕對不許說台灣話的。……小山以為他們故意不守校規，所以發惱，用野蠻的體罰，把說台灣話的學生毆打一頓。……（次日）的朝會，小山舍監滿面堆著怒容，向全校的學生發出狂悖而暴戾的訓辭說：『（按：小山的暴言全被當時的日本當局刪除，現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補回）台灣是大日本帝國的領土，要說清國奴話的傢伙，請回去沒有法律的支那！我奉小原大佐之命來的，我就是帝國主義，不服的傢伙出來，嚐嚐我的拳頭。內地學生（指日本人）一般也沒自尊心，有人在自己面前講清國奴話，竟無動於衷。如果聽到講清國奴話的傢伙，把他揪出來，有事我負責！大日本帝國政府出了八十萬元所建的學校，不是用來教育清國奴的地方。』……後來學生們把他在朝會的暴言一一記錄下來，所說僅清國奴一語，總共用過十五六回」。小山所說的「我就是帝國主義」，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自白，也是日本治台的基本精神，但是，這大約是「八十年代」的編者與該文作者所不知道的吧！



日據時期

民主主義者 台灣的社會

連溫卿

(一九五七—一九五?)

■ 彰 生

前言

凡稍識近代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的人，定當知道創立於一九二一年的文化協會，到了二七年發生左右派的分裂，因而導致改組後的文協轉換方向並促成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成立。其中主要人物有我們耳熟能詳的林獻堂、蔡培火、蔣渭水、謝南光（春木）、連溫卿、王

敏川等等。這些要角，大概還剩連溫卿沒有被比較有系統的介紹吧。

本文便是由文獻與着宿口述，稍加整理，以編年敘述方法并對當時背景略作交待，避免從政治立場對思想加以褒貶，以致妨礙對當時複雜事實的全面認識。由於筆者所用資料仍欠完善，願連氏有關親朋能增補，以呈顯當時抗日運動人物的全貌。另外，因篇幅所限，不再詳述當時其他的派別，讀者可參照葉榮鐘等之「台灣民族運動史」（自立晚報，一九七九）。

連氏的生平與時代背景

連溫卿，一八九五年四月生於台北。當時正值割台，一個多月後，台人爲阻日人據台並在國際微妙政局下，推清官唐景崧爲總統，成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台灣民主國。六月七日，日軍進占台北，開始其五十餘年間的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台人也起而從事由武裝到近代政治方式的抗日行動。

連氏在紛擾的時代中，僅讀完公學校，後來均靠自修擷取世界思潮。一九一三年，日本世界語（Esperanto，連氏稱爲『愛斯不難讀』）協會（J.E.A.）東京支部兒玉四郎移居台北，九月於該地開世界語講習會，連氏加入該會。同年，兒玉在自宅設J.E.A.台灣支部致力推廣世界語。當時台灣雖在一九〇二年林少貓等人被屠殺後，「土匪」暫告平定，但統治尚未臻穩固，一三年仍有羅福星苗栗事件，二年後又有西來庵事件。日本官廳選釀厲壓抑其他「不法」的思想與團體，兒玉在一五年六月返日，世界語運動暫中斷。

這段期間島外的國際風雲亟變，先有中國自辛亥以來的革命、朝鮮三一事件；一次大戰末期民主、自由思潮波及亞洲，美總統威爾遜倡民族自決思想，左派反帝理念等都刺激了各殖民地的民族覺醒。台灣在中國、日本的留學生、知識份子紛紛結社。其中有在中國大陸的北京台灣青年會、上海各學生聯合會、中台同志會、廣東台灣青年革命團、上海反帝同盟；在東京的新民會、東京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會、台灣學術研究會等。他們不斷以各種方式來影響島內的政治、社會，於是有一九二一年一月的第一次台灣議

會設置請願運動；十月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同時，左派思想也在島內青年中萌芽生根。

連溫卿在這種風起雲湧的局勢中，協同友人蘇璧輝謀重整世界語運動。一九一九年改組已有名無實的J E A台灣支部為台灣E S P學會，連氏並主編「綠蔭」(VERDA OMBRO)月刊(一九二四)，宣揚用世界語融合人類為不相壓榨的大同關係。他同時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科學，聚集同志討論，售賣日本左派雜誌「前進」等，並和島外左派學生有所聯絡。一九二三年七月，他嘗與蔣渭水、謝文達、石煥長、蔡式毅等人籌組社會問題研究會，但以發佈未經審查的旨趣書遭取締，科罰金了事。隨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受檢舉，諸人思想又不一致，該會遂無所成。不久，連氏又與蔣渭水、王敏川在文協下指導當時台北無產青年一派，組台北青年讀書會，每週六開雄辯會討論有關勞動、政治、思想、社會問題。該會曾在淡水河泛舟召開會議，為抗日運動中一風雅事。

就在這段期間，連溫卿認識了回台養病，而在台北私立女子學校教書、同為研究世界語的山口小靜。小靜的父親當時任職台灣神社(祭祀北白川能久親王)宮司，以前幹過侵台的近衛師團的從軍記者，她在北一女以優越成績畢業後，赴日讀東京女子師範學校。一九二一年因肺結核返台，在東京時小靜便與自由民主者、社會改革者、馬克思主義者有往來，並與日本社會主義者山川均、菊榮夫婦過從甚密(可惜二十三歲就『音容宛在』了)。連氏在她的介紹下，開始和山川均互通書信。一九二四年五月，他赴東京參加世界語大會，並應慶應大學「愛斯不難讀」宣傳講演會之邀演講。內容以「言語之社會的性質」在同年台灣民報發表(十九號)。連溫卿認為：

「言語由社會的反映生出來的，而社會文化當時、那社會人們造就的，言語一定也是被當時人們拿去使用，……言語問題不可看做民族感情，不如以社會問題觀看較為妥處，這問題若讀者能了解，對國際語問題也能夠了解，他的使命雖是消極的，然不欲現在社會的轉擊超越過大，可算他也是必要的東西啊！」

停留東京時，連溫卿就住山川家，與山川均有更進一步的師生與同志的感情，連氏遂成為台灣山川主義代表者，其後亦因此而被激進左派除名。他並幫助山川均搜集台灣的經濟、社會、政治資料，使山川均能在後來(一九二六)尖銳地批判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實情。這篇「殖民政策下の台灣」旋即為張我軍在台灣民報譯成中文「弱小民族的悲哀」(一〇五至一一五號)。不久於大陸又有蕉農(宋斐如、文瑞?)譯，華生(許地山?)序的「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新東方，一卷四期，一九三〇)，對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連氏返台後，對台灣的社會現象展開實證的研究與批判，在「婦人的地位和社會的關係」(台灣民報，六十七號)、「不良少年少女之研究」(同上，七十四、五號)等文中，揭露社會經濟階級壓迫等原因，導致女性賣淫及青少年問題。「義務和權利」(同上，九十三號)以無產階級的立場對權利義務問難。一九二六年六一七始政紀念式時，連氏在台北欲演講「以後的社會政治運動」，為日本警憲禁止。

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

前曾提及世界思潮對台灣政治、社會的影響，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後左派思想影響文協日益深刻，在台灣民報上就發生了芳園(陳逢源)、許乃昌、蔡孝乾對「中國改造論」的辯論，文協左右派衝突明顯化，左派認為當時的議會請願運動已成「哀願叩頭」取悅日人的主義。

先是，一九二六年十月文協於新竹召開第六次年會，翌年又召開臨時理事會及臨時大會，連溫卿的提案先後通過，文協採委員長制(否決蔣渭水之總理制)。並在向來固定綱領「促進大眾文化之實現」項外，增列「農村文化之向上」、「增進商工知識」、「獎勵遵守時間」等十項。連溫卿左派勝利接掌文協，林猷堂、蔡培火、蔣渭水先後退出，另組民眾黨及地方自治聯盟。

連溫卿發表了「一九二七年的台灣」，用以闡明此次分裂與改組的意義，其中有謂：

「改組前，因中國改造問題，引發了資本主義的論戰，三個月來，雙方的主張一台灣是否有資本主義一引起社會人士的矚目。一方謂台灣尙未有資本家，所以沒有資本主義…必須推進民族運動。另一方…以爲台灣有資本家…被榨取的台灣人不獨少數資本家及地主，還有最大多數勞動者及農民存在。所以若要解放台人需主張階級鬭爭。前者的主張是以少數人的利害關係爲根本要求，符合當局標榜的內地延長主義，其界限止於在政治上獲得獨立……」

故改組後的文協宣告文協永爲農工、小商人、小資產階級的團體。連氏任中央委員兼農工商部主務。連氏等這次奪權成功，原因 在於其影響下的台北、大甲、彰化等左派青年（包括無政府主義，如黑色青年聯盟系），率隊加入的緣故。

新文化協會的活動與改組

葉榮鐘等的「台灣民族運動史」，認爲「台灣近代民族運動係由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領導」，故對改組後的文協活動僅以數字輕描淡寫。但若依警察沿革誌資料，則一九二七、二八年爲活動鼎盛期。他們不斷在各地與歸省的留學生組巡迴演講團，兩年間共辦二八六次，聽衆十一萬一千多人（一說二十五萬以上），比起同時期民衆黨二六一次，十一萬六千多人毫不遜色。論激烈程度，前者被禁止或解散亦較後者高一倍，當然犧牲也多。

此外，新文協並推展文化劇及電影活動，創大衆時報、新大衆時報。又利用當時台灣經濟上所發生的勞動、佃作爭議和民族問題，開展參與指導新竹事件（一九二七）、台中一中學生宿舍事件（同上）、台南墓地事件（一九二八）、台中師範學校事件（同上）等。特別在台南墓地事件時，新文協鑑於向來演講會常被日本官憲所中止、解散而無法向聽衆傳達主旨，故這次演講會中，預先將所要講的主旨分成幾節，各節以下冠以演講者之名作爲講題。這麼一來，縱然集會被命解散，聽衆只看講題已能知此次演講大要了。

例如：

反對利用紀念事業做護符、建設少數人享利的運動場（侯北海）

我們祖宗的墳墓、竟受無理沒收、做爲少數人蹂躪的地、我們絕對反對（郭秋源）

墓地沒收爲運動場是對我們民族的挑戰（蔡國蘭）

知事、郡守、市尹要公選才會尊重民意（洪石柱）

我們爲真正的自由要求公官吏民選、協議會員的普選（王敏川）

台灣人只有「團結」與「抗爭」才能達到完全的自由解放（王萬得）

在工運方面，連溫卿與王敏川所領導的運動也開始與蔣渭水民衆黨系統的台灣工友總聯盟爭指導權。在兩派的領導下，本島的勞動爭議於一九二七年一躍成六十九件，二八年增至一〇七件。勞動團體在一九二七年五十七個，翌年一〇三個，一九二九年達一一四個。連氏爲謀解決改組文協的矛盾，並深怕工運爲民衆黨奪走地盤，於一九二八年元月發起組織台灣機械工會聯合會，他的用意本想以此爲前提進而組總工會，但不能爲中南部勞動代表所贊同。在名稱上，連氏主張用「台灣總工會」，王敏川一派則主張「台灣勞動運動統一聯盟」，派系紛爭加上新竹事件以來，主要幹部相繼受檢舉或脫逃往中國大陸，市民階級畏而却步，運動遂呈頹勢。

再者，國際共黨運動路線轉換，反映到中國則李立三路綫取代陳獨秀；日本福本（和夫）主義取代山川主義。一九二八年台共在上海成立，成員亦返台伸手新文協，新文協在這種國際局勢的反映下，造成王敏川上大派（以上海大學留學生爲中心）和非上大派連溫卿系的內訌，遂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召開的第三次全島代表大會中，由台灣農民組合與鄭明祿先後具狀告發連溫卿一派私通官憲，擾亂農民組織、濫用職權及污辱文

協等「罪名」，連氏與作家楊貴（達）均在此鬭爭中被除名，無政府主義者亦退出。台共影響下的再改組之文協，基本上已強調黨機關少數人的革命領導，與連氏之主張社會民主主義合法性自不能相容矣。但再改組的文協對連氏不斷抨擊為「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地盤主義、分裂、投機、逃避、機會主義……黃色民主主義」、「連小狗是日本山川均反革命勞農派的私生子……」。

連溫卿的反應是發表聲明，指第三次代表選出及召集係違法，又駁斥所指控不符事實。其前且曾欲與前來台北的王敏川研商，被王氏所拒。之後文協派人來台北取下台北特別支部事務所招牌。連溫卿並未再圖成立另一個團體或進行反對行動。

連氏的晚年

連氏被台共從「文協」除名後，於一九三〇年曾再赴日本，並寫有「旅行をりたる人の日記」、「台灣における日本植民政策の展望」（這些遺稿戴國輝於一九七三年在日本發現，遺稿中還包括戰後所寫的「日本統治期間中を通じて台灣で行はれた土地收奪過程」，並刊於七六、七八兩年立教大學的『史苑』。二次大戰中，連溫卿一邊經商並致力研究民俗學。迨台灣光復後，則不再有實踐活動僅藉鬻文度晚年。發表有「人類之家·台灣ESP學會」（台北文物、三卷一期，一九五四，以史可乘為筆名）、「台灣文化的特質」（同上、三卷二期）等。連氏晚年可說在窮困中，但所寫文章中仍保有他的思想體系，但多已不合「時宜」，故未得刊行而冷藏書篋中，連氏遂精神抑鬱，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因貧病離世，送喪親友零落。

又據說連氏藏書、剪報甚豐，過世後竟為其好逸玩的孫女分次論斤算兩賣掉。曾有美國人聞連氏藏書多，赴台欲購存，悵然而歸。

餘論

連溫卿既為山川主義而被除名。那麼山川均

一八八〇—一九五八）是什麼樣的人呢？他自一九〇〇年以來即以不敬罪與赤旗事件等入獄。一九二二年加入日共，其後致力於克服極左主義，成為山川主義，不久脫黨。二七年創「勞農雜誌」，主張普羅革命，與共黨兩階段革命論對立，高舉勞農派之旗。但自九一八事變情況惡化後，使他不得不退而養鳥栽花，探彈性姿勢，但仍在一九三七人民戰綫事件中被檢舉。

二次大戰後山川成為日本社會黨左派論客，致力強化社會黨，一九五一年，組社會主義協會，創刊「社會主義」，寫了不少文章。有人批評他「懦弱」與過於「慎重」，但相對的，這也是以較彈性姿勢來處理現實狀況。連氏若得以遂行其志，其評價大概也與他的老師兼同志一樣吧。

台灣新文學的第一頁!!

關心台灣政治歷史與文學歷史
的知識份子，不可不讀——

李南衡 編

日據下台灣新文學

- | | |
|------------|-----------|
| 1. 賴和先生全集 | 4. 詩選集 |
| 2. 小說選集(一) | 5. 文獻資料選集 |
| 3. 小說選集(二) | |

出版 / 明潭出版社
訂價 / 國內新台幣1250元
 國外水陸美金50元
郵撥帳號 / 555202黃溪南



「殖民心態」清除之戰

第三世界

文學的

新潮流

南方雜誌 / 策劃
孟祥森 / 譯

第三世界文學的新潮流



殖民與反殖民之戰

前言

滑鐵盧之役可以說是在伊頓中學①的體育場上打勝的，而第三世界建立新秩序的戰爭則敗北於英法各大學的草地上——因為第三世界的優異份子是在這些草地上餵牧的。第三世界如果現在打不贏它們的民族存亡之戰，似乎是自然之事，因為，一群羊，在披著羊皮的狼子領導之下如何能打贏狼群呢？

「暴風雨」是莎士比亞關於殖民主義的寓言。在這齣戲中，殖民之島的統治者普羅斯比羅揚帆返回本鄉之前，將他對殖民島的權利交予愛利兒——對他服服貼貼的一個本土助手。第三世界的每一個國家，殖民官的使命均和普羅斯比羅的一樣，就是要征服、要安撫、要統治，並盡可能的為西方抽取當地的財富。殖民主義的本土助手們，也就是愛利兒們，所受的訓練則是全心全意的助成這個使命。

反殖民的民族主義者——也就是各民族的加里本②——則意在驅逐征服者，要使國家民族重現生機——為自己的人民開發資源。隨著政治的獨立，愛利兒們為了保持權位，至少必須採取加里本們的部份步驟。

但愛利兒能夠執行加里本的使命嗎？——尤其是這使命要他跟原先的恩人普羅斯比羅作對的時候？

有過這麼一個故事：一個表演絕技的人在表演的時候讓他的伙伴站在木板前面，他自己則站在一段距離之外向伙伴擲刀，每一把刀都以分毫之差插在伙伴身邊，以致到最後那伙伴周身插滿了和他體形相似的一圈飛刀。有一天，兩人發生了爭執，飛刀手決心在下次表演時把伙伴殺死。但不管他怎麼用心，他的刀就是插不中 新目標，每一把刀都仍以分毫之差插在伙伴身邊。他的用心雖然改了，眼睛與肌肉的習慣卻沒有改。

即使愛利兒想要克服對普羅斯比羅的敬畏，倒戈相向，他所受的制約也會暗地裡打敗他這種新企圖。

只要有一天愛利兒在第三世界做領導人，普羅斯比羅的舊世界秩序——不論是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還是資訊方面的一一就安全無虞。當前的第三世界的奮鬥若想成功，加里本就必須堅持戰鬥下去，一直到把普羅斯比羅的經紀人愛利兒連根拔除為止。

愛利兒與加里本象徵第三世界的兩個派別；不僅如此，而且更象徵了第三世界每個心靈的兩種傾向。拔除愛利兒意謂抹除殖民心態。第三世界的新秩序絕不止是把舊世界整修一下即可；要完成第三世界的新秩序，務必先消除殖民心態。

「南方」(South)季刊的「消除殖民心態」專文，旨在考察這種消除的過程，並透過報告、論文和專訪提出見解，希望有助於第三世界殖民心態的消除。我們的第一個單元是介紹第三世界興起的文學與潮流。其後的幾個單元則集中於經濟、體育、政治理論、歷史與機構——教育機





第三世界文學的新潮流

構、官僚機構與法律機構等等。

第三世界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大部份獲得了政治自由；如今正在進行經濟獨立戰爭；但心靈的自由之戰却幾乎尚未開始。只有心靈的鬥洗淨之後，第三世界才能跟殖民主義做最後的對決。

懷著這些想法，「南方」季刊籲請讀者鄭重思考殖民心態的消除問題。



卡拉哈瑞是南非布西門族的短篇小說家，他說：「傳統的聲音已被來自西方的影響消滅殆盡」。

〔註〕

①譯註：Eton，英國培養貴族和資產階級子弟的中學。

②譯註：前述三個角色名，普羅斯比羅 prospero，意為「繁榮」；愛利兒 Ariel，意為「瞪羚」；而加里本 Caliban 則被寫成殘暴的半獸。

(Sonth／撰)

一個新的文化趨勢

打開了第三章

文化的反殖民風氣吹遍了第三世界。雖然這種風氣尚未執文化牛耳，却已靜悄悄的改變了第三世界文學的品質與目標。結果是西方文化在第三世界的霸權迅速接近尾聲。

照弗蘭茲·法南 (Frantz Fanon, 拉丁美洲馬提尼克島人, 精神病醫生, 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的文化分析者) 的看法, 被殖民者的文學在跟殖民者的遭遇上要通過三個階段。第一個是同化階段, 在這個階段, 被殖民者由於受殖民者自封的文化優越感所疊惑, 便模仿他們的文化, 卑躬屈節的懇求他們把自己當做是他們文化的同儕。第二個階段是疊惑消失了, 他們清楚了殖民者根本是看不起他們的, 要想投進殖民者的懷抱, 跟他們結合為一,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因之他們返回他們文化的老根。第三階段則是他們開始締造新的、真正的民族文化, 忠於他們所重新發現的民族特性。二十世紀第三世界的文化發展證實了法南的正確性。

這個世紀的大部份時期——不論是從西方取得獨立以前或以後——第三世界的許多文學, 以及文學的表達媒體, 在性質上都是同化主義的。許多現代非洲詩人和拉丁美洲小說家, 由於趕上他們信以為真的所謂普遍文學標準, 就沐猴而冠的學樣歐洲模式, 製造出大部份叫人唸不下去的作品。許多非洲人都感到非洲的「歐洲現代派詩」讓人厭憤, 因為句子根本莫名其妙。這些人寫的詩, 現在已經被人名之曰「霍普金斯症」詩。同樣, 賈西亞·馬奎茲 (Garcia Marquez) 也曾悲嘆道, 模仿歐洲寫實主義的拉丁美洲小說家「用令人難以卒讀的小說侵犯書店」。這些作品之所以令人難以卒讀是因為它們的表達方式無法把拉丁美洲的現實狀況明白的呈現出來。

在大部份第三世界中, 即使獨立以後, 殖民者的輸入語文 (尤其是英、法、西文) 仍舊是官

第三世界文學的新潮流



方的國語，佔據著支配的地位，據有社交與文學上的重大特權。此種現象在東南亞所產生的結果是，以這些語文所寫的作品雖然微不足道，却比質量均重的本土語文作品更得到官方的保護，更得到認可與地位；馬來語、緬甸語、他加祿語與泰米爾語的作品則遭官方漠視。印度的情況亦一樣，英語文化是官方文化，而這意謂，用英文所寫的印度作品篡奪了用印度文所寫的印度作品本有的重要地位。

決定用自己的語言來寫作，致力提倡民族文學

更糟的是，用英文寫印度作品的人，他們認為自己最重要的要務不是跟印度同胞溝通，而是怎麼樣寫他們所認為的「上好英文」——就是他們認為在英格蘭的高級文學圈中所用的英文。尼日利亞也同樣偏好所謂的「女王英語」，以致當阿摩斯·杜陀拉（Amos Tutuola）用他那尼日利亞化的英文寫出迷人撼人的小說時，許多優異份子都感到難堪。

美國黑人的情形也好不到哪裡。一九六〇年代產生了文化的民族主義，而在這之前，大部份美國黑人作家都旨在求得歐美文壇的一席之地。因之他們不敢任意運用他們的美國黑人英語，也避免觸及歐美主流所忌諱的題材。阿拉伯世界也



阿摩斯·杜陀拉，他力主以母語來從事寫作。

逃脫不了這種運用殖民者語文的趨勢。譬如阿爾及利亞，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才開始反省到：文學作品仍然用法文書寫，而非用阿拉伯文，實是民族之耻。

以歐美馬首是瞻的結果是產生了同化主義的文學，而寫作者所著眼的則是取得歐洲與北美的出版者、編輯、評論者與給獎者的讚揚，但這些人所用的評論標準當然是歐洲與北美文學所慣用的標準。以這樣的標準得到讚揚的作品又轉回來回饋第三世界，得寵於當地的優異分子。同時，這類作品也慢慢打入當地學校，其中少數並跟控制著學校課程的歐洲文學作品會合，成為教材。譬如在西非的學校中，英國文學長久來就是讀物的主要來源。即使到今天，在經過非洲作品堅強的進攻以後，西非學校的畢業考試中，英國作品——莎士比亞的、哈代的、喬塞的、布郎寧的與形而上學派諸詩人的——仍佔課目的一半。

不過，最近十年左右，民族主義對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反應強烈起來了。第三世界的作家選擇用民族語言來寫作的越來越多，其中有不少傑出者，肯亞的努基·瓦·狄昂戈（Ngugi Wa Thiong'o）便是其一。他原先因為幫助農村公社演戲而遭拘留；釋放之後，便用基奎于（Gikuyu）文寫小說與戲劇，然後又譯成英文。而博得廣大讀者群的讚許，另一個傑出作家是索馬利工程師法拉克斯·考爾（Faarax Cawl），他的第一部文學作品不僅是暢銷書，而且是現代索馬利文的文學中第一部經典之作。非洲以英文寫作而知名的作家，如杜陀拉與亞契比（Achebe）則已決心用他們的民族語言來寫作，並致力於提倡、提升民族語言。事實上，幾乎所有被問及此事的非洲作家均表明有意要用他們的本土語文來寫作。不願如此的作家則在學術討論會和一般會議上遭到攻擊。在印度和東南亞，本土語文的文學即使在官方的舞台燈尚未照到的時期，即已在銷路、讀者群與品質上超過歐語的文學。在美國，最好的美國黑人詩始終是以黑人英語為美國黑人所寫的那些。



第三世界文學的新潮流



勞基，他要為自己的同胞而寫作。

設法抓住現實困境，跟自己的同胞溝通

歐語作家也並非沒有受到影響。以非洲作家而言，追隨亞契比、杜陀拉、辛高（Senghor）與卜提克（p' Bitek）的榜樣的人越來越多了；他們允許本土的、前殖民時期的傳說、神話與文學表達方式在他們的作品中產生實質的影響。即使他們的英文法文版作品也日益在改變，記載了非洲人的經驗與傳統。美國黑人的、迦勒比海的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區的作家都是如此。

跟這個轉變並行的，便是在風格或意識型態上尾隨西方路線的文人，他們當然受到第三世界作家的排斥。例如：渥爾·索因卡（Wole Soyinka）與V S·奈保羅（Naipaul）便被視為新殖民主義者，寫的是歐洲文學，而非非洲或迦勒比海的文學。同樣，用法文寫作的北非作品也漸漸被人視為法蘭西文學的旁枝或附庸。

這種要消除殖民心態的衝動也撲向了那些鼓勵同化主義文學的機構。非洲的中學與大學的文學課程已在進行改變——尤其是肯亞；此處的奈羅比大學的英文系已經取消，而以文學系代之，為的是不再強調英國文學。此外肯亞也出版本土語文的雜誌，興辦出版社，以擺脫西方對出版物的控制以及西方在評論方面的霸權。

在使殖民地文化機構本土化的措施中有一個

讓人大為喝采的例子：烏干達的國家劇院一向被英國社團用做表演莎士比亞和其他英國作品的場所。當烏干達詩人奧可特·卜提克（Okot p Bitek）——他不久前去世了——奉派為劇院經理之後，他決心做全盤改變：

「奉派之後，我說：不行，我們不能再忍受下去；你一定得把它弄成民族性的東西。我們把那些傢伙趕出去的法子之一，就是弄了三十個鼓，開始敲，從早上八點敲到中午。樓上辦公室的傢伙們什麼也做不下去。然後從下午兩點又敲到四點。他們非得跟我們開會不行了。結果是國家劇院非得「國家化」（民族化）不行。我們必須做一些事來減低外國戲劇團體的主宰權，使烏干達的才情能夠在自己的劇院中開花。因此我們的活動很多。我們有國家劇院合唱團，只唱烏干達的歌。我們有一座傀儡劇場，演出民間故事；這讓某些教會人士感到不安，因為星期天早上孩子們不再進教堂了。」

第三世界的許多作家現在都已不再想為「世界」（意謂歐洲與北美）而寫作了，不再想在世界（意謂歐洲與北美的文壇巨擘）面前證明他們的才華了。他們現在全心全意要做的是先以本族同胞所能懂的語文與口音為自己的同胞寫作。結果是無耻的同化時代大部份業已過去。一位倫敦的評論者在評論勞基最近一本書的英譯本時便會這樣說：「非洲文學在回家了。」這句話也可以適用於第三世界的整個文學。

是什麼原因促成了這種改變呢？答案應該是這樣的：對於自身的環境敏感的作家們，必須設法抓住國家民族的現實狀況與困境，跟自己的同胞溝通，而因此，又必須尋找適合於這種溝通的主題、風格、語文與表達技巧。於是他們轉向自己的民族史，在其中尋求主題，轉向自己的人民，以他們為主要的聽眾——這一個轉向，乃是關鍵性的轉向。於是，他們跟傾向歐洲的同化主義者們便分道揚鑣了，因為後者以歐洲人為他們的主要聽眾，而獲取歐洲人注意的唯一途徑乃是供

第三世界文學的新潮流



給他們一些外國貨，以取悅或阿諛他們的歐洲優越感，由於這個原因，這些作品便不可能深刻而真誠的探討殖民時代的種種暴行與財產的篡奪，免得歐洲人因他們祖先的劣行而感到愧疚與自責。

作品是橋樑，使人民與歷史得以對話

覺醒過來的第三世界作家，認為自己的作品是一座橋樑，使他們的人民與歷史得以對話；這些人，對文學的宗旨與地位便與親歐派的作家有了不同的認識。對他們來說，文學不僅可以給人娛樂（當然，人民跟歷史的對話有很多也是非常有趣的，甚至於讓人拍手大笑。），而且可以幫助同胞塑造民族意識，幫助國家構築長期的國家大廈，幫助世界塑造遠景，幫助民族建立行動中心。

他們確切的察覺到文學能使人對生活有所準備，有時甚至推動人民行動。黎扎爾（Rizal）民族主義的小說便點燃了菲律賓一八九六年反西班牙殖民主義的革命之火；阿爾哈金（Al-Hakim）的「靈魂回家」（The Return of the Soul）則推動了納塞，使他在埃及與阿拉伯世界史中扮演了扭轉乾坤的角色。當然，大部份作家也都承認，能這般直接影響歷史的作品不會很多。他們一一例如亞契比一一都跟賈西亞·馬奎茲抱著同樣的看法：「文學是一種長遠的武器」。因此，他們都集中心志，透過文學來考察民族史、民族認同感、民族目標與民族精神士氣與展望中的種種根本問題。

第三世界，由於共同受過西方殖民主義的壓迫，由於共有從舊文明的碎片中鑄造新國家的艱困，因此在文學上所採取的消除殖民心態的努力也有類似的步驟。結果是產生了一種新的國際主義，意即非帝國主義的，非霸權的，非千篇一律的國際主義；這個國際主義既欣喜於各民族文學的相似處，又欣喜於各民族因固有的特色而呈現的精彩特殊性。

但我們不要以為這種運動不會碰到難題與障

礙。西方人仍舊在刻意保持他們的文化霸權；因之，民族化運動要想勝利，必須戰勝西方的龐大特權與積極的反對勢力。不過，消除殖民心態之戰，主要是兩種人之間的戰爭，即愛利兒與加里本；愛利兒在征服者被驅逐之後，仍舊迷戀他們的文化與價值觀，而加里本則想恢復民族文化的自主，並將此文化以他們認為適當的途徑發展。加里本如想得勝，必得先有某些改變。也許最重要的是執行新的民族語言政策，而這種政策的結果會終止殖民語言的優勢。另一個重要的步驟是消除文盲，推廣閱讀習慣。這會打破為數不多而又往往以歐洲馬首是瞻的優異份子對文藝的操縱。第三個重要的步驟是為文化創作行為爭取適當的自由；這有特別的重要性，因為政府往往認為在處理國家發展與建設的問題上，作家們總是站在找麻煩的立場。

歐洲人再也不是第三世界語言、文學仲裁者

語言政策是否會有改變，有一部份要看國家究竟認為哪樣的公民才是模範公民而定。精通歐語而國語不通，甚至民族語言不通的人能否成為模範公民？或者，模範公民是否應通曉本國的數種本土語言——包括其本族語言在內？我們應當牢記在心的是，模範公民並非必須只會一種語文。多種語言制可能是新語言政策的適當前提，因為，第三世界國家往往係由多種語言社區組成，運用多種語言勢在必需。

第三世界殖民心態的清除之戰要想取得最終的勝利，只有歐洲語言不再是建制化的語文時才能達到，因為這個時候，歐洲便不再是文學作品的主要投訴對象了，歐洲人也不再是第三世界語言與文學的仲裁人。再者，文盲的現象使大部份人民無法直接參與國家民族發展的對話與辯論，這個現象，只有民族語言政策的徹底執行才能消除，而只有文盲現象消除後，大部份人民的思想、精力與創造性才能投入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中。

(Chinweizu／撰)



第三世界文學的新潮流

—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茲

安裝指南針

我第一次跟加布里埃爾·賈西亞·馬奎茲見面的時候，正在他的BMW汽車的儀表板上安裝指南針。「麥爾奎亞底斯(Melquiades)的指南針？」他開玩笑的說。他的太太梅瑟荻絲的美與和藹，是早在文學界久傳的了，而今我得以親自證實。這時馬奎茲一家住在墨西哥城南郊的艾爾·彼得利哥，梅瑟荻絲在車房門口迎接我。她替馬奎茲解釋說，墨西哥這百萬大城讓他暈頭轉向——因此就有了裝指南針這種事。

馬奎茲這時從汽車裡爬出來，她太太則為我們做了介紹。馬奎茲捲髮，身體結實，穿着一件從上到下的工作服，前面一條大拉鍊——這是他的上午寫作裝。他溫和中聽的西班牙語偶而會漏掉S音，使人立刻會想到哥倫比亞北海岸的迦勒比海口音，他標準的拉丁唇鬚則已顯灰白。

他們的兒子岡查洛，這時帶着一個羞澀的、不肯開口的女朋友出現了；岡查洛二十歲，徹底的墨西哥味。父母兒子之間活潑的說着打趣的話。

賈西亞·馬奎茲一家最近才從坎城回來，那裡的影展請他去做評審。回到墨西哥才一個星期，他的時間表就排得很緊了。雖然已經舉世聞名，他仍舊待人懇切，既不做作，又不驕縱，實際上讓你看起來是一個平衡得很好的，因而顯得普



間單獨蓋在一邊的房子，有冷氣調節，有種種百科全書和其他有用的書籍，有拉丁美洲的畫家們畫的畫，還有一個盧比克立方體(Rubik's Cube)；這些，使我很容易想像馬奎茲如何在商業區的咖啡屋中跟廚子聊天說笑，或跟自動電唱機的修理匠喝着啤酒。

問：「一百年的孤寂」(one Hundred Year of Solitude)已經譯成多少國文字了？

答：照我太太最近的統計，是三十七種。

問：除了西班牙文的以外，那一種賣得最多？

答：很難說得正確，俄文第一版賣了一百萬本，是在他們的外語文學雜誌上刊登的。他們顯然還要翻譯成其他的蘇維埃文。義大利文版譯得很好，我想。此外，還有希臘文、法爾斯(Farsi)文和阿拉伯文的海盜版。阿拉伯讀者似乎很能領會這本書的意思，不過我聽說海盜版的翻譯譯得不很好。

問：「一百年的孤寂」中，有一段逼真的罷工場面。寫的時候是不是很費事？

答：事件的演變跟一九二八年果農聯合罷工的實況是很相近的；正好我也生在那一年。我唯一誇大了的是死亡人數；當時是數百人，我却把它寫成數千人；但在我小說的發展來看，數千人却是比較適合的。奇怪的倒是一個哥倫比亞的記者，有一天竟說「一九二八年罷工的上千死者」。不過，雖然跟往事不合，但如事態發展下去，將來終必相合，如此，則也不算說錯的。我寫的「族長」就曾這樣說過。

問：在罷工的這一幕裡，你的筆觸始終有點輕佻。

答：描寫揚基人的時候是用當地人對他們的看法來描寫的，維琴尼亞的火腿和藍斑鴨的諷刺畫便是這樣寫出來的。你知道，我那時候有些親戚從美國回來，站在美國人的立場說話

第三世界文學的新潮流



當加布里埃爾·賈西亞·馬奎茲宣布，如果奧古斯托·潘諾謝將軍不辭智利總統，他就不出新書時，瓦爾帕萊索附近的一所拘留營中的政治犯們便決定送他一份禮物。他們要把「一百年的孤寂」用民俗詩——每首十行的傳統詩——重寫一遍，配以木刻插圖，而木刻插圖則是十九世紀以來智利的民俗藝術慣用的技巧。政治犯的木板取自茶盒，唯一的一把工具則是一段舊鋼鋸磨成的小刀。油墨滾是洗髮水的瓶子，裡面裝了沙。

右側的木刻是從監獄裡偷運出來的兩幅之一，由史學家雷納多·李昂所刻。刻的是康茨達·艾蘭拉和她可惡的祖母；祖母是由膝抬著的。在那些政治犯而言，這幅插圖所代表的是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太眾被剝削的情形。

，認為罷工是「破壞繁榮」等等，書中的態度便是我的答覆。當然，我自己對美國人的態度要複雜得多，而在傳達那些事件的時候，我是盡力不帶任何仇恨的。美國可能是我們的敵人，但這個敵人是不可輕視的。

問：在美國現代的許多歷史課程、社會課程中，「一百年的孤寂」都認為必讀。有人說它是拉丁美洲的最佳導論。對於這種說法你有什麼感想？

答：這個情況我倒並不特別清楚。但我有過類似的經驗，很有趣。法國經濟學家雷內·杜芒最近出版了一本很長的學術論文，研討拉丁美洲的狀況。他列的書目幾乎都是學術專論和統計分析之類的，但「一百年的孤寂」却列在裡面！又有一次，美國德州奧斯丁市的

一位社會學家來找我，因為他不滿意他的方法，覺得他的方法枯乾無效。他問我，我的方法是什麼，我說我並沒有方法。我只是多讀、多想、不斷的改寫。我從事的不是科學研究。

問：有些左翼評論者責備你沒有為拉丁美洲提出更積極的展望。你怎麼答覆？

答：對，不久以前我在古巴還遇到這種情況。在那裡，有些評論者很推崇「一百年的孤寂」，却認為它沒有提供出一個答案。我跟他們說，提供答案並不是小說的任務。

問：那麼，你「族長的秋天」（Autumn of the Patriarch）宗旨是什麼？

答：我一向就對迦勒比海岸的「獨裁者」深感興趣；這個角色可能是我們唯一的神秘人物。別的國家有聖人、殉道者或征服者，我們有的却是獨裁者。我感覺到獨裁者是我們自己的文化的產物；在那本書裡我想達到的是一種明澈的看法。我並沒有譴責他。當然，我描寫的是早期那種獨裁者，而不是現在的這種，現在的這種是由科技支撐的。他們是專家政治論者。但早期的獨裁者則往往是反帝國主義者，像委內瑞拉的朱安·文生·高麥茲，他就是向英格蘭和日耳曼宣戰過的。

問：你如何處理那本書的技巧？

答：由於我想創造一個綜合形象，我必須訴諸新的敘事法。不少人認為這本書難唸，但慢慢覺得這本書自然的人越來越多了。現在就有不少小孩能夠把「族長的秋天」唸個大部份。這有點像畢卡索的立體派繪畫——當然，我不會把自己跟畢卡索相提並論——你一開始看的時候有點討厭，可是不久你就會發現那正好是把東西拼湊在一起的另一種方法。

問：你看過「瓊斯皇帝」（Emperor Jones）嗎？

答：看過。其實在我心裡的就是那本書，當然，還有其他的東西。十年來，我狼吞虎嚥的看關於拉丁美洲的獨裁者們的資料和關於權勢



第三世界文學的新潮流

方面的，例如蘇東尼阿斯（Suetonius）的。然後，我却盡量把它們忘得一乾二淨！不過，中學的時候，歐尼爾的作品我是每一本都看過了。有趣的是我的文學背景是由西班牙黃金時代的詩和二十世紀的美國小說構成的。不過，美國的部份後來則模糊了。

問：有好幾次你都曾經說，貝拉·巴爾托克對你的作品有重大的影響。是不是因為他把民俗與古典藝術合為一的方式？

答：不錯，此外還有他的結構感。巴爾托克是我喜歡的作曲家之一，我從他學到了許多。我的小說裡充滿了巴爾托克弦樂四重奏中的對稱。（有的人以為我是個自然流露的作者，其實我構思非常用心。）雖然我不懂樂曲寫作的技巧，但對巴爾托克的樂曲結構我却能領會。此外，他對他的民族同胞和民族的音樂有着深切的情感。他的人像畫也是驚人的。有一張很動人的相片，是巴爾托克在田野工作時的情況：他把留聲機的喇叭曲柄轉向一個農婦，讓她對着它唱。你可以看得出來，他工作是很勤奮的。

問：你對街頭和平民生活很熟悉。這方面的知識對你有什麼益處？

答：那是我的根源，也是我的主旨。那是我熟悉的生活方式，也是我有心的去培養的。

問：那些走私者的生活情形——譬如「清白的艾蘭·德拉」中的一——你是怎麼知道的？

答：噢！我跟他們一起長大的！我的叔叔伯伯表兄表弟、親戚朋友就是瓜吉拉半島的走私者，而「清白的艾蘭德拉」中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現在，走私品大部份都不在了。那時候走私的東西，現在有很多都在免稅商店裡大明大擺的賣了，不能賣的則是國際共管的東西，由販毒集團在控制。

問：隨着名氣日增，你跟你人民的根保持連繫，是否感到困難？

答：有一點；但不如你想的那麼嚴重。我可以隨意到鄉鎮咖啡屋去，頂多是有人讓我簽簽名

。可貴的是他們把我當成他們自己的人，尤其是在美國的旅館裡；在那種地方，他們覺得有個拉丁美洲的人讓他們可以發發對美國的牢騷，是件好事。但我不能或忘的是這些人有許多都是「一百年的孤寂」的讀者。

難辦的是公共場所——例如文學酒會或政府機關辦的大宴會。我一進門，就有許多人圍上來，要跟我說話。我最大的難題就是怎麼過我個人的生活。因此我總是跟老朋友們在一起，他們可以為我把群眾擋開。

問：做報業人員對你的寫作有何影響？

答：報業使人和事實接觸。每星期我寫一篇專欄，由報業辛迪加統一發稿給十家報紙和一家雜誌。這對我有好處，就好像棒球投手使胳膊保暖一樣。你知道，搞文學的人總有一種傾向，想憑空起步。再說，如果你只寫書，你每次都得從零開始。

週末我都回到圭納瓦卡我住的地方，看遍報章雜誌，從「新觀察家」（Nouvel Observateur）和「重點」（Le Point）上剪一些資料下來；以前我是看「時代週刊」的，但現在改看「新聞週刊」了。

問：你列在美國移民局的黑名單上，故事是怎麼樣的？

答：很怪。一九六〇年代初，我為古巴通訊社——Prensa Latina——做紐約通訊員。一九六一年，我由於政治意見不合，辭職赴墨西哥。此後我被裁定十年不得入美。但一九七一年，哥倫比亞大學給我榮譽博士學位，於是給了我一次回來的簽證。後來，移民局決定，如果我做一點對美國有益的事——諸如發表一次演說之類的——他們就讓我入美。於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弗蘭克·麥克祥就設法給我演講邀請書。移民局和我之間終於達成了秘密協定。他們不要傳播媒介拿這件事做文章，因此，如果我拿邀我講話的公文給他們看，他們就給我簽證，簽證上有某些秘密記號，是機場海關人員可以看得出來的。

第三世界文學的新潮流



但是，他們究竟為什麼要把我列入他們的黑名單裡——說得正確點，是黃名單吧——我確始終不明白。我的政治觀念是明明白白的。有的地方可能像某些黨員的，但我從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就我所知，你總不能因為某人的觀念而拒絕他入境。

問：你寫的書中最喜歡的是哪一本？

答：照例是最近的一本。所以，以目前而言，便是「預言過的死之記事」(Chronicle of a Death Foretold)。當然，讀者的看法是人人不同的，而每一本書也都是一個過程。我對「沒有一個人寫信給上校」(No One Writes to the Colonel)有偏愛，不過，「一百年的孤寂」則又是我從這本書轉渡過來的。

馬奎茲始終是懇切的。我們三人從庭園中漫

步而過時，又略略談到墨西哥的稅收、巴黎的生活、美洲的左派、外國語文、以及哈佛學院——馬奎茲的另一個兒子在哈佛唸書，主修歷史（對於這個地點，感情顯然是複雜的。）馬奎茲陪我們到門口，握了手，岡查洛則熱忱的開車送我到最近的計程車站。

(Gene Bell-Villada / 撰)

〔註〕

加布里埃爾·賈西亞·馬奎茲 (Gabriel Garcia Marquez)，哥倫比亞小說家，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最傑出的著作為「一百年的孤寂」。

傑恩·貝爾—維拉達 (Gene Bell-Villada)，生於海地，長於拉丁美洲。在美國麻省威廉斯學院教西班牙文學。他寫過 *Borges and His Fiction* (1981)。

住在台灣是一件拼命的事！

博觀叢書



住在台灣是一件拼命的事！

誰能不談政治？誰能不碰上國民黨，誰能不搞選舉？誰不能不做黨外？誰能不拼命？

解剖國民黨萎縮的外交，解剖成立反對黨的共識，堅持言論自由，堅持基本人權，這是做一個「博觀人」的天生本能，在台灣焉能不拼命？不被禁？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博觀不死，又來了！博觀將帶領你們到自由正義的國度裡。

追求政治正義的朋友，到我們叢書來！

編著 / 林濁水、劉一德
章學含、尤宏
出版者 / 尤宏

郵政劃撥 / 594949號
地址 / 台北市泰順街40巷29號4樓
電話 / (02)341-0122



第三世界文學的新潮流

用英文寫作的印度文學

語文上的外國人

最近在倫敦「聯邦研究所」舉行了一次學術討論會，會上印度傑出的作家尼拉德·喬杜瑞（Nirad Chaudhuri）說：「只要我是用英文寫作的，我就不是印度作家。」

他又說：「對印度大眾而言，英文什麼也傳達不了。」以下是他這次演講的摘錄，從這裡可以看出他為什麼這樣說。

印度人對於精通英文十分熱衷，而有此熱衷的人，自然想用這種語文來創作文學。現代孟加拉詩的創始者，在寫第一篇長詩的時候用的是英文，而孟加拉小說的創始人也是用英文寫他的第一篇小說。當時，他們連想都沒有想到要用孟加拉文，但其後他們兩個都發現這樣做是走入死胡同。因此他們轉向孟加拉文——儘管爲了用民族語言寫作，他們不但要創造新的寫作類型，甚至連語彙都得創新。

而以孟加拉文寫作的情況維持約六十年沒有改變。當然用英文寫作的詩與小說不是沒有，但質量都微不足道。就以印度的情況而言，這是無可避免的。在印度，用英文來寫作的條件尚未存在。任何文學創作，除了作者以外，還有三個必須條件。一、足以提供文學寫作材料的生活環境；二、發達到足以供文學運用的語言；三、可以支持文學產品的讀者群。就以印度的情況而言，印度人用英文來寫作文學作品，前述的三個條件全都不足。

就以讀者而言，用英文寫詩或小說的印度作家不可能期望在印度得到多少讀者。凡是以精通英文自許的印度人，根本就會忽視這批作家，或者，頂多對他們擺出一付屈尊俯就的態度；不管怎麼說，喜以英詩與英文小說以擴充情感生活的印度人，絕大多數並不喜歡去閱讀用英文寫作的印度人生活，因爲用英文來寫印度的事，總令人

有格格不入之感。

這些作家也不可能期望在英國和其他的英語國家有多少讀者。別的不說，英語國家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印度作家能夠用英文寫出多好的文學作品。更且，印度作家所寫的題材和用以表達這些題材的風格，並不能投英語國家讀者的所好。

這些困難已經非常可怕了，而我們自己却另外加了一個：一旦我們用英文寫作的目的超出實用以外，我們就開始朝著錯誤的道路上勇猛前進，而最糟的是我們在這方面的野心是非常幼稚的，乳臭未乾的。我們變得一心一意要去寫優美的英文，把這個當成了最重要的目的，而把我們想要溝通的和傳達的事物反而放在次要。

這是我們嚴重的弱點——我們想變成用「英文寫作的」作家，而不僅僅是作家。我要說，這個弱點甚至在今天仍舊非常嚴重。目前每個印度人，凡被人認作是用英文寫作的作家，就總以爲自己是最佳的英文文學家。

不過，這些心態是往日的殘餘。就從事實而言，印度人用英文寫作的環境其實已經有了極大的改變。前面所提，文學創作的必要條件現在業已通通具備。印度人的生活已經可以提供用英文來處理的題材。其次，以這種生活所寫出的文學，不但可以在印度找到讀者，在西方的英語國家也可以。因此我們現在可以把用英文寫作的印度文學作一個全盤的考察。我們發現這些作品的二種極端，就像指南針的兩端一般，一邊是下垂的一端，它的卑微就像在法院的請願狀似的，上揚的另一端，就是最優秀的作品——如羅哲·羅奧博士所呈現的模式——讀起來也像用英文寫的馬拉美或馬洛的作品（二者皆爲法國名作家——譯按）。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其水準與類型繁多，難以詳細分別。

不過，這個成就我們是要付代價的。能夠提供這種寫作題材的生活是非常特殊的，是一般印



第三世界文學的新潮流

度人的生活之中的一塊租界。即使是這樣，在這類故事中仍舊往往拉一些英國的或美國的角色，以便取悅西方讀者。這些作者用英文寫作勿寧是必然之事，因為他們無法用他們的民族語言來寫——甚至連民族語文都不通。即使在肉體上他們不是外國人，在精神上他們却 | 已經是外國人了。最後還有一點，這些作者非常依賴英國和美國讀者的支持，更依賴美國和英國的出版商。結果呢？印度人用英文寫作的優良作品，即使印度人英文好的都難以看懂，那麼上好的英文作品，當然根本就不可能普遍流傳了。

如果要我來指出英文對印度衝激之後，所產生的最重要的文學結果，我要說，那不是印度人用英文寫出來的東西，而是用透過英文的影響而產生

的印度文所寫出的文學。這類文學即使在數量和變化上不，但以質而言則是偉大的。我們因閱讀英文文學而產生的文學創作渴望，唯有以透過英文洗禮的現代印度文才能找到適當的出口，而且也不能以相當的能力表達。這新的印度語文所寫的文學跟印度古代語文所寫的文學相去甚遠，以致於我們可以說，不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都可以稱之為一種新的文學。

〔註〕

尼拉德·喬杜瑞 (Nirad Chaudhuri)，印度最傑出的文人之一。The Autobiography of an Unknown Indian (1951) 為其名著。

(1)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記

美國記者亞克森斑所著的

日本上空之繁星

——復活中的軍國主義

將以翔實資料與親身訪問告訴你日本軍國主義如何死灰復燃，如何在日本官僚與財閥的陰謀統籌下有計劃地復活起來，龐大起來。

出版 / 學術出版社
定價 / 六十五元
郵撥帳號 / 4876號

出版 / 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郵撥 / 一〇五六二六號
定價 / 二二〇元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王炳章在紐約出版了一本雜誌叫「中國之春」。在這之前，一九八一年四月，凝視中國末來的王曉波為迎接中國的春天，在台北出版了一本書叫「春天與中國」。王曉波以充滿樂觀奮鬥的堅定口吻宣告：「黎明前的黑暗終究要在陽光下逝去的，冬夜的酷寒也終必為春風驅逐。分裂的中國要統一，被壓迫的人民要民主。中華民族要從重重的枷鎖中解放出來，擁抱即將來臨的春天。」

這本書論述了近代以降中華民族的苦難，也探出了「北京之春」以來中國春訊的脈動。「中國之春」的出現，更證明了王曉波敏銳的觀察和預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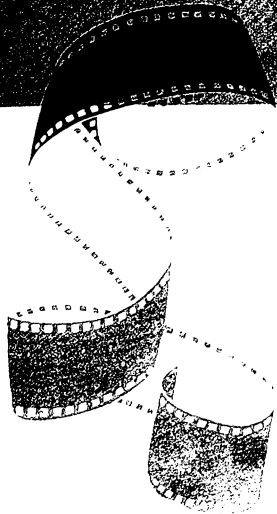
王曉波著：「春天與中國」

迎接「中國之春」的

電影與意識型態

● 陳國富





有關意識型態的一些札記

在德國意識型態一書裏，馬克思（和恩格斯）討論到資本主義社會成長的問題。他認為，新興的中產階級無法像以往的統治階層一樣用僵硬的傳統來維持其權威性，而必須透過表面上無味無臭，但力量遠為強大的「意識型態」統治達其目的。當然，利用傳統來建立統治的合法性本身也是意識型態的，但和以往不同的是，這些中產暴發戶必須設法將整個統治型態「理性化」。換句話說，一方面透過一套政治體系，一方面透過對整個社會物質生活的控制，資產階級使其本身的意識型態成為「合理」、且唯一可行的意識型態。也因此，統治者的意識型態同時也是被統治者的意識型態。如同馬克斯所說，每一個時代的主導心態皆反映出統治階層的心態，因為控制物質生產的階層也必將控制精神生產（mental production）。這「精神生產」，用我們的詞彙來說，指的就是意識型態生產。這一個層次的生產使得下層階級在實質上雖是被剝削者，但心態上却可能認同剝削他們的階級。諷刺的是，這種批判雖一向是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但未嘗不能適用當今某些所謂「社會主義國家」。

對一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上的分配不公自是無庸置疑之事。法國社會學家Godelier就曾蓄意將這種觀念簡化為，「利潤……來自沒有給錢的工作」（見「資本論的系統、結構與矛盾」）。但有多少人能夠意識到，這種不公的本質不僅基於，並造成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現象、家庭結構，甚至兩性之間的階級關係。

而對這種種階級關係的認同，導致我們無法認清自己受到壓制的真象。當我們看到一個人被綁著手或搗著嘴時，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他受到實質上的壓迫。但是當一個人因為因於某些既定的制度和觀念而無法實現自己的本能慾望時，我們必須說他受到意識上的壓制。因此個人（無論階級為何）的意識型態，成為壓制自己及他人的工具。因為他同時也是意識型態的媒介及生產者。

由此看來，意識型態是潛於個人的意識層面下的，是無意識的（unconscious），是「自然的」、隨時發生效用的。也因而它常被冠在「普通常識」、「道德觀念」、「傳統精神」等外衣之下，堅拒任何改變或嚴密的分析。換句話說，經由慣常的意識型態，你永遠無法知道事物的本質為何；你只能去發現它們在既定制度下的位置為何。這種「想當然耳」的現象，同時使得意識型態成為一種幾乎隱而不見的「本能」。由此看來，意識型態既非單純的「政治思想」所能涵蓋，也不是某些頭腦簡單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錯誤知覺」（false consciousness）。就如亞杜塞（Louis Althusser）所指出：

意識型態和「知覺」實在沒什麼大關係……它是徹徹底底無意識的。沒有錯，意識型態是一個表達的系統，但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些表達和「意識」、「知覺」無絲毫關係。它們通常以形象，或偶而以觀念的方式出現。但終究其是一套不知不覺強加到人們身上的結構。（見「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法國符號學家巴特（Roland Barthes）把他的工作集中在發掘日常生活的潛在意義，而無意去分辨大眾文化中的善惡之別。他的「神話」一書便意在暴露當今資本主義意識型態如何透過各種看似「自然」的形式和儀式，有系統的扭曲我們的知覺。透過對各種法則、常規、符號的分析，我們發現原本為特殊階級的利益而生的表達方式，竟然成為整個社會普遍的生活型態。在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裏（如摔角、脫衣舞、電影類型、導遊手冊等），巴特都察覺到一個相同的人為本質，一個相同的意識型態核心。

整個法國都浸染在這個不可莫名的意識型態裏：我們的新聞媒體，我們的電影，我們的戲院，我們的通俗文學，我們的典儀，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學院，我們的談話，我們的寒暄問候，我們的審判、婚禮、衣食住行，在在皆依賴整個資產階級所強制執行的表達方式。（神話）

這一層討論使我們馬上聯想到傳播媒體在這個過程中的重要功能。傳播媒體（文字印刷和影像、聲音媒體）在本質上雖擔負了客觀批評和表達不同意見的責任，但在一個結構嚴密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它却只能不斷地重覆「傳播」主導的意識型態。而似乎傳播力量愈大的媒體愈是如此；因其本身的利益已和統治階層的利益密不可分。從最表皮的層面，我們當然可以從一個媒體對現實政治的態度看出它的意識型態。但最需要去分析的，可能是那些被層層覆蓋在「文化」、「藝術」、「新聞傳真」等項目下的訊息。分析這些訊息不僅使我們可以暴露出某些事物的真面目，同時也將整個意識型態的製造過程和方法放在一個可以批判的位置。因此巴特在一張黑人法國士兵向國旗敬禮的照片裏，看到了這張雜誌封面的真正訊息：法國是一個偉大的帝國，其所有的子民，沒有任何種族歧視，在國旗下忠心地為祖國服務。而這幅黑人為他的壓迫者效命的景象，顯然意在反駁那些「反殖民主義」、「反種族歧視」的論調。在這樣的分析中，最重要的見解倒不在於指出圖片本身的政治意味（那是顯而易見地），而在呈現出什麼東西透過什麼方法在什麼特定的情況下製造出什麼意義。這種「閱讀」有深一層的用意；因為法國當時是一個所謂自由

民主的社會，這份刊物表面上也是「獨立客觀」的。如果它出現在一個極權的共產國家，我們很容易可以看出那是政策宣傳。但在一個資本社會的商業雜誌裏，所有的政治訊息却可能因為經過包裝和粉飾而顯得「再自然不過」。換句話說，意識型態可以變成供消費的商品。

基於這樣的前提，我們來看什麼是——

電影的意識型態

電影有很多種，但大多數人心目中的電影可能只包括商業劇情片。這個事實顯示出利益在電影和意識型態的關係間扮演的必要角色。在一個自由經濟的社會裏，電影是一種具有交換價值的產品（不論是商業或所謂藝術電影）。因此整個電影的製造及傳播皆可能由市場的消費原則來控制。當然，在某些地區或某些情況下，政治因素對電影的影響力會大過商業因素，而致作品表面的意識型態淺顯易見。雖然我們一開始的著眼點是商業劇情片，但本文愈往下的討論將包涵所有種類的電影（娛樂或政治的、商業或藝術的）。我們的批評對象也應該是意識型態本身（基於以上對意識型態的定義），而不是和電影工業發生關係的個人。

在一個以電影為謀利產品的制度裏（如好萊塢及其仿效者），大多數的電影事實上只能機械式地反映既存的意識型態，因為任何違反現實潮流的企圖都將危害到投資者的利益。生產一部電影既是花費如此大的財力、人力，其中所有的設計便需以收回成本、賺取利潤為首要目標。這樣一來，無論生產者的態度是迎合觀眾口味或創新花招，電影都只能是保守的媒介，無法充當批判

搶回過去三十年虛擲的光陰

現在請你閱讀這些詩人的詩集，他們為你也為詩搶回三十年虛擲的光陰

從七〇年代開始，現代主義在文學、詩、繪畫、音樂等各國陣地敗退下來。新詩大論戰後，為現實主義的、中國風格的、干涉生活的文學藝術，準備好認識的條件。——陳映真

- 林華州／澳南悲歌／定價80元
- 詹 澈／土地，請站起來說話／定價80元
／預約單冊八折
- 廖莫白／戶口名簿／定價80元三冊190元

與蔣勳詩集合購四冊 245元，遠流出版社郵撥189456號。

性的角色。更何況電影投資者本身便屬於既得利益階層，更適合擔任「製造」意識型態的工作。再者全然的商業化，也導致電影工業頑強地抗拒批評。我們曾經提到，在現存的經濟制度下，每部電影最後都必須成爲具有交換價值的商品。但是在成爲商品的過程中及成爲商品以後，電影同時也是其他的一些東西——藝術、文化、政治、教育、宣傳……。由於對投資者來說，電影只是商品而非任何其他的东西（所謂「自由貿易」制度也鼓勵這種態度），一種排斥嚴肅分析的「免疫力」便因此而產生。當然我們知道，生產者忽視媒體的文化意義並不表示媒體就沒有文化意義。而對意識型態的無知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型態。這種抗拒和漠視不僅使得媒體本身因缺乏自省能力而僵化，也造成實務和理論之間無可救藥的疏離。

「僵化」一方面意味著文化及藝術上的失敗，一方面暗示整個社會的意識型態正被不斷的加深和強化。這種現象最明顯的特徵便是「類型公式」、「明星片廠制度」等商業體系下的產物。透過不斷重覆的情節和表達形式，電影類型一方面擔任傳達意識型態的工作，一方面則試圖在電影中解決此意識型態本身的矛盾和衝突。以流行一時的台灣「文藝愛情片」來說，最常出現的主題不外乎：階級的衝突（富家子／女愛上貧家子／女，而無法完滿結合）、新舊的衝突（上一代

的保守對抗新一代的反叛）、兩性的衝突（「除了愛情、婚姻，女性還有什麼？」的難題）。文藝片處理的種種衝突在現實社會中當然是存在的，可是絕大多數的電影却先是加以扭曲和單面化，繼之以牽強而假光明的收場來肯定病態的保守觀念。在這樣的電影裏，傳達意識型態的大量符號及訊息在大眾面前變成了「無害的娛樂消遣」。在現實環境中，這種娛樂沒有政治上的責任，却擔任政治性的功能。

類型的模式當然並非長久不變的。在某種情況下，它必需作適度的調整。當類型對事物的處理和現實差距過大時，它將漸漸失去對觀衆的吸引力。或借用人類學家李維史陀的觀念來說，一個神話因完全失去其現實的適用性而必須消失。當然，一個真正的類型並不會就此消失，就像意識型態也不會因其本身的矛盾而消失。爲了維持生存，它必須給舊的元素加上新的外衣，所謂「翻新花樣」、「增加創意」。再者，生產者可以對類型施行適度的「局部注射」，在電影中加進某些反省類型，或甚至破壞類型的元素，但基本上仍須維持原先類型賴以存在的假設；亦即，同一個意識型態結構。這些因生產者遭受商業上的壓力而進行的改變，一方面層層覆蓋著類型的訊息，一方面使得產品以更吸引人的面貌成爲觀衆的消費品。

到了這裡，我們必須把討論拉回一個更根本



「1900年」，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至第二次大戰結束期間，義大利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衝突，而以法西斯主義的興亡爲貫穿全片的主题，是一部強烈反法西斯的政治電影。

的層面。如果說，我們承認電影媒體在現代社會中發揮了強大的力量（或說，強大的壓制力量），我們不禁接著要問，這力量來自何處？這個問題同時可帶出更多的問題：電影是應何種需要而生的？電影和觀眾的心理經驗之間的關係為何？八十多年來，電影的發展情形為何？又，其科技的發展和意識型態發展之間的關係為何？電影如何不同於以往的表達媒體？

對於這些問題，我們顯然無法一一討論。為了方便本文的課題和篇幅，我們提出一個假設的範圍來限定這些問題。

有關電影「寫實本質」的問題

一八九六年，一張為剛發明的電影在柏林首映而張貼的海報上這樣寫著：「其形像是如此的逼真，你會暫時忘了那些呈現原是人為的」。這句話幾乎道盡了我們這一部份討論的重點。電影雖是人為的產品，但其影像的逼真却常使人真假不分。我們說，這是電影的幻覺。這幻覺來自攝影機可以機械地記錄鏡頭前面的人、事、物。當然，在這個過程展開前，人為的因素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有人必需把攝影機擺在一個他選擇的位置，裝上他覺得合適的鏡頭，在他認為適當的時候開動機器。如果拍的是劇情片，那問題就更複雜了。他必須決定故事、說白、演員、佈景、燈光、攝影機運動等等問題。而這些決定只不過屬於「前電影」的階段（pro-filmic）。拍攝完成後，生產者馬上面臨沖印、剪接、放映的問題。這一道手續皆顯示出，「人」和這所謂「機械式記錄」之間的關係。

我們可以認定，每一部我們看過的電影裏面的每一吋膠卷，都是人工設計的結果，不管其是生產者有意的安排或無意的反應，不管是十六厘米的社會記錄片或超寬銀幕的好萊塢電影。既是人工的設計，觀眾便有權利知道電影中的影像來自何處。當一個記錄片作者選擇台北市作為記錄的對象時，他以什麼地方、什麼人作為台北市的代表。他用彩色或黑白底片，現場收音或事後配音，長鏡頭或短鏡頭，望遠鏡頭或廣角鏡頭，長片或短片，加不加旁白或音樂，這種種的決定，不管是基於藝術或技術上的因素，都可以回到意



E·T·與其導演——風靡全球的「E·T·」它滿足了觀眾什麼樣的需求？

識型態的討論。如果說，在這種安排下，生產者仍然認為他在「記錄真實」，或盡量「捕捉真實」，其用意何在？或說，觀眾仍堅持沈陷在真實的幻覺裏，其結果為何？

任何上過戲院的人都知道，看電影是一種非常被動的經驗。我們長時間處於黑暗中，面對由劇情串連起來的流動影像，整個過程幾乎毫無溝通、反省的餘地。影像本身雖時有扭曲的情形（如望遠鏡頭的壓縮效果或沖印的色調等等），但大體上觀眾仍確信其是真實的呈現。原因有二：一、畫面中的人（外形和動作）或物，及聲音和畫面的配合，皆符合我們對現實世界的認知。畫面上的臉部特寫雖比我們的頭大上幾十倍，但只要其各部份的比例符合我們經驗，講話的聲音和嘴形同步，我們便可以接受那是一個「真的人」在講話（音畫不同步雖不致損害電影的進展，但肯定會引起觀眾的不安）。這是電影的發明帶給心理學的一個課題，同時也是一個意識型態的課題。二、這種幻覺來自電影的「敘事性」。記錄片、卡通片、或各種所謂實驗性的短片都是電影。但如果我們聽到，「我喜歡看電影」這句話，我們當然知道它指的是那些說故事的電影。什麼故事呢？一個以主要角色為中心的故事，一個表演「擬真」的故事，一個有頭有尾，可以了解的故事。換句話說，能夠讓廣大觀眾接受的電影，必須包含一個引起觀眾認同的劇情。既是觀眾能夠直覺認同的劇情，則表示其投合了觀眾對現實的經驗和想望，或者說，投合了觀眾及整個社會的意識型態。

因此，電影工業八十多年來的首要目標便在於改良電影的寫實能力（不管是視覺上或心理上）。同步錄音、彩色沖印、寬銀幕、穩定攝影機，每一項發現都是對電影「寫實主義」的一大貢獻。技巧方面，也力求以「剪接流暢」、「表演自然」為最高目標，意圖遮掩所有「人為」的痕跡。甚至某些傳統的電影美學，也標榜電影的景深（deep focus）觀念，因為景深保持了空間的「完整性」，也因此更接近電影的寫實主義。這真是一大諷刺；實質上，電影的空間再深也深不過那張薄薄的銀幕。景深並非只能用於寫實。此例僅在說明，在一種堅持電影為「寫實媒體」的理論下，此一媒體的所有形式元素都將被迫為「寫實」服務。

在這樣的推展中，我們目睹了電影雙重負面力量的產生。第一重針對觀眾及社會，第二重針對電影本身。透過對攝影「寫實本質」的剝削及對電影製作過程的掩飾，電影剝削了觀眾的官能、智識並掩飾了事物的真象。由於電影的製造及發展全然服膺於商業的原則和「再現真實」的傳統，大量「不合需要」的形式方法因而遭到淘汰，導致電影本身的可能性受到嚴重的壓制。

有關電影批評的武裝

「我們不再籠統的問，『電影』（cinema）是什麼？正確的問題應該是：今天的電影（Film Today）是什麼？」這句話出現在一九六



老少咸宜的歷險電影——「魯賓遜漂流記」充分發揚了清教徒精神。

九年十月號的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ema）裏。在這篇標題為「電影·意識型態·批評」的文中，筆記的同仁宣稱他們將開始對制約電影生產的因素（經濟條件、意識型態、市場的需求及反應等等），進行嚴格的分析；並使這種科學的批評成為鬥爭的工具。

每一部電影都是經濟體系裏的一部份，因而也是意識型態體系的一部份。所謂電影和藝術也是意識型態的分枝，一個都跑不了。像拼圖遊戲的碎片一樣，各有各的位置。體制對自己的本質是無知的。然而儘管如此（或正是因為如此），當所有的碎片拼起來以後，一幅清楚的圖像便顯示出來。但這並不是說每一個電影製作者都在制度內扮演同樣的演色。他們對制度的反應是各有不同的。……批評的職責便是去觀察這些反應不同在何處？

（……）我們要問，那些電影、書籍和雜誌，會讓意識型態通行無阻，並清清楚楚地把它傳達出來，成為它的喉舌？而那些則企圖使意識型態回頭反省自己，並揭露其機械作用，使其無所遁形。（見「Cinema/Ideology/Criticism」）

基於這樣的認識，文章的作者把他們所看到的電影分成七大類。第一類包括了時下的大多數電影。「那些完全注滿了純粹的統治階級意識型態的電影」。當然，電影製作者本身對此可能是無知的。這些以所謂「商業電影」、「藝術電影」、「傳統電影」、「現代電影」各種面貌出現的產品，雖說是迎合了大眾需求，但如前所述，大眾需求很可能就是當權意識型態的需求。面對這類電影，評論者能做的就是分析「意識型態體系如何和它的產品在各個層面相互呼應」。

第二類電影是在兩個層面上向意識型態反抗的電影。首先，這些作品直接處理政治性的題材，或帶有政治性的內涵。其次，這些作品「向傳統寫實觀念挑戰而能成功地與之決裂」。這就是說，這些電影的製作者已經認清，只有同時在內容及形式上進行變革，才可能與主導的意識型態對抗。「經濟、政治上的行動，必須與形式上的行動密切配合。」接下去一類的電影，內容雖非明顯的政治性質，但由於其批判性的形式，最終將成為政治性的作品。這第二類和第三類是當時

電影筆記心目中最有價值的電影。

第四類電影具有明顯的政治內容，但由於表達時使用的語言和影像來自作品表面上攻擊的體系，其政治企圖將變得無效或甚至有害。評論者的工作便是審察這些作品的政治效用。是否這些電影到頭來反而增強或肯定了那些它們作勢反對的意識型態？

第五，某些電影表面上看起來雖是明顯的保守並受意識型態支配，但骨子裏却透過一種內在的張力使意識型態分裂。這種張力在第一類的電影中是不存在的。例如約翰福特的電影便常在表面流暢的形式下，使支撐電影的保守意識型態充滿矛盾和裂縫。面對這樣的作品，筆記的作者希望能把其「內部轉化的過程表達出來」。

六、有一種所謂生活電影或稱直接電影，雖以社會性事件作為記錄的素材，但由於未能擺脫傳統的寫實方法，所以稱不上是真正政治性的電影。這些電影作者皆荒謬的以為，只要停止說故事，「真實」就會無障的顯露出來。但我們知道，說故事只是壓制中次要的一層。另有一類生活電影的作者不滿於表面觀察的作法，因而賦予其素材主動的角色。這一類電影不再被動地接受外來（意識型態所生產）的意義，而主動去創造自身的意義。

在介紹這些「電影筆記」十多年前的策略後，筆者必須加上一點說明。為免陳述過份冗長，我小心地簡化了原文的討論。但明顯地可以看出，「筆記」這篇文章除了以「總動員」的方式來連接電影批評和意識型態之間的關係外，最大的特點在於強調形式的意義。沒有內容能脫離形式而存在。對於任何想傳達出政治訊息的作者來說，同時在兩個層面下功夫是極其必要的。你既不能用通俗的方式來傳達一個反通俗的意念，也不能期望直接記錄能完全暴露社會現實。

與其說「筆記」的同仁界定了電影批評的科學方法，不如說他們試圖表現一種科學的態度。但既使「電影·意識型態·批評」一文對電影的分類大致有效，我們還是必須承認在運用這些分類時，難免涉及主觀的標準。更何況對其他地區的电影環境來說，這些策略皆需經過大量的修正（關於這一點，請參考「電影·形式·革命」一文，見「生活與環境」第十二期）。也許一種全

面性的科學批評方法永遠不會出現。但是承認客觀方法的不足並不會使評論者躊躇不前，却應該使他更加小心。在能夠確切的掌握某部電影表達的如何？」以前，也許我們應該投注更多的心力去了解「它表達了什麼？」，或甚至，「它怎麼表達？」。

如上面的討論再三提及，意識型態無所不在。如果有人從在從事評論工作時避免意識型態問題，我們只能說他看不到，或贊同作品的意識型態。即使在政治上和當年「筆記」持相左立場的人



港台製作的鬼片強烈傳達古老的倫理觀。

，也必須承認電影反映了社會狀態，也因此參與了社會狀態的塑造。有了這樣的前提，意識型態批評必須是電影批評的立足點之一，因為沒有一部電影，沒有一位作者，沒有一位評論者，能脫離社會狀況而存在。

最後，我們要自問：所謂「電影藝術」的位置在那裡？我們是撇開它不談，還是根本否認它的存在？我想都不是。我們認定所有藝術或美學上的創作必定來自作者（有意無意）對現實的反應。而這反應本身便是意識型態的。讓我再重申：今天大多數電影的壓制性不僅來自其所傳達的訊息，也由於其無理的僵化了媒體本身形式的可能性——固定的類型、固定的構成、固定的宣傳、片長、放映場所……。電影真的只是這樣，只能這樣嗎？這是一個美學上的問題，也是意識型態的問題。畢竟，任何追求藝術可能性的企圖都可以是一種意識型態上的前進態度，而任何決心與傳統意識型態決裂的嘗試都應導致藝術上的創新。我希望這個結論不是妥協，而是同時對電影藝術及健全環境的熱切期望。